

广东省第六次社会科学成果评奖揭晓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广东省第六次（1993~1998年）社会科学成果评奖”活动已圆满结束，获奖成果已公布（见本期123页）。

这次评奖活动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两为”方针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倡导科学、求实精神；增强精品意识，突出质量、减少数量、适当加大奖励力度。经过评委会认真评审，共评出一等奖12项（其中著作6项、论文6项）、二等奖41项（其中著作15项、论文26项）、三等奖108项（其中著作36项、论文72项），总数161项，另评出荣誉奖15项（其中著作11项、论文4项）。

通过这次评奖活动，将进一步激励和调动我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科研水平，促进学科建设，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事业，为推动我省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目录

学术研究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5 / 于幼军: 世纪更迭之际的回顾与展望
——《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广东卷》绪论

18 / 张 磊: 划时代的伟大历史转折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

• 社会科学五十年 •

23 / 李本钧: 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25 / 胡守为: 广东史学发展的一点回顾

26 / 李锦全: 对开展学术研究的一点感言

27 / 詹伯慧: 广东语言科学在飞跃发展

• 经济学 管理学 •

29 / 李子江: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系统

41 / 屈小娥: 改革前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46 / 陈东升: 中国寿险市场的现代发展

• 学苑聚焦 •

53 / 李京文: 知识经济为价值转化工程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56 / 有 才: 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研究新成果
——“全国第二届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综述

• 哲学 •

58 / 鲁克俭: 马克思实证辩证法初探

63 / 萧君和: 试论理论思维方式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

67 / 马中柱: 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规律性初探

·历史学·

- 73/ 杨式挺: 广东考古五十年
81/ 冷鹏飞: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的变革

·文学 语言学·

- 87/ 钱谷融与殷国明谈真诚
92/ 徐珂: 对《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
的商榷
99/ 张硕城: 论鲁迅与象征主义
——兼谈阿 Q 是象征型艺术形象
107/ 姚炳祺: 《说文》声训五则

·书评·

- 111/ 洗剑民: 中国饮食文化的又一力作
——评林乃燊教授新著《饮食志》

·学术动态·

- 113/ 孔庆榕: “建国 50 周年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研讨会综述
117/ 陈家义: 广东社科界讨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综述
120/ 陈永升 温春来: “宋代以前岭南的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121/ “海峡两岸跨世纪大学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召开
123/ 广东省第六次社会科学成果评奖揭晓 (1993—1998)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83846307

83846177

邮政编码: 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 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 7326

CN44- 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CONTENTS

No. 10, 1999

- A Look Back as well as a Forecast at the Transition between Centuries
..... Yu Youjun(5)
- A Noticeable Point of Historic Transition between Eras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Lei(18)
- Positive Development Needed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Li Benjun(23)
- A Review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Study in Guangdong Hu Shouwei(25)
- My Words about Doing Academic Research Li Jinquan(26)
- Language Study Developing Quickly in Guangdong Zhan Bohui(27)
- On the System of Sources Disposition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Li Zijiang(29)
- Analysis on the Facts of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Qu Xiao- e(41)
-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 China Chen Dongsheng(46)
- Knowledge Economy Has Prepared a Broad Foreground for Developing the
Study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Li Jingwen(53)
- Viewpoints from 'The National Second Forum on the Project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You Cai(56)
- An Approach to Marx's Positivist Dialectics Lu Kejian(58)
-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Methods for Chinese People
..... Xiao Junhe(63)
- Regular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herence of Chinese Nation
..... Ma Zhongzhu(67)
- 50 Year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Guangdong Yang Shiting(73)
- Change of the Situation of Commodity Economy betwee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 476BC)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 221BC) ... Leng Pengfei(81)
- A Talk about Sincereness between Professor Qian Gurong and Professor
Yin Guoming (87)
- A Query into the Paper 'On the Modern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Xu Ke(92)
- On Mr. Lu Xun and Symbolism - - - also concerning 'A Q' as a symbolized
figure Zhang Shuo Cheng(99)
- Five Passages of Sense Explanation Depending on Pronunciation in 'Shuo Wen
Jie Zi' Yao Bingqi(107)
- A Book Review on Prof. Lin Naishen's 'Notes of Drinking and Foods'
..... Xian Jianmin(111)
- A Report on 'Conference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 China and
on the Coherence of Chinese Nation' Kong Qingrong(113)
- Guangdong Academia's Viewpoints on the Problems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Chen Jiayi(117)
- Points from 'The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Chen Yongsheng and Wen Chunlai(120)
- A Report upon 'The Meet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Culture between
the Taiwan Straits in Next Century' (121)

世纪更迭之际的回顾与展望

——《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广东卷》绪论

□ 于幼军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 广东 广州 510082)

[中图分类号]K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10-0005-13

—

站在世纪更迭的时空交叉点上, 回望广东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 一幅浩瀚的历史长卷, 展现在我们眼前。

1949年10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诞生的礼炮声中, 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南粤。10个月后, 五星红旗在万山群岛上空高高飘扬, 宣告广东全境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通过开展接管、清匪镇反、清理基层、整顿队伍等一系列的工作, 新生的人民政权站稳了脚跟。随后, 农村土地改革运动, 城市民主改革运动, 迅速在南粤大地展开。历时两年多的农村土改和城市民改, 在农村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 在城市扫除了封建残余势力, 从根本上摧毁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结束后, 轰轰烈烈的“三大改造”, 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即在

全省展开。1956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 广东人民的命运从此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系列改造旧社会、创造新世界的伟大实践中,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南粤儿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 医治旧社会留下的创伤; 坚持和贯彻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经济建设, 在千疮百孔的“历史遗产”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53到1957年, 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粮食连年丰收, 由缺粮省变成余粮省; 工业迅速发展, 五年之间新增工业固定资产4亿多元, 超过解放前83年(1866—1949年)的总和, 1957年, 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30.44亿元。

1957年到1966年, 是我们党领导

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此期间,广东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广东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发生过严重困难。1960年冬以后,党中央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广东人民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十年,也是广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艰难前行的十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南粤大地。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发展阶段。

1979年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在广东试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在向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汇报时,请求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这一设想,邓小平同志还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试办的贸易加工区命名为“特区”,嘱咐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拉开了全国对外开放的序幕,吹响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进军号。

号角声中,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相继创办,并按照总设计师的构想,一天天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对外开放

的“四大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和改革的试验场。以放开物价为突破口的流通体制改革先在广州试点,随后向全省推广。改革分步进行,开始“放调结合、以调为主”,然后“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价格闯关。以大力兴办“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鼓励、扶植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农村经济改革,迅速在珠江三角洲全面铺开,开创出独具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在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实践中,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到1985年末,全省国内生产总值577.3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25元,工农业总产值778.05亿元,财政收入65.46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4.59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9.2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5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95元,而在1978年,上述各项国民经济统计指标则分别是185.85亿元、369元、286.14亿元、39.46亿元、27.23亿元、79.86亿元、412元和193元。

初战告捷后,肩负“杀出一条血路来”重任的广东人民并未就此止步不前,而是进一步扩大战果,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一是乘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列为开放地区的东风,顺势而上,建立包括28个市、县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同时将粤东、粤西一些市、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深化扩展对外开放。二是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制,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推广、铺开“以路养路、以水养水、以电养电、以桥养桥”等有偿投资举措,逐步建

立有偿使用的基础建设投资新体制。三是针对随着农村现代化水平提高而出现的新问题——人力、资金、土地分散化、零碎化的趋势,与农村生产规模经营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相矛盾,在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逐步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深化农村改革。四是迈出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在努力建构多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营运体系的同时,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伴随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步伐,到1990年末,广东的国民经济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迅速攀升到1559.0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2537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31.02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81.47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7.3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213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43元。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嘱托广东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同年,党的十四大召开,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广东力争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制定了“三个‘三’工程”,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民主法制机制、廉政监督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通讯和教育科技基础,实现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人口素质优化。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从1992年到1997年,全省人民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围绕“三个‘三’工程”,着力总结推广深圳、顺德和肇庆等地的经验,全面铺开产权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抓大放小”,深化所有制改革,带动金融、财政等方面的体制改革走向纵深,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随着深层次的

改革在新的地平线上铺展,南粤大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展现雏形,广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末,全省国内生产总值6519.14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512元,提前实现比1980年翻三番的目标。到1997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有增长到7038.24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10400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98.14亿元,财政收入543.9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07.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468元。

1998年的春天,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江泽民同志到广东代表团参加讨论,殷切期望广东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并提出了三个具体要求: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开放水平,交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份答卷。肩负时代重托的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从调查研究入手,根据广东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实际,形成了突出抓好“外向带动”、“科教兴粤”和“可持续发展”三大发展战略,增创体制、产业、开放、科技四个新优势的思路,提出了广东跨世纪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在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东经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在国内外经济形势相对严峻的情况下,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年末,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7937.2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1111.23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594.48亿元,财政收入636.6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48.5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527元。

风风雨雨50年,南粤大地谱新篇。50年前的广东,疮痍满目、百废待兴。

50 年后的广东,山河锦绣、万象更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以党的十五大方针路线为指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发挥全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沿着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广东就一定能够以崭新的姿态阔步跨入 21 世纪。

二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一名言,蕴涵了一个道理:回顾历史,编撰史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开创未来。

《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广东卷》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 50 年的风雨历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当我们跟随这部历史长卷,让那如火如荼的岁月,可歌可泣的往事历历展现在眼前,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领悟下述事实和道理: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在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前提。

建国以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广东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开展农村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从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奠定坚实的基础;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恢复和发展广东经济;经受“大

跃进”“左”倾错误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推进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十分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成功地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 年来,承担了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先走一步”历史重任的广东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下,率先创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开放广州、湛江等沿海城市,在全省地级市实行沿海经济开放区政策,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格局;在全国率先放开部分农产品价格,进行流通体制改革和投资、外贸、财税、金融等一系列改革,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率先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调整所有制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村股份合作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进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治省等方面的改革;进行科技、教育改革,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和文化产业化的道路……这一系列“先走一步”的举措,证明广东人民没有辜负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重托,没有辜负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江泽民同志“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期望。在短短的 20 年时间里,广东由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相对落后的省份,变成了经济社会最发达的省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园地,并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材料。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模式,在这个基础上,依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思想保障。

回顾广东 50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不难发现,我们党曾先后根据我国的实际,创造性地通过农村土改、城市民改,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创造性地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纠正“左”倾错误,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拨乱反正,创造性开辟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相应地带来了我国、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另一方面,在“左”倾思想盛行,不切实际地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在毛泽东同志基于错误的判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国、我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就受到严重挫折。上述事实 and 它们所展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揭示了同一个道理,那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模式,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基本条件。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和依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展开和具体化。没有前者,后者就无从谈起;没有后者,前者就是一句空话。广东建国初期的土改、民改实践和 1979 年以来改革开放、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建国初期,在轰轰烈烈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党政领导,结合广东华侨众多,城镇较多,工商业比较发达并且许多工商业者与港澳有密切关系,爱国民主人士较多等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如对 90% 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给予合理照顾,把一般的华侨地主与靠封建剥削为主的地主区别对待;“放反封建之手,不放反资本主义之手”,对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者,只割掉其尾巴,不要伤及他的四肢……是工商业财产,丝毫不动他的,等等。这些政策,正确运用了党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了少数最反动的地主,在十分复杂的形势和条件下,保证了农村土改和城市民改运动的顺利展开和完成。

1979 年,历史性的中央 50 号文件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中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后,广东人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风雨征程。历届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中央的要求与广东实际紧密结合,在几个改革发展的关键性时期,先后提出了“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打击经济犯罪坚定不移”,“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用足用活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三条方针;围绕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行“八个破除”的工作思路;推动改革深化,坚持改革政策“八个不变”的原则;围绕“力争 20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抓好“三个‘三’工程”,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

根本性转变的工作思路;围绕“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目标,突出抓好“外向带动”、“科教兴粤”和“可持续发展”三大发展战略,增创体制、产业、开放、科技四个新优势的工作思路。所有这一切,是广东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具体表现。20年来,正因为广东人民始终自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够冲破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进展。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5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了这一点,广东5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程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这一点。

坚持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战胜各种困难,不断向前发展的组织保障。

50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经历了一系列的严峻考验。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制度,以及各种反动势力,拼死对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对我国进行封锁、挑衅,企图将社会主义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左”倾错误倾向、三年自然灾害、当时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遭到重大困难;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进行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来自“左”和右两

个方面的干扰,阻碍我们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世界风云急剧变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特大自然灾害,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等等。然而,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省委和各级地方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广东人民经受住了这些考验,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医治了战争创伤;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只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走完的经济发展之路,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崭新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向全人类展示了社会主义、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50年来,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模式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曾经走过弯路;在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党员、甚至是党员领导干部,也因经受不住金钱、物欲和美色的诱惑而腐化堕落。但是,我们的党很快就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纠正了错误;通过加强党员的思想理论学习教育、党风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分子,保持了党的肌体健康和强大的战斗力。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加强思想理论学习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防腐防变能力,等等。

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既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民的夙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是广东人民在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中得出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广东一直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经济建设除轻工业发展较快以外,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对缓慢,1950—1978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只有5.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此以后,历届广东省委和广东省各级党组织,带领憋足了劲的广东人民,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20年来,无论国内外形势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不管社会上吹什么风,省委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把发展经济当作最大的政治来抓,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使各项工作紧紧围绕、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形势越是严峻,越是注意抢抓机遇,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正因为这

样,社会生产力始终保持了快速发展的态势。从1979年到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4.2%,工商、税收平均每年递增21.4%,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8.1%,即使在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和国内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的1998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也仍然达到了10%的增长幅度;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海关进出口总额、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多项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全国首位。20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和变化,使广东人民进一步坚定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由衷地赞同、拥护我们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辉煌前景充满信心。

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并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沉重的封建主义包袱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奴役使中国没有及时跟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从人民幸福、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美好愿望出发,对中国文化走向复兴和发扬光大寄予厚望。

50年前,毛泽东满怀豪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

界。”

20年前,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充满自信地宣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人民共和国的三代领导都如此重视创造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非偶然。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

回顾50年的历程,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并不平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以“除旧布新”为主题的新文化建设运动,通过大力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步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全社会的主导地位,在全国较快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这不仅促使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对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以后全

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期间,广东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和全国一样,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时间里,我们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在此期间,广东和全国一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崇高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精神和乐于助人的思想道德蔚然成风,涌现出舍身保护国家财产的革命烈士向秀丽等全国知名的英雄人物;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创造出了一批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如小说《三家巷》、《苦斗》、《山乡风云录》,电影《羊城暗哨》、《南海潮》,国画《江山如此多娇》,雕塑《艰难岁月》,等等。

然而,也就在这个期间,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想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建设渐渐脱离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忽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思想文化的区别,忽视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思想文化的区别,将只有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甚至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普遍推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用来要求和评价现实中广大群众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在全社会广泛推行,把公与私、义和利割裂、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个人对物质利益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漠视甚至压抑人的个性,等等;忽视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思想理论指导下,把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和文学艺术中存在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争鸣,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口诛笔伐,无情打击,最终酿成了名为“文化

大革命”,实则“大革文化之命”的悲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广东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因而较早地遇到了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題,所以在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方面,同样“先走一步”。

20年来,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道路是不平凡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积累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概括起来,最主要的就是两条:首先是历届省委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不动摇,不断克服纠正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抓物质文明的一手硬,抓精神文明的一手软的现象,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努力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 new 路子。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省委就明确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提倡有益的,允许无害的,取缔有害的,打击犯罪的”等具体的方针原则,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省委对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逐步深化,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探索精神文明建设的 new 路子。经过多年的探索努力,初步形成了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切合广东实际的一套思路和举措。强调贯彻“四个原则”,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又要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们的思想文化

状况;既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又要遵循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和方针原则;既要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和文化精神,又要善于对其进行改造创新,赋予时代内容;既要虚心学习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意识和文化的渗透侵蚀。坚持“四个结合”,即有所引进和有所抵制相结合,“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相结合,突击性行动与经常性管理相结合,扫除社会丑恶现象与清除党内腐败现象相结合。遵循“服务中心、以立为本、虚功实做、务求实效”的基本工作思路。建立健全“育、导、建、管”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运用多种形式的载体,使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内容相融合,渗透到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娱乐等活动和各种法规管理制度中去。

其次是坚持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先导,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关于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方针,注意防止和克服超越现实、搞“假、大、空”、形式主义的倾向,扎扎实实地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广东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推动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作为重要的任务,大力倡导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大力倡导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开放观念,大力倡导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鸣锣开道。不破则不能立,不立则不能彻底地破。“立”的根本,是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人民的

共同理想;邓小平理论,是当今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广东省在2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始终把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作为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精心组织实施“龙头工程”,重点抓好县以上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结合广东改革开放的实际,认真开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运用多种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宣传、普及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观点。

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判断基础上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过去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左”的做法和问题日益明显地凸现。面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道德失范”乃至某种程度上的“滑坡”,我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状况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通过编写《新三字经》、《社会公德四字歌》等一系列通俗易懂、既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又体现时代精神和要求的道德教育读物,普及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道德规范,从青少年抓起,从基本规范抓起,扎扎实实地推进道德建设;通过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正当求利、利义并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伦理,促进新的伦理秩序形成;推出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和高尚道德的先进典型,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见贤思齐”,逐步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准;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作为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推动社会道德新风尚的形成。

在文化艺术方面,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坚持“两为”方向和“双

百”方针,精心组织“文化精品”工程,推出一大批既弘扬主旋律,又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电影、电视、戏剧、歌曲、小说、美术作品。精心组织“文化艺术上山下乡”工程,丰富广大农村、山区人民的精神生活。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加强引导和管理,推动文化建设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

三

抚今追昔,心潮澎湃: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为我们的事业骄傲,为我们的党和人民自豪。

展望未来,思绪翩跹:我们的前景壮丽,我们的道路漫长,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清醒地看到,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曲折和艰难险阻,但我们决心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以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开拓进取,创造和迎接光明的未来。

1992年春天,已经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再一次到广东视察工作。他老人家目睹自己亲自确立的改革开放试验区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分欣慰,并赋予广东一个新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他说: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东要带头闯,再上几个台阶。同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用“力争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提法,再次向广东人民强调了小平同志赋予广东的这一历史重任。

1998年的春天,一直十分关心广东的改革开放探索,并曾亲自指导特区创办的江泽民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殷切期望广东人民在新的历

史时期“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并提出了三个具体要求: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开放水平,交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份答卷。

从1992年开始,力争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到2010年,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16700亿元以上(1990年价,下同),年均递增10.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20000元,年均递增9%;农业总产值达到1770亿元,年均递增5%;工业总产值达到42950亿元,年均递增14.8%,……

意味着2010年的广东将是:

——人民既有较丰富的物质生活,又有较高文明层次的精神生活,全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基本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生态环境优化;

——市场经济体制较完善,第三产业发达,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相衔接;

——高速公路连各市,一级公路通各县,二、三级公路通乡镇,铁路通大部分县,多口岸沟通世界,形成较为完善的陆海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

——程控电话网覆盖全省城乡,电话普及,信息网络沟通世界,反馈快捷灵敏;

——城市都有规模相当、设备完善的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镇村也有相应设施;

——社会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城乡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各类大学生占总人口的3%,人口素质有较大提高,就业机会较为充足,社会保障系统覆盖全省;

——政治民主,法制健全,治安良好,党政机关廉洁高效,政通人和。

这是一幅宏伟的蓝图,这是无比壮观的景象。她令人激动,她催人奋进。

然而,要使她在南粤大地上成为现实,广东人民任重而道远。

自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到广东视察工作以来,七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东省委两届领导班子带领广东人民努力奋斗、开拓进取,推动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了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由第一个十年转入第二个十年的重要时期。

世纪之交的今天,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关键阶段的广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国际上看,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加深、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变慢,使外向型经济占有较大比重的广东,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从国内来看,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全国已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各地改革发展步伐普遍加快,一些兄弟省市在改革发展的不少方面已经走到我省前面,我省原有的一些相对优势已不复存在或正在减弱。

从我省的情况来看,经济发展已由解决短缺、数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入追求质量效益、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稳定增长阶段,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体制改革已由点面结合、单项突进,进入整体推进、综合配套的阶段,体制创新成为改革的主题;社会发展已由满足人民温饱等基本需求,转向提高生活质量和追求社会全面进步阶段;20年高速发展中积累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因此,改革发展进入攻坚阶段,难度加大。

但是,我们也面对许多有利条件和

大好历史机遇: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日益增强的趋势,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为具有粤港澳三地合作区位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已有一定基础的广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体制、机制较活,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较强,山区和海洋资源丰富,20年来我省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为我们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体制基础。党的十五大制定了跨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宏伟纲领,江泽民同志对广东提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殷切希望,为我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省八次党代会贯彻党的十五大和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对我省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更是我们今天面临而过去不曾有过的有利条件和机遇。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机遇催人,稍纵即逝。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在跨世纪的征途中迈出新的、更大的步伐。

党中央赋予广东的跨世纪的历史任务,就是“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在跨世纪的征途上,围绕完成这一时代重托,我们一定要:

——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五大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的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和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的各项工作中来。

——继续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适应跨世纪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努力破除小进则满、小富即安的满足感,树立干大事业、求大发展、力争上游、不断开拓的创业精神;破除在困难面前无所作为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勇于探

索、在困难中抢抓机遇的意识;破除贪图享乐思想,树立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精神;破除粗放经营发展经济的传统观念,树立依靠科技进步、注重质量效益的新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破除“一手软一手硬”的倾向,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共同进步的思想。

——紧紧抓住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个中心任务,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突出抓好“外向带动”、“科教兴粤”和“可持续发展”三大发展战略。围绕三大战略的实施,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步伐,增创体制新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核心,以科技为依托,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增创产业新优势;进一步挖掘潜力,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增创开放新优势;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增创科技新优势,加快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更加坚定不移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着眼,提高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从思想认识到工作部署,都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它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氛围为目标,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把握人民群众思想观念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为跨世纪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群众普遍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如社会治安问题、黄赌毒问题、脏乱差问题等等入手,以外学上海、内学中

山为途径,以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小区为载体,推动全省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广泛和深入开展,使全省的社会环境有一个大的改善,社会文明程度有一个大的提高;围绕实施“科教兴粤”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促进劳动者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切实抓好民主法制建设,提高依法治省水平,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人口的关系,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控制人口摆到重要的战略位置,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根据跨世纪改革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在跨世纪的征途上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围绕承担领导跨世纪发展历史重任这个目标,切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中造成勤奋学习的风气、开拓进取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维护团结的风气和清正廉洁的风气,同时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科学决策、驾驭全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努力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途径,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把全省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能够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群众开拓前进的坚强战斗堡垒;继续深入持久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勤政廉政,为民谋

利;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不断增强在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能力。

广东 50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和经验,特别是 20 年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程和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抓好以上五个方面,那么,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无论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多少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都一定能够再创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辉煌,以崭新的姿态阔步迈向 21 世纪。

回顾 50 年,不仅要真实地再现 50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20 年的光辉历程,更要总结 50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 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5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20 年的宝贵经验,是为了在 50 年、特别是 20 年辉煌历史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再创新的辉煌。

辉煌的 50 年已经载入史册,更加辉煌的 50 年正在我们跨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步展开。展望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我们对广东的前途充满信心! 有 50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 20 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的坚实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基础,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 7000 多万南粤儿女同心同德的努力奋斗,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再过十多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广东将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到那时,我们可以更加自豪地告诉世界:我们这一代广东人,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

划时代的伟大历史转折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

□ 张 磊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620)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社会变革 历史转折

[摘 要] 本文作者回顾了 1840 年以来中国人民为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斗争与探索, 重温了新中国缔造艰难的历程, 指出新中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及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1999) 10- 0018- 05

在新世纪来临的前夜, 中国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50 华诞。

对于绵长的中国历史——特别是百余年来的进程而言,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 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人民中国的诞生、存在和发展, 显然又构成 20 世纪人类社会剧烈变革的主要内涵之一。

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 充分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

历史的回顾和反思, 令人受益匪浅。重温新中国的缔造维艰的历程,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阐述历史教育的重要意义时所指出的: 大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从而, 使我们更为自觉地承担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使命。

—

以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起点, 古老的中国从封建末世进入近代阶段。然而, 新时期历史舞台帷幕的开启并非由于社会生产力的突变或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 却是为了一场肮脏的英国侵略战争所拉动, 致令外烁作用深切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内涵和趋向, 使之循着一条充满窒碍、顿挫和牺牲的途径坠落于悲惨的深渊, 形成一种畸变的、过渡的社会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资产阶级总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个世界”。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阳光下的地盘”业已分割殆尽, 对殖民地附属国掠夺超额利润愈益成为宗主国生存的必要条件, 它们就力求“为自己”而使不发达国家沦为附庸。自诩为“西方文明使者”的入侵虽然加速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经济的分解, 但又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化的同

时,中世纪状态依然牢固植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外国侵略者与国内统治者逐步结成联盟。清朝政府在它的末期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民国”时期的各色反动统治者莫非列强的“鹰犬”。没有真正的独立,缺乏起码的民主,贫困而又落后,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互关联的基本特征。中国人民并未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如同马克思剖析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时所指出——“获得一个新世界”,因为“新的社会因素”得以结成“果实”的前提是人民挣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

显然,任何进步的、科学的变革理论和实践必须以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基本依据,反映社会的主要矛盾,把握亟待解决的中心课题——独立、民主和富强。与此同时,先进的代表人士还必须向西方寻求真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缺乏及时产生完整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和条件,致使他们不得不对西方的进步思潮采取“拿来主义”:先是引进完整民主主义,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从准备阶段入于正规阶段;继之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严峻的事实是,拯救和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应须分作“两步走”:第一步为民主革命,第二步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民主革命又分为两个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步走”和攀越三阶梯,是为一个半世纪来的中国革命的阶段划分和持续发展的历程。既不可能超越,也不应当停顿。

历史证明,舍此别无它途。

二

为了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备受欺凌压榨的中国人民的首要任

务就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一切真正的社会变革必须以之为其内涵,任何进步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应需承担这桩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承担者分别作出了答案。农民阶级提出了朴素的斗争纲领:“灭洋”和“扫荡胡尘”,为其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民族压迫的口号;以具有某些平等因素乃至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治观念,向封建专制主义作了冲击;用农业社会主义描绘了一幅社会经济的乌托邦图景,实际上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采取了否定态度。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高峰的斗争,则是他们的英勇实践。尽管农民阶级给予了侵略者和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但历史的局限使得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存在严重的缺陷,不可能完成自己提出的“革故鼎新”任务,难免以悲剧告终。

资产阶级维新派广泛传播了社会变革观念,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内涵:“变法而强,守旧而亡”——把拯救民族危亡归结为“变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改革以君主立宪为准则,要求制订宪法和召开国会。文化方面的举措,显示了仿效西方的倾向。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则希冀经由工业化而致国家于富强。维新志士们的呼声形成了一场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戊戌变法则他们付诸实践的尝试。同样,历史的局限在他们的言行中烙下了鲜明的印记,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显示出软弱妥协的倾向,堪称为“跪着的造反”。因之,他们的事业仅仅昙花一现即为顽固派政变所腰斩。

毫无疑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民主革命进程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他们提出了带有共和

制度要求的民主革命与近代化纲领——三民主义,更为自觉地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是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同时,“反满”、推翻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统治,则是清末时期民族主义的突出内容,并以“五族共和”等构思作为“民国”建立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民权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国民革命”乃是途径和手段,与此相应,则是关于政体的详尽擘划。民生主义以土地与资本为轴心,提出“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案,力争在近代化——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避免负面的后果。为了实现在当时堪称最进步和科学的构想,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不懈的奋斗,组织革命政党,开展武装斗争。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帝制,形成了一场政治思想的启蒙运动,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开辟了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主要是他们较为切实地从国情出发,从西方引进了完整民主主义,开拓了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道路。他们摒弃了农业社会主义、皇权主义以及君主立宪方案,抛却了妥协倾向及其各种表现,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由于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而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异常软弱”,缺乏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和性格,未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张,没有广泛深入地宣传和组织群众,致使辛亥革命也以失败告终。受到冲击的旧制度迅速在新形式下恢复,从袁世凯以降的形形色色的反动统治者,都是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的代表。面临着严重逆转的形势,孙中山和他的忠实战友们坚持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为捍卫共和制度而艰苦奋斗,但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两次护法运动已是强弩之末,无力回天。孙中山在迭遭失败的时刻迎接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尽管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已非革命的盟主,但与时俱进的孙中山和他的忠实战友们再立新功。正当革命风暴从广东向全国扩展的时刻,积劳成疾的孙中山非时逝世。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的遗言既是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后继者的希望和召唤!

三

历史的停顿和逆转,只是暂时的现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新阶段。辛亥革命后的惨澹的社会景象——袁世凯帝制自为,废帝复辟,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等等——令人失望,但也促使先进人士锲而不舍地求索。战士的步伐从未停顿,人民切盼真正变革的到来。毛泽东曾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精确地概述了这个阶段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苦难和变化的历程:“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事实正是这样。以五四运动为发端,新文化运动开始深化并转变为引进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启蒙运动。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一批骨干和许多追求真理的青年,从民主主义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代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中坚力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经验,深入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去,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革命面貌由此焕然一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为了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次民族解放战争。革命历程起伏跌宕,高歌猛进与曲折顿挫并存:既有大革命的澎湃浪潮、土地革命的深入农村、抗日战争的全民奋起和解放战争的凯举行进……;也有“4·12”政变、五次“围剿”、皖南事变和全面内战……。面对着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统治者的反动联盟,处于十分复杂剧变的形势下,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方能引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显然,科学的纲领具有关键的意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从幼年阶段进入成年时期。作为全党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则是无与伦比的。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党和人民得以摆脱了在黑暗中摸索的境况,避免了重大的挫折和失败,在并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基本胜利。全部历史进程证明,毛泽东的科学论断是无可置辩的。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体系中,关于国情的正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他集中了党和人民的智慧,确认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六个主要特点,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只有辨明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涵,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则是“革命的骨干”;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但“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高度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

新式民主革命。

还须指出,毛泽东认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途径。武装斗争乃是革命的主要形式,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为了推翻武装到牙齿的反动统治阶级,只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同样,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迂回途径,“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所以如此,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和反动统治势力盘踞着中心城市,而在农村的控制比较薄弱,加以那里幅员广阔,许多地区的农民经受过革命的洗礼。因之,共产党人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作为民主革命主力军的广大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包围并最终夺取城市。毫无疑问,这是革命胜利的必由的、可行的途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既是立足于20世纪中国的土地上,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农民问题、资产阶级问题、革命的形式和途径问题、革命的转变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上,更是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沿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奋勇前进,克敌制胜,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篇

章,并对人类进步事业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不愧为20世纪的巨大事件之一。

人民中国的建立,无疑是一个新的开端。民主革命的基本完成,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革命必须深化,建设应当拓展。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可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由于这是一桩空前宏伟的社会系统工程,进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令人欣慰和庆幸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在毛泽东逝世后,他的亲密战友、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承担起未竟之业。邓小平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的理论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引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潮,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获致了举世瞩目的长足发展。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正在为完成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奋斗,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屹立在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50年,定会更为辉煌! ●

责任编辑:郭秀文

社会科学五十年

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 李本钧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广东 广州 510610)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全国人民一道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50 华诞。

回顾过去,峥嵘岁月,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深深感到: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民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够繁荣和发展。建国 50 年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 20 年中,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紧跟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以其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调研成果为广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可以说广东 20 年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功不可没。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深感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党和人

民对社会科学事业寄予了殷切的厚望和重托。江泽民同志在 1992 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座谈时指出:哲学社会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更加强调:“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这些充分肯定了哲学科学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世纪之交的今天,世界发展面临着知识革命的新趋势、综合国力竞争的新格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深层次的变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这种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全新的历史课题和严峻的压力挑战。压力与希望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哲学社会科学正恰逢繁荣发展的时代条件和空间条件,时机很好,大有可为。

面对时代的召唤,面对党和人民的

重托,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肩负起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迈向新世纪。

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必须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因此,要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事业,就必须首先坚持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自觉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

要繁荣发展社会科学,就必须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为主攻方向。”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要求:“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上述“一个中心”、“两个服务”、“三个着眼于”,是党和人民向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庄严历史任务,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一切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升华。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改革的深入发展呼唤着理论的创新。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实践中每前进一步,都有不少新的问题和矛盾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解决。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勇于迎接时代的挑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积极探索、研究、发现、并不断总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规律,进一步开展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不断地为解决前进过程中的重要现实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做出贡献,不断地为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环境。并由此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自身的繁荣和发展。

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绝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是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的基础。因此,要高度重视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与此同时,基础理论研究必须始终关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世界的变化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尤其是加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意义的重大课题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妥善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历史研究与现状

研究、国内问题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传统学科研究与新兴学科研究、地区问题研究与全国性问题研究、重点学科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等等。总之,要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和促进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现实问题研究,努力使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站在世界科学探索的前沿。

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就必须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化,深化科研体制的改革。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社会科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等各方面都会出现新的转变。如果不改革原有的科研体制,就不可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不可能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和人才,从而也就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21世纪的大门即将开启,21世纪的脚步日益临近。它犹如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犹如浩瀚沧海中的一艘航船,桅杆尖头依稀可见。让我们以加速建设共和国现代化美好未来的崭新风貌,以再创社会科学事业新辉煌的昂扬姿态,迈向新世纪! ●

责任编辑:冯 生

广东史学发展的一点回顾

□ 胡守为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50年来,广东史学界有了重大的变化,下面仅就史学思想方面作一简单回顾。

新中国成立之时,广东拥有一大批颇富盛名的专家和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学人,他们分布于史学各不同的领域,除广

东土生土长的外,有来自北方著名学府,有刚从国外留学归来,学问根底不同,学风也不一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是为学术界的通病,其中有个人修养的问题,有互相沟通的问题。时值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新旧思想也不免有所9 悟。在此革命大变革时期,党对知识分子做了许多团结教育工作,为此后广东史学界的团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广东史学界的团结,首先是思想比较一致,即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为繁荣我国史学而共同努力。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曾引起社会史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深入,也影响及政治史、经济史等方面。应该说论战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少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革命胜利后,人们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尽管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不同,但不妨碍相互间的切磋。间亦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批判,也会得到谅解而未影响团结。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偏向,有的人不肯在这门精深的学问上下大功夫,而是选择最便当的方法,把史料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辞句上套,即所谓贴标签;或将某些理论不加分析,不顾时间地点,原原本本用到中国事物上,即所谓教条主义。这就违背了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支流,是学习新鲜事物中难免的现象。

到了“四人帮”猖獗之时,大搞影射史学,广东也曾掀起了一阵波澜,除了个别别有用心者外,也使少数史学工作者走入迷途。批判“四人帮”,影射史学也

同时遭到批判。影射史学是打着史学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旗帜大行其道的,其实影射史学所作所为是任意歪曲历史,为“四人帮”要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服务,根本无科学可言。由此,却使人对历史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但云雾不久便被拨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各条战线上洋溢着改革开放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给史学工作者以启发,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只摘录经典著作的已有成果,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才能不断创新。此外,史学为现实服务,就应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或借鉴。改革开放也使一些西方学术思想广泛传播,其中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理论,但同时西方思想不加分析、满足于引用一些辞句新的贴标签现象,也是发展中难免的弊病。

在此期间,一批联系改革开放以至祖国统一的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出版。

展望新的世纪,广东的史学工作者将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广泛吸收人类文化精华,随着世界潮流的发展,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在史学研究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郭秀文

对开展学术研究的一点感言

□ 李锦全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前些年来,社会上隐约传出两句话:文科无用论,文科危险论。广义的文科

应该包括社会科学,所谓“无用”大概相对于应用学科而言,因为基础学科很难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至于“危险”,有人说自然科学在实验中无论失败多少次,最后成功还是得到肯定;而社会科学的文章一次出错,受到批判后就难以翻身,严重的甚至给人身带来政治风险。与此相联系,社科类理论文章较难作出评价,有时甚至“早晚时价不同”,往往随政治风向而定。亦有人称之为风派文章,难有持久生命力。

正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评价上有点是非难定。同是一篇文章,有人作高度评价,有人可以说是狗屁不通,本来有正常不同意见也无不可,但由于偏见以至个人恩怨起作用,就难以得到公正的评价了。近来有的高校对教师评职称、研究生申请学位,要求有科研成果在刊物发表,可能评审论文质量难度大,于是用刊物等级来界定,有的要求发表论文的地方是核心刊物,有的规定在重要刊物,也有分成国家、省、市不同级别的刊物,规定不同的分数,即是用量化来界定科研成果。此外还有转载率的问题,如在《新华文摘》或人民大学资料中心转载,亦作为衡量质量的标志。

用以上这种量化的方法,无论在所谓高档刊物发表的论文,或是在所谓权威文摘刊物转载、摘引,并用统计数字排队,以此界定社科研究成果的大小,我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难道在所谓高档刊物发表的文章一定高人一等吗?

对一个刊物发表文章质量的高低,与编辑人员特别是主编的政治、业务水平的高低有较大关系,亦不排除有时受个人偏见或不同观点的影响。其实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是作者文责自负,除牵涉到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外,学术问题的是非就应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进行讨

论,不能以编辑部或主编的个人好恶作为登载文章的标准,但亦不排除出现这种情况。如近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出现一股称之为告别革命的思潮,如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被说成只干着杀人如麻和破坏生产的坏事。当然既然是武装暴动,杀人和破坏总是有的,但不是太平军一方干的,曾剃头的湘军“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谭嗣同据金陵父老的反映),揭露这方面的驳议文章,为什么又不给发表呢?还有吹捧慈禧新政,还给她戴上如措施得当,可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桂冠。发表这种学术观点当然是可以的,但写有不同意见的文章,鉴于这家刊物的倾向性,于是只好投寄到山东《文史哲》发表了。

顺手写来,不成腔调,有点前言不对后语,也算是对“社会科学五十年”专栏发点杂感吧! ●

责任编辑:冯 生

广东语言科学在飞跃发展

□ 詹伯慧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建国 50 周年前夕,广东学术界喜气洋洋,各个学科都在欢庆几十年来的辉煌成就。深具广东特色的中国语言学界也不例外。他们胸怀大志,不断结合广东实际,开展卓有成效的语言文字研究工作,并培养出一批批专业人才。特别是近 20 年,乘改革开放的春风,更是大踏步前进,取得了以下骄人的成就。

一、广东丰富多彩的语言资源得到较好的开发,调查研究省内各地方言的风气遍及全省。广东是我国方言最复杂

的地区之一,全国七大方言中,广东就拥有其中的粤、闽、客家三种,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此外,还有粤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粤北、粤西一些未知名的方言土语。然而,以往很少有人着力进行调查。近 20 年来,广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我省语言资源的开发,连续几个全省社科研究“五年规划”都把广东方言的调查研究列为重点课题,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更是一贯把方言的调查研究视为体现广东特色的重大研究项目。在省社联、省中国语言学会的领导组织下,一些学府如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汕头大学、广州师范学院等,都不乏有志之士长期埋头于方言的调查研究,可谓乐此不疲。暨南大学以詹伯慧教授为首的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原汉语方言研究室)从 80 年代中便着力于我省方言的调查和方言研究人才的培养。暨南大学 1984 年开始培养汉语方言硕士生,1990 年设立以培养汉语方言高级研究人才为主的现代汉语博士点。十多年来,他们的大面积方言调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等共约 500 万字的调查研究成果,被誉为广东方言研究史上的空前突破、新里程碑,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屡获国家教委、省社科界和省高教厅的优秀成果奖。地处粤东的汕头大学,近几年异军突起,组织力量开展潮汕地区的方言调查,也已取得不少的成果。在大力开展方言调查的同时,一批方言研究的专著也陆续在我省诞生。如李新魁等的《广州方言研究》、麦耘的《音韵与方言研究》、林伦伦的《澄海方言研究》、施其生的《方言论稿》、陈晓锦的《东莞方言说略》,以及潘家懿对海陆丰方言的研究、

张维耿、林立芳等对梅县客家话的研究,还有一批以方言志形式出现的方言著作,等等,既有大面积的全面调查,也有深入开挖、精心发掘。

二、古文字研究成绩斐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广东拥有两位在文字学界举足轻重的大学者——容庚教授和商承祚教授。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北迁时,容商二位都留下来了,为广东的文字学研究,特别是古文字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国家学位委员会早在80年代就通过在中山大学建立以容商二位为博导的汉语文字学博士点。其后,这个博士点又增加了张振林、曾宪通两位博导。近年,随着博士点内涵的拓宽,李新魁、唐钰明两位教授也先后加入到这个点的博导行列中来。近十几年来,中山大学在文字学,特别是古文字学方面不断推出研究成果,在海内外的名声越来越大,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此外,来自北方的著名文字学家梁东汉教授,自从80年代进入汕头大学以后,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文字学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三、广东近20年来,在汉语语言学的其它领域也取得不少的成绩。现代汉语方面,语法修辞的研究硕果累累:沈开木、唐启运、陈垂民、黎运汉、傅雨贤等教授的著述在语法修辞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音韵学、训诂学等传统“小学”的研究,也有不少著作问世,如李新魁的系列音韵学专著,孙雍长的训诂学专著,唐启运、周日健的虚词专著等,都显示出作者的学术造诣。李新魁教授学贯古今,著作等身,在我省语言学界享有盛誉,可惜未老早逝,离开我们太早了,实在是广东语言学界的重大损失。

四、广东中国语言学界紧跟广东现

代化建设步伐,联系社会语言环境,联系语言实际应用,不断开拓语言研究新领域,也作出了显著成绩,突出的表现有:

1、积极配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规划和部署,大力支持广东的社会语文工作,在“推普”和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中贡献颇多,自80年代以来,广东省视听传媒推出了一套又一套的专题节目,省、市语委举办了一期又一期语言文字工作干部培训班,广东省的语言专业人士莫不主动承担任务,获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2、面对语言应用多样化的现实,基于对共同语和方言并存并用而有主有从的认识,从80年代中期,我省语言学界便开展了“双语双方言”的调查研究。由深港语言研究所陈恩泉教授倡导主持的两年一度的双语双方言国际研讨会引起海内外关注,研讨会已在深圳开过六届,越开越好,每次会议都出版一本论文集,被评价为: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在深圳悄悄崛起。

3、从社会应用的需要出发,编写了不少深受欢迎的工具书和教材。虽然有的作者并不熟谙粤语,也非粤语研究行家,只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也动起笔来。这类粤语书籍质素不佳,受到语言学界及广大读者的非议和抵制,自是意料中事。但在这股“粤语风”中出现的粤语出版物,不少是内行人如陈慧英、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麦耘等粤语专家编写的佳作。这里附带一提,一批粤港澳语言学者共同编撰、由詹伯慧教授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经过将近十年从审音到编撰字典到出版的艰苦历程,在专家和出版社的齐心协力下,现已进入排印校对的最后阶段,可望近期和读者见面,也许可作为粤港澳语言工作者献给国庆50周年的一份礼物吧! ●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系统

□ 李子江

(广东工业大学工商管理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90)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系统 资源配置

[摘要] 本文根据系统的结构功能原理把资源配置系统分成三个子系统, 经济资源层次、组织资源层次和政治资源层次。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系统进行了质量评估, 认为我国目前经济资源配置已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 组织资源配置正处在开始正常运作状态, 而政治资源配置则刚刚启动, 从完整性上看, 整体优化效果并不理想。

[中图分类号] F2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1999) 10- 0029- 12

一、分层资源配置系统与系统的提升

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的稀缺性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土地、劳动、资本是基本意义上的经济资源。因为它们进行生产不可缺少的因素, 因而它们又是生产要素, 缺少它们就无法进行生产。但是, 这并不是原本意义上的稀缺性, 稀缺性是与人类的无限需求相对而言的, 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 社会的资源总是稀缺的, 所以人们才会考虑如何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 考虑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经济学正是研究稀缺资源最优配置的一门学科。

但是, 仅作上述的理解是不够的。从系统观看经济学问题, 经济系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系统, 它按照最优配置方式组织商品生产, 提供服务, 以及对商品和服务进行交换、分配、消费, 就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发生关系。同时, 在经济系统与非经

济系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任何一件事物, 要么是经济系统的一部分, 要么就与经济系统有着重要的联系, 所以经济是一个分层的、开放的复杂性系统。

若仅以经济系统内部来看, 经济中的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之间, 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就出现组织与协调问题。除此之外, 为了使生产组织有效地运转并给生产提供刺激, 还必须建立一套详尽的权利体系并付诸实施。这些法规规定了人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得到和使用投入、商品、服务和环境, 以及人们之间正常的秩序: 什么人, 在什么条件下, 可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情。可见, 经济中不但存在着生产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 还要在人们的需求(或欲望)与权利之间作出调整, 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性。由此我们推知, 层次性是资源配置方法的一种基本属性, 一旦具有分层性, 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显然是按层次进行的, 这种多层次的资源配置过程就构成了一种资源配置系统。在资源配置系统中, “资源”的概念将得以拓广, 不但基本意义上的土地、劳动、

资本等是稀缺资源,组织的有效知识和管理技巧,甚至人在集体或社会中的权利也将纳入稀缺资源的范畴。这样,资源配置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原来意义上的经济资源,组织(管理)资源和权利(即政治)资源也将作为广义的资源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对象。于是,我们将会看到,资源配置系统的层次是逐步提升的,处在最低层次的是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其次是组织资源的配置过程,最高层次就是权利或政治资源的配置过程了。这不但体现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更重要的是表征了资源配置系统的完整性。只有全部的资源都达到最优配置,这个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以列表形式给出经济中资源配置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表 1 分层资源配置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成分 层次	资源 种类	机制形式	具体关系	决策性质	系统 本质
低	经济 资源	• 价格机制	• 价格与 数量	理 性	自发
		• 预期机制	• 价格与 数量		
		• 增长机制	• 成本与 收益		
中	组织 资源	• 激励机制	• 团 队	相互依 赖性	自主
		• 治理机制	• 委 托 代 理		
高	政治 资源	• 集体选 择机制	• 个 体 意 见 的 整 体 表 达	限 制 (个 体 理 性 与 集 体 理 性 冲 突) 理 性	顺 应

二、经济资源配置层次与机制

在经济资源配置层次上,至少有三种机制在起作用,即价格机制、预期机制和增长机制,它们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

作为对价格机制的具体刻画将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微观经济寻找一套理论结构。

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现在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即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规范市场行为,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按照这一精神来规定中国微观经济研究的目标体系应该是相当明确的:资源是稀缺的、有限的,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利用那只“看不见的手”得以实现,因为这是信息利用量最少,价格最低,效率最高的机制,即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价格机制的作用,消费者在消费选择中寻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生产选择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完全竞争的经济在资源配置系统中实现帕累托最优化,前提是经济主体的决策是理性的。

按照这套理论标准去寻找中国市场经济的形式化结构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就价格机制的具体关系描述而言,与西方现存的相当成熟的微观经济理论应该是相通的。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建立完善的价格机制的过程中,就应该充分认识到价格机制的运转效率是受制约的,不是十全十美的,并且从其价格机制自身的角度来审视,也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才能使价格体系充分地发挥效能。比如说,人们必须首先确定财产的所有权,这将涉及到制度分析,特别是公有制下产权的界定;其次,价格机制只有当双方的交易量都不很大,任一消费者、厂商的决策都不足以单独影响价格的情况下才能凑效。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在自由价格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公司都明显地可以左右价格,甚至可以操纵价格;再有,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很难保证经济主体的决策是出自于理性,要构造这种行为的理论模式则要困难得多。

价格机制对人的惩罚也是无情的,当某种生产过程如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

境与气候条件的制约,价格的暴涨暴跌会给某些生产者的收入产生重大的影响;技术创新使一些企业技术设备变得陈旧或原有设备价格骤降,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期货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而不是由个人或企业来承担风险。这些不利因素所形成的实际问题是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研究所不能忽视和回避的。

作为预期机制的具体刻画将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寻找一套理论结构。预期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政府不直接介入市场活动,只提供有效的公共货物供给。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政府参与经济的问题在理论上应该是相当明确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有效性和可能性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政府的政策通过市场力量来操作似乎比通过控制性和命令性的行政手段来执行更为成功。企业生产私有货物,政府提供公共货物,在市场中,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政府的行为也应该符合经济人的行为标准,同样应遵循最大化原则,以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

市场的有效性是预期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有效的市场就是那种能够有效地处理信息的市场,在有效率的市场上,价格充分反映了可利用的信息。个人、企业、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利用一切有关的、可以获得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来形成他们可能的最优预期。简言之,有效率的价格就是预期均衡价格。

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要利用古典经济理论作为基础,把预期机制的理论结构建立在最优化的市场行为和供求均衡这两个假定前提之上,根据理性预期建立起可以显示经济周期

的主要特点的理论模型。由于这种预期机制在逻辑上是前后一致的,是坚实地建立在共同所认可的经济原理之上的,因而会是具有良好的构造性和仿真性。

当经济主体在可利用的信息发生变化时会改变他们的决策,这就为一个变化中的动态经济建立最优化理论提供了一种背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特征是动态的,因而建立一种动态的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应是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预期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经济主体对于一项新的政策能够并且确实作出了反应。但是,当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时,还没有人能够较多地知道经济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典型的做法是,在理论上假定政府对经济周期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比其它经济主体了解得更多、更快。这意味着政府将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或稳健的经济政策。尽管什么样的稳定经济政策为最优仍然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种一般性的分析方法:政府应该规定经济博弈的规则,即制订政策和规章制度,以便让个人、企业知道可资利用的机会是什么,了解自己的决策可能产生的结果。例如,政府应该把税收政策确定下来,支出政策应该事先宣布并加以说明,有关金融市场的规章制度和管制条例应该明确公布并相对保持不变,有关破产、兼并的条例和规章更加需要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以便那些未来的公司或企业事先知道从事某项投资或生产活动将会遇到什么样情况而避免不明前景而陷入困境。货币政策应该保持一贯“中性”以求经济环境的“镇定”。有效的市场运行需要为消费者、生产者提供大量精确的信息及服务,政府作为市场规则的制订者当然具有重要作用,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就恰如裁判员在运动场中,可以作出裁决而不需入场拦截传球。这将做为理想政府的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加以研究。

作为增长机制的具体刻画将为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寻找一套合适的理论结构。长期保持增长的内在机制是什么?现代西方数理经济学关于生产函数性质的研究表明,生产函数具有三种类型:收益递减型、收益不变型和收益递增型。据此,我们可以把现有的较为成熟的经济增长模式分为三类: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收益递减型模式,因为它假定资本是唯一决定增长的因素,但由于随着资本量投入的不断增长,资本的边际收益将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索罗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收益不变型模式,因为它假定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但技术进步又会产生递增的收益,两者相抵,规模收益不变;罗曼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收益递增模式,因为“如何制造产品”的知识(一般性知识和专业化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以教育年限为度量)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也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

从微观上看,对于个别厂商而言,递增的收益将形成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成为新产品研究和开发的资金来源,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在长期内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以及不同企业在利润增长率上产生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国际经济上看,国际间的贸易不仅促进了知识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散,而且通过新技术的引进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效率。同时,由于直接引进新技术而节约了本国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从而也就间接地增加了国内的资本积累。上述两方面的共同效应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并且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递增的增长机制在我国,特别是在沿海开放地区与省份已经在起作用,并逐渐走上经济增长的“高速公路”的正常轨道。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近20年得以持续发展,所以,制度因素将作为我国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成为热点,因而在这里可以提而不述。

文化禀赋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因素应该纳入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在我国,包括传统习惯、价值观、人际关系、伦理意识在内的“文化禀赋”曾经对经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作用。例如,由革命战争时期逐渐形成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曾经成为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以劳动代替资本,靠肩挑手推修建水利灌溉工程,直到现在这些水利工程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能够调动固有资源以形成基本的资本,为最早建立的年青共和国提供最初的资本金。这种文化禀赋甚至可以使广大农民承受为了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始资本而采取的价格“剪刀差”政策所造成的长期勒紧裤带的巨大压力,为建设初步完善的中国工业体系作出无穷的贡献。这是文化禀赋积极作用的方面。这种积极的作用还表现在它可使制度变迁的某些形式能在较少代价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其中包括降低解决冲突在内的制度变迁代价,而把重大的代价转加在其它方面。

文化禀赋也可能成为技术或制度变迁的障碍。我们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火药、纸、指南针、印刷术和许多其它在当时古代非常先进的东西。如果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更重视征服自然而不仅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完全有可能成为在经济上最发达、在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了。在文化、道德和伦理方面一直处于非常丰富地位的我国,这种丰富的文化禀赋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对经济发展有益,什么情况下不利,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考察上述诸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基础上,我国自然就得到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均衡模式(见图1),这一考虑了文化禀赋在内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优点在于,第一,它有助于我们判断未知方面。理论上,人们构

造资源禀赋和技术革新之间关系模型的知识能力, 以及对其进行验证的能力相对来说会强一些, 而构造文化禀赋和技术革新之间或文化禀赋与制度变迁之间关系的模型, 以及对其进行检验的能力则相对来说会差一些。明白这些就使得我们心中有数, 避免得出失之偏颇的结论; 第二, 它有助于我们着手进行其它方面的尝试来说明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并判明何为重要因素, 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不能分析这种演化的历史; 第三, 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革新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而不是从资源、技术、制度到文化方向或反向这样线性地运行, 这使得把文化禀赋的作用结合到经济增长分析之中和结合到制度设计与改革方案的设计之中至少在理论框架上是合理可行的。这就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之中的资源强迫动员, 逆向替代(劳动替代资本), 强制的但是自愿承受式的原始资本积累现象, 以及渐进式的经济制度变迁改革, 特区开放为先导逐渐推移或增加市场机会的制度变迁现象, 这无不依赖于传统文化影响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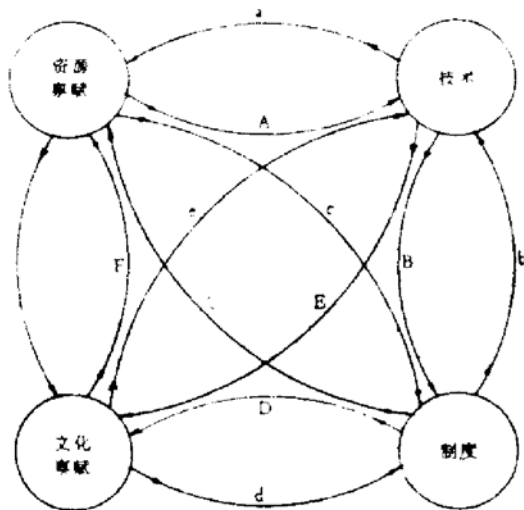


图 1. 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之间均衡发展模式

三、组织资源配置层次与机制

正如 H·A 西蒙所指出的,“市场只是人们用以在个人层次上实现理性行为的机制之一”, 而组织则是“一个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沟通与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式”, 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组织被当作市场的对立物与替代物, 组织的等级机制与市场的价格机制不同, 如果说价格“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机制”, 那么等级则是一种减少知识使用的机制。

从决策劳动分工的角度看, 组织不只可用权威、命令结构来描述, 更重要的是, 组织是人类认知能力不足的产物。按照西蒙的说法, 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欲求成为理性的, 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地理性的”。由于人在神经生理和语言方面能力的局限性和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使得人们在理解、解决复杂问题和处理信息方面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意味着, 任何一个人的决策劳动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 一个决策者所能管理的只是有限的经济范围。等级制决策劳动分工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作为上层的决策者的决策劳动能力是有限的。其次, 每个决策者的决策劳动能力的有限性表明这种劳动能力也是一种必须节约使用的稀缺资源。第三, 人与人之间的决策劳动能力并不是同质的, “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 正是指作为将帅的那种决策劳动能力较之作为士兵的决策劳动能力具有更高层次的稀缺性。因此, 节约较为稀缺的资源以便只用在非使用它不可的地方。等级制决策劳动分工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将稀缺程度不同的决策劳动能力作不同用途的有效配置, 以达到节约使用决策劳动能力这种稀缺资源的目的。

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 威廉姆森指出, 在经济活动中, 人总是尽最大可能维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 人不但是自利的, 而且是会损人的, 只要能够达到利己的目的。因此, 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而利己, 威廉姆森把人的这种行为称为机会主义 (opportunism)。人的机会主义本性直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因为在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还

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每一方都不知道对方是否诚实,都不敢轻率地在对方提供的信息基础上作决定,而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核实、调查。这样,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将使交易费用增加。一笔交易越复杂,交易的费用就越高。因此,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就必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由于组织具有认同的作用,组织就可以减少或替代机会主义行为。由此可见,人类机会主义行为是组织存在的一种基础。

这样,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两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威廉姆森提出了“契约人”的概念,以示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相区别,并将它作为研究经济组织的起点。由于人们总是希望具有完全理性,才产生了节约稀缺决策资源的取向。又由于人们实际上只具有有限的理性,才给经济组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欲望具有完全理性而实际上只具有有限理性这一结论表明,人的认知能力也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经济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节约了这种稀缺的资源,因而才产生了对不同组织进行比较和选择的动机。

同样,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设计一些组织性框架,让一种交易(即契约)关系的完整性在适合的组织结构里安排下来,威廉姆森把这些框架称为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交易成本的节约就是通过把不同性质的多种交易从一种有区别的方式安排于不同的治理结构而实现的,交易方式与治理结构相匹配的问题体现了人工组织设计的多样性,因而才产生了对不同治理结构进行比较和选择的动机。

必须注意的是,一旦选定了一种经济组织或治理结构,也就可以保障交易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而顺利进行。只有当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同时存在时,才会有严重的契约困难,经济组织或治理结构的重新选择才是必要的。因此,为了与西蒙的有限理性相区别,我们把这种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能力的结合称

为相互依赖的理性,它是有限理性的一种。相互依赖理性是在组织层次上体现出来的人类的认知能力。同时,我们也从演绎的或抽象的意义上给出组织资源的概念:稀缺的决策劳动能力和良好的治理结构(它可用来节约交易成本)是最基本的两种组织资源形式。

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这两个行为假设说明了在各种经济组织或治理结构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的必要性,但还不能具体说明经济组织或治理结构形成的原因及其效率的边界,威廉姆森认为这关键在于资产的专用性(specificity)性质。当一项耐久性投资被用来支持某些特定的交易时,所投入的资产即具有专用性。这时,假如交易过早地终止,那么所投入的资产将完全或部分地无法改作他用,因此,交易的契约关系的连续性就变得非常重要。契约双方有一方投入了专用资产时,一旦另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前终止交易,投资一方将蒙受损失。所以,契约的保障或契约的内部化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显然,如果采取契约内部化方式,这时组织就形成了。可见,资产专用性是一种测量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性程度,专用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成本越大,对市场的依赖性就越小,纵向联合的可能性就越大,组织扩张也就出现了。组织效率边界的扩张与收缩是由最大限度地节约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目的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的专用性,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给定了决策能力和治理结构的具体性质,表征了这两种组织资源的具体形式。

组织资源可以从组织知识转化而来。在人类知识中,总有一部分是在组织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而且专用于该组织,即只有在组织层次中才有意义和价值,称为专用的知识资本。知识资本的专用性说明,一种技术知识通常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个人身上,而是存在于个人之间、小组内部、组织之间等人际关系网络之中。个人知识只有在这种网络背景当中才能得到适当的使用,才能彼此关联成有机的技术知识

整体,这种知识整体我们可以称为组织知识。它并不是组织中个人知识的简单加总。组织知识作为无形的知识资源,也表现出很强的专用性。这种专用性往往表现在,这个组织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具有竞争优势,当组织转向其它技术领域时,其中原有的组织学习程序即遭到不同程度的弃置。也就是说,组织知识只有在上游组织与下游组织之间才具有价值。知识资本的专用性也说明了技术知识的社会分布是非对称的,个人并不是同质的,组织也是异质性的。当然,知识资本专用性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是可以随着组织环境的变化而转化为不同程度的专用性组织资源的。

存在于组织中的个人知识或组织知识的另一种特征是难言性。即它们并不都易于用语言明确表达出来,因而就不易以蓝本(blueprint)的形式记录下来,以独立于个人或组织的方式,像公式或专利一样进行传播,所以称为难言知识(traitknowing)。难言知识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个人或组织产生正确技术问题的源泉,也就是说,难言知识作为个人或组织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积累起来的援助意识,自发地引导着个人或组织的注意力和关注方向,以辨识特定的技术问题,并通过聚集作用,解决将要获得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以,难言知识既包含着发现技术问题的启发性期待,也孕育着解决该技术问题方法预期。总之,难言知识具有孕育“正确的”技术问题功能。它制导着个人或组织知识的增长速度和方向,从而产生渐进的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这是因为,已有的组织知识基础可以增强现有存储相关知识的能力,组织知识基础越雄厚,其吸收能力就越强,对外部技术机会也就越敏感,因而也就越容易作出超前反应去开发新技术新资源。组织知识基础中孕育着的“正确的”技术问题及其解决,将预先地定向了技术进步,它反过来融入到个人或组织的知识体系,形成累积性增长,使组织知识的增长更快,从而转化成了丰富的组织资源。

上面我们从资源的稀缺性方面逻辑地给出了组织资源的性质与形成过程。下面我们将历史地探讨具体的经济组织形成是如何作出对组织资源的合理安排的。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团队生产,到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具体来研究组织资源最优配置系统的演化过程。

由于利用市场机制是需要支付交易费用的,而由资源的所有者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在企业内部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配置资源来代替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在一定限度内则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企业与市场就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在企业之外,价格机制调节着资源配置,在企业内部,与市场交易相联系的市场结构让位于产权结构,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把若干要素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可替代价格机制功能的组织形式来与市场关系网络相联系,以达到降低交易费用之目的。但是,与我们考察组织资源性质与形成过程的侧重点不同,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运作的基础是权威和命令。这就有一个组织中成员的努力与报酬的相关性问题。这一问题,实质上是组织资源的最优配置与效率的计量方式问题,并以产权治理结构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得资源的所有者赖以合作的经济组织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市场的比较优势。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计量组织成员的投入生产力,如何计算其报酬,并使这报酬与投入的生产力相平衡。

企业产权结构的具体形式是什么?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这是一种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方式,是为了克服企业组织内部各种资源所有者之间在集体生产过程中的“偷懒”和“搭便车”动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

团队生产的含义是,至少有两种投入要素(X_i, X_j)联合生产一种产出 Z ,那么投入产出关系就是 $Z = Z(X_i, X_j)$,并且要满足技术上不可分条件: $\partial^2 Z / \partial X_i \partial X_j \neq 0$ 。这好比“两个和尚挑水”,无法明确分清两个和尚的生产力,所以团

队生产被称为“技术上不可分的实体”。由于团队生产中每个人的边际生产力的难以分辨性,作为一种替代,人们一般通过观察每个团队成员的行为来评价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献。

由于团队生产的产出是一种多投入的联合产出,要具体度量每一个成员对企业产出的贡献在信息上存在障碍,于是逃避责任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由此产生了。为了确定每项投入要素的贡献并使报酬与之相对应,就必须观察每项投入要素所有者的行为。如果报酬的差别不能反映各项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差别,就会发生“偷懒”和“搭便车”的动机或行为,并且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还会“传染”,对其他人产生影响。除非能够有效地监督每个人的行为并计量其努力程度,否则,这种“道德风险”就很难在团队生产中得到有效的克服。

一种方法是建立监督职能,检测团队生产各成员的表现。可是监督人也会偷懒,那么谁来监督监督者呢?没有人!显然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把剩余收入留给监督者,那么监督者就有积极性了。因为团队成员的生产越有效率,监督者的剩余就越多,从而监督者就越有动力去进行监督,这又反过来促进团队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这就是团队生产中形成的激励机制,它有效地配置了团队的组织资源,从而提高了团队的联合产出。

但是,谁来充当这种监督者的角色呢?根据资本雇佣劳动的传统观点,应当由资本所有者充任监督者即管理者。这样,具有剩余索取权的团队生产方式正好与现实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古典企业这种并不复杂的经济组织形式相对应。团队生产学说圆满地解决了古典企业代替个体生产产生的经济原因,这表现在不仅是对生产成本的节约,而且是对生产成本和度量成本总和的节约。“如果团队生产的产出足够大,以致于和不可分离的生产的产出总和Z相比,超出的部分仍足以抵销用于组织和约

束团队成员的成本,则团队生产就会被采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

团队生产假说,指出了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特征是资本所有者同时又是企业的监督者,并拥有剩余索取权。这种古典企业的产权治理结构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企业所需的资本较少;二是监督者是风险中性者。在古典企业中,所有者同时又是经营者,由其聘任的企业管理人员只是决策指令的执行者和日常事务的管理者,并不是风险决策者。既然管理人员无须对不确定性作出反应,只是确定职能的执行者,因此,所有者(兼经营者)就可以在契约关系中为他们规定完整明晰的行为规则和程序来规范他们的行为。

随着企业资本的不断积累,企业的规模也将随之扩大。但是,另一方面,资本所有者由于受精力、知识、时间、协调能力所限,越来越不能完全独立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这时,所有者就会去委托专业人员代理执行监控企业的职能,这时便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在股份公司,尤其是在股票上市公司中,委托—代理关系成为普遍现象。委托代理关系既是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产生分离的起因,又是其结果,这样才能合理地解释现代公司产生的原因。它说明了现代公司在组织资源的配置上完全不同于古典企业。决定组织资源的配置机制不再是单一的责任不对等的激励机制,而是一种综合的激励约束机制,其中包括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与设计问题,这就是公司的治理机制问题。

降低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机制设计的最终目的,因为降低代理成本就是提高了委托人的期望收益。但是,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委托人需要通过契约关系和对代理人行为的密切监督来约束代理人的那些有悖于委托人利益的活动,这就需要付出必要的约束成本。问题是这种契约关系和监督手段能否适应确定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这将直接影响约束成本

的大小。如果不能在契约关系中充分考虑到环境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代理人规定一般的行为规则或决策程序就会限制着代理人的经营活动,使代理人丧失适应无法预见的未来不确定性所需要的可塑性,所谓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种可塑性的体现。同时,契约关系中所确定的约束规则越是完整、明晰,代理人的选择空间也就越狭窄,企业的行为就会越僵化,可能丧失的获利机会也就越多。因此,为了有效地通过契约关系从外部来约束代理人的经营行为,契约双方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来预见到环境的各种可能的变化。但是,充分信息需求越大,信息费用就越高,在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下,若要获取充分的信息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代价常常是很高的。此外,通过谈判收集信息,还要支付起草合约、签约等谈判资本。达成一种契约后,为保证契约的履行,还需要付出执行成本。以上那些旨在规范代理人经营行为的交易费用,以及代理人的经营行为受限制而导致的经营效率的损失统称为约束成本,它是降低代理成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显然,代理成本与约束成本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这种替代关系为委托人的理性选择提供了一种设计空间来调整约束强度。如果约束成本 $>$ 代理成本,即要放松约束,反之,则要强化约束。理性的委托人将在边际约束成本等于边际代理成本时实现对代理人的外部约束均衡,均衡调整过程将使约束成本与代理成本之和达到最小化。显然,代理成本的大小与监督和约束的难易程度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一致性程度有关。监督越容易,利益越趋于一致,代理成本就越低;反之,则代理成本就越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大大地丰富了企业治理机制研究的内容。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人们称为“中国的世纪难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但是,多年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都集中在如何达到政企分开,以及如

何组织和管理国有资产上,而忽略了对企业组织资源的激活与动员和在此基础上现代公司体制如何运作,以及这种体制对组织资源原有的配置所作的重新安排所依赖的市场法律制度环境的研究。自1995年钱颖一提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问题后,那种好像政企一分开,新的体制就会自行运行的论点才引起异议。国有企业治理问题的凸现使人们相信,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劣是企业能否有效运营的关键。但是,如果仅从形式上建立起股东大会、董事会到经理层的股份制治理结构,实际上旧的治理机制仍在起作用,是不可能取得理想效果的。因此,从经济组织资源必须最优配置的方向出发,动员与激活现有的组织资源,实现组织资源在破产、兼并等流动过程中重新进行配置,并在这一过程中找到适合于中国国有企业状况的企业治理结构形式,使组织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不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一实际问题的解决与理论的创新,以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经验与现代企业理论的本土化,将为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素材。

四、政治资源配置层次与机制

权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但是,权利作为一种资源的观点却是相当明确的。权利与土地、劳动和资本一样,同样具有稀缺性。权利的稀缺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有限性。在理想状态下,个人权利是自由的:个人可以独立享有和独立行使,如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和信仰自由、通信自由、买卖自由等等其它民事权利。但它又必须是封闭的,“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权利(马克思语)。可是,这种封闭性在现实中很难满足。现实中存在着的强制和压制限制了自由性,使个人的自由选择变得有限;第二,自

由权利受拥挤的社会环境限制,即使没有强制和压制,当一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也会与他人行使自由权利发生冲突。在集体宿舍里,一个人有唱歌的权利,另一个人有睡觉的权利,这时不同自由权利就发生了冲突。第三,契约的不完备与承诺的不遵守使自由权利的活动空间受到限制。

确立个人权利不但是增进财富的先决条件,而且个人权利也是市场经济效率的基础。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分散化决策的前提之下的,而这种分散化的经济决策又以明确的个人权利为基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是财产所有权,你必须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以平等交换的方式交换属于别人的东西,否则就不能视为公平交易。更进一步地,个人权利不仅仅是指他对自己财产的所有权,还应包括他对劳动的所有权。“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其他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显然,那不但侵害这劳动者的自由,而且还侵害劳动雇佣者的正当自由。妨碍一个人,使之不能在自己认为适当的用途上劳动,也就妨碍另一个人,使之不能雇佣自己认为适当的人”(亚当·斯密语)。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就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

在明确的个人权利前提下,抱有自利动机的个人,能够通过相互交易而获益,并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扩大了交换的范围。我们从一个实例来继续进行这一讨论。若有两人甲与乙,甲养羊而乙种粮,那么通过羊与粮食的相互交换就可以使双方都增进利益。但是,除了选择交易或不交易的行为外,甲、乙还可以有别的选择行动,例如,甲可以选择去偷乙的谷物而不必交换他的羊,乙当然也可以同样这样做。这样,甲所得正好是乙所失。如果因为出现偷窃而出现了偷窃的防卫,那么将会减少

粮食或羊的生产水平,从而导致双方的境况比前恶化。我们可以用一个矩阵来表示这一分析结果。

乙	交 易	偷 窃
甲		
交易 ^A	甲(10头羊,9担粮) 乙(8头羊,6担粮)	甲(6头羊,5担粮) 乙(10头羊,9担粮) ^D
偷窃 ^B	甲(10头羊,10担粮) 乙(5头羊,3担粮)	甲(7头羊,5担粮) 乙(7头羊,5担粮) ^C

可以看出,当双方都避免偷窃而选择交易时,这种行为使得甲乙双方的境况都得到改善(A块);如果只有一方选择偷窃,偷窃者得到更多的改善(B块和D块),于是双方都倾向于偷窃,这就形成了C块的结果。显然,这种结果是这一局势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之下的分配结果就称为“自然分配”结果,因为它是原始的和稳定的。

如果承诺不偷窃或形成相互不偷窃的协议,并且只要形成和实施这一协议所付出的成本低于双方以这一协议中所得到的收益,双方将从这种原始状态中走出来,沿着C→B→A方向移动,逐步改善双方的境况,这就是帕累托最优移动。因而,促成这种移动的这一协议就是具有宪法意义上的某种具体形式的契约,它对甲乙每个人的财产权和行为具有约束力,因而它也就是最早的或最原始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存在无疑是相对于宪法意义上而说的一种组成自愿交易状态的后宪法意义上契约的建立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这些契约是甲乙双方集体选择的结果,它说明,个人财产权的存在与个人财产权的实施是不同的,前者是个人权利,后者是集体权利。当个人权利转化为集体权利时产生的协议即契约就是公共货物,它的供给需要人们付出时间、道德、资源等方面的成本。类似的还有,法律和公安部门提供了防止内部威胁的集体性保护,国防提供了防止来自外部威胁的集体性保护,消防部门则提供了消灭火灾的集体性保护。这样,为军队、警察或消防队所付的支出就替代了类似于偷

窃的损失。

集体权利也是会受到限制的,因为它的权利与义务往往是不对称的,所以是稀缺的,这可以从公共货物的特征来加以说明。公共货物与私有货物不同,它具有消费上的不排它性,一盏路灯,你可以利用,他也可以利用,谁都有利用路灯的权利。可是公共货物又是不可分的,所有个人都有为提供公共货物作出贡献的义务,但也许你不愿意履行这个义务,这样你的情况将会比你忠实地履行义务的状况要改善得更多,因为你搭了那些履行义务的人的便车。公共货物的收费很困难,因为人们缺少履行交费的动力。所以市场交换的价格机制在公共货物上无法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可见,公共货物的这种特征构成了集体选择机制存在的理由。

既然公共货物不能像私有货物那样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个人的需要,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生产公共货物以满足人们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呢?生产公共货物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由谁来决定生产什么样的公共货物?生产多少?不能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作出这些决定,又按照什么样的原则作出这些决定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理论学派,一个是凯恩斯学派,一个是公共选择学派。

凯恩斯学派认为,政府可以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并且政府有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作出准确的判断来决定公共货物的生产,同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公共货物的支出。但是,现代人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该组织中作决策的人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差别,既不会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并且,由于这些人所支配的权力是垄断的,权力本身又可以无限透支,所以这些人犯错误往往对社会危害更大。而且,现代经济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已为这种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说市场对公共货物无能为力,那么,政府也不会

比市场作得更好。

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们认为,即使在公共货物决策领域,也照样要通过明确个人的权利来促进经济效率,因为每个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货物,需要多少,政府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政府的偏好也并不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偏好,只有每个社会成员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偏好。公共选择学派的首要人物布坎南曾经这样论述确立个人权利对于公共货物决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公共货物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由于是通过税收方式和公共支出形式来间接进行的,因而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过程,如果要使这一过程的决策符合公众利益,就必须首先确立每一个公民的个人权利,这种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政治投票权。一旦确立了个人的投票权利,就会产生类似于商品市场那样的政治市场。就像生产各种不同的私有货物供消费者选择一样,可以设计出各种可供选择的税收与支出方案,每一种方案明确规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与相应的权益。这些税收方式与支出方式要进行公布,让每个选民知道自己将会享受到什么利益和将要支付多少费用,就像在商品市场上用“货币票”来投(买)自己喜欢的商品一样,通过投“政治表决票”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税收与支出方案。因为每个投票者了解各种方案对自己的利弊,所以他必然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充分履行个人权利,不会造成个人权利资源的浪费。同时,这也会杜绝“免费搭车”的低效率现象。可见,在明确个人投票权利的基础上,通过这种政治市场来配置公共货物的生产与消费,将使得消费者对于公共货物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显然,这是一种最优的政治(权利)资源配置方式。

这种对政治资源进行配置的经济子系统我们称为政治资源配置系统。这个系统作用的机制是集体选择机制,它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各具不同个性的人群组成的社会所必需的一种机制,它在以正式投票作出并推行集体选

择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由于集体行动是由个人行动组成的,是由个人选择并通过集体完成的,显然,它的功能就是在个人权利转化成集体权利过程中如何最优地配置稀缺的权利资源。在具体关系形式上,它讨论的是一个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最古老最艰深的问题:一个社会(即集体)是如何获得一致性的呢?换言之,个体的意志如何作到在整体上进行了完美的表达呢?这其中的内容不但包括权利过程的奥秘,而且还包括权利表达方案设计的技巧,前者即是关于政治过程的理论,后者即是关于政治民主的技术。当然,有缺陷的政治过程和落后的民主技术将会使政治资源作低效率或无效的配置,使政治资源配置子系统的功能失调,从而使系统资源配置的总体最优化不能达成,最终影响到整体经济系统的效率。

五 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系统的质量评估

从资源配置系统的完整性角度对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质量进行评估,我们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从引进市场经济制度以来近20年,在经济资源配置层次上,商品市场基本上达到了完全竞争的程度。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已由价格决定,消费者的选择已接近于理性化,盲目的消费已不多见。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已经内在化,但有盲目扩大产量的行为存在。商品库存是影响提高利润的主要因素,商品积压,特别是日用商品的积压造成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形成,但很不完善。工资率还不能作为劳动的价格,不能完全承载和反映劳动力的质量等信息。劳动供给的数量过多使教育投资的报酬率过低,影响

了有效劳动的供给;资本市场效率低下,市场利息率对资金的供给与需求没有多大的刺激作用,对储蓄率的影响也不灵敏,故不能成为投资的变量;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不是供过于求),居高不下的楼价对市场的拓广不利,但房地产业对拉动整个经济的资源流动速度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方面尚有不足,但价格机制已在充分发挥作用,预期机制已经形成,增长机制正持续运作。所以总体上看,经济资源配置已处在十分活跃状况。

(2)在组织资源配置层次上,国有企业改革使得现有的组织资源正在被激活,原有的配置经国有企业的破产、兼并、联合、改造正作重新安排,组织资源的流动性加大,但帕累托改进效率不明显,说明组织资源废弃流失比较严重。但新的组织资源在新的所有制经济形式中同时也得到发展,个体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各自发展出新的组织资源,起着吸纳社会剩余生产要素的作用,并显示出较高的组织效率。总体上说,组织资源配置已处在开始运作状态。

(3)在政治资源配置层次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不同经济主体有了较为充分的经济自由。经济决策权下放,消费主权的回归,人民公社生产制度的废除,身份证制对户口制的逐步替代,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发展。但集体选择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寻租现象严重,说明设租现象较为普遍,租侵蚀了利润,也侵蚀了公平竞争、公正和经济自由秩序。村级的“海选”制度的推行标志着政治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尝试。但总体上说,政治资源配置还处在启动状态。

●
责任编辑:谭湛明

改革前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

□ 屈小娥

(陕西财经学院统计系, 陕西 西安 710061)

[关键词] 消费结构 实证分析 合理化 对策

[摘要] 文章分改革前后的两个阶段: 1953—1978年、1979—1997年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探讨了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对策。

[中图分类号] F0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10-0041-05

一、改革前(1953—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国家按照全社会及其成员需要的粗略估计, 对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各环节进行计划调节, 在商品供应中, 对居民生活必需品通过统购统销和发放票证、凭票供应等手段, 牢牢地控制着消费总量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所以这一时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1. 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缓慢。1953—1978年,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变动幅度很小, 这一时期, 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年递增速度只有1.4%, 居民消费水平递增速度为2.7%, 消费需求增长很小。而同期国民收入人均占有量共增长104.8%, 年平均增长4.19%, 低于

同期国民收入6.9%的增长速度。由此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生产的发展并没有带动消费相应的增长, 生产水平提高的幅度与消费水平提高的幅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期滞”差异, 消费水平的提高是消费结构发展的基础, 由于消费水平没有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相应地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消费结构的进步。

1953年与1978年相比, 全国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支出由54.4元增加到126.8元, 增长1.35倍, 平均每年增长3.34%。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由212.9元增加到427.6元, 增长一倍, 平均每年增长2.7%;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由33.2元增加到68元, 也增长近1.08倍, 平均每年增长2.8%。在居民货币支出中, 虽然购买消费品的支出和文化生活服务支出的绝对数有所增加, 但就相对数而言, 城市居民购买消费品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文化生活服务性支出的比重缓慢下降; 而农村居民购买消

费品支出的比重略有下降,文化生活服务支出在波动中上升。

2. 恩格尔系数长期居高不下。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即: $\text{恩格尔系数} = \frac{\text{食品支出总额}}{\text{总支出金额}}$ 。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小,家庭收入或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或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或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将会下降。

从恩格尔系数来衡量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抽样调查资料(《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和《农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两表)计算恩格尔系数如表 1:

表 1

年份	1957	1959	1964	1965	1978	1979
城镇系数(%)	58.40	58.43	59.22	—	—	—
农村系数(%)	—	65.80	—	68.50	67.70	—

根据计算,1978年以前,反映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最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一直高达 55% 以上,这与同期人均消费水平的增加和工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居民消费构成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生存资料为主。从 1952—1978 年的 27 年间,吃、穿、用的顺序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根据城乡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1957 年,城市居民年均生活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 58.4%,衣着支出占 12%,文化娱乐、日用品、书报杂志、药及医疗用品、燃料等五项支出仅占 13.28%,房租水电等非商品性支出占 14.11%,1964 年城市居民的食品支出占 59.27%,衣着商品支出占 10.98%,日用品、文化娱乐、书报杂志、药及医疗用品、燃料等五项支出占

14.3%,非商品性支出占 14.63%。而农民则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1953—1978 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每年货币收入仅有 48.51 元,根据抽样调查资料,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构成中,1957 年生活消费支出高达 98.3%,其中食品支出占 65.8%,衣着支出占 13.5%,日用品及其它支出占 6.9%,文化生活服务支出占 1.7%;1964 年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占 97.3%,其中食品支出占 68.5%,衣着支出占 10.5%,日用品及其它占 7.2%,文化生活服务支出仅占 1.7%。可见这一时期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只能维持温饱,居民消费构成是以生存资料为主。

4. 居民的消费选择和消费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传统的计划体制的约束,体现在国家对各类基本生活消费品实行定量、凭票或凭证供应。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对粮、棉、油、布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证限量供应,后来这种办法扩大到肉、糖、鸡蛋等副食品和自行车、缝纫机等耐用消费品方面。不可否认,在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商品供求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在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和稳定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实行凭证的消费品价格偏低,而消费量又有一定的限制,这种政策约束一方面扭曲了居民的消费结构,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国民经济的供给能力,增大了供求缺口。

二、改革以来(1979—1997 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改革开放 20 年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居民的货币收入逐渐增加,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也随之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 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居民对衣、食、住的消费需求已由追求数量过渡到讲究质量。从 1952—1978 年的 27 年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幅度很小,每年平均只增长了 2.2%;改革以后,即 1979—1992 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明显加大,每年增长率为 6.8%,与改革前相比,每年提高 4.6 个百分点,到 1996 年,居民消费水平达到 2679 元,比 1978 年的 184 元增长了 14.6 倍,特别是 1997 年以来,冰箱、空调、彩电、电脑、小轿车等,这些过去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也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一方面是过去 27 年来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的释放,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改革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的外部环境的改变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改革以来,我国着力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使人民生活所需的消费品得到较大的丰富,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过去那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念已得到彻底改变,人民的消费意识已逐渐增强。

2. 恩格尔系数在波动中下降。根据联合国标准,不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在 40%—60% 之间,根据计算,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 1979 年的 54.4% 下降到 1989 年的 51.36%,降低了 3.04%,到 1997 年,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 46.4%,比 1989 年下降了 4.96%,虽然在 1979—1983 年、1986—1987 年,恩格尔系数曾出现回潮现象,但总的趋势是不断下降的,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发展变化轨迹,与恩格尔系数所揭示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9—1997 年的资料整理计算的恩格尔系数

见表 2:

表 2

年份	1979	1981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89
城镇系数(%)	54.40	56.16	59.20	57.97	52.25	52.43	54.50	51.36
农村系数(%)	—	—	—	59.00	57.70	53.40	54.49	54.90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城镇系数(%)	54.24	53.80	52.92	50.13	49.9	49.92	48.34	46.4
农村系数(%)	58.04	56.84	56.81	—	58.85	58.62	54.41	—

3. 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资料向生存、发展、享受并重的多层次消费结构转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居民的货币收入不断增加,在其基本生存资料得到满足后,开始由生存资料逐步转向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

(1) 吃的方面。食品消费支出绝对额上升,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副食比重上升,对食品消费已开始从量的满足转向对食品的营养价值和品种质量的追求,膳食结构向主食粮食和动植物并重的方向发展。城市居民主食(粮食)消费的比重由 1989 年的 40.04% 下降到 1996 年的 34.43%,副食(蔬菜、肉、蛋等)比重由 1989 年的 59.96% 上升到 1996 年的 65.57%。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商品性消费代替了自给性消费,工业化食品消费比重增加。

农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在 1978 年以前以粮食为主,主食又基本上以粗粮为主,1978 年以后,细粮消费所占比重逐渐增大,粗粮消费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同时,农民开始讲求饮食的多样化和营养价值,肉、油、蛋、鱼、虾、食糖等的消费量均有所增加。

总的来看,城镇居民吃的比重,由 1983 年的 59.2%,下降到 1996 年的 48.6%,居民食品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趋势是明显的,这种变化与消费结构的一般规律相一致,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收

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越来越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提出的一个依据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困与富裕的标准,即恩格尔系数在 59% 以上为绝对贫困,50—59% 为基本温饱,40—50% 为小康,30—40% 为富裕,按此标准,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于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过渡阶段。

(2) 穿的方面。不仅在绝对量和支出比重上有所上升,而且穿着结构变化也很大,衣料消费量减少,成衣消费量增加,高中档服装的需求量逐渐增大,非高档服装的需求量逐渐减少。衣着消费支出 1996 年比 1990 年增长 2 倍多,金银首饰等高档奢侈品也逐渐进入普通家庭。1983 年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 73.56 元,1992 年为 235.41 元,1996 年为 527.95 元;从消费质量看,我国居民的衣着消费结构从经济、耐用、朴素的单一型向新颖、美观、考究的高档型、多样型发展。根据调查,1988 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中有呢大衣 152 件,毛皮大衣 34 件,毛料 340 件,到 1996 年,呢大衣 207.48 件,毛皮大衣 47.11 件,毛料 408 件。

(3) 用的方面。用的消费品支出比重表现为上升趋势,日用品在商品支出中的比重 1986 年为 11.34%,1996 年为 22.3%,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 1990 年、1991 年、1992 年三年趋于下降,是由于三年治理整顿的结果。但全面考察,用的消费品支出比重上升趋势很明显。从耐用消费品看,大量的家用电器和高档耐用品涌入居民家庭,1996 年,城镇每百户家庭拥有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的数量分别是 69.67 台、119.03 台、90.06 台,与 1985 年相比,每百户家庭拥有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的数量分别增加 34.96 台,电冰箱增加

63.09 台,洗衣机增加 41.77 台。但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质量、牌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购买意识明显趋于中高档商品,追求名、优、新、特商品,而且在 90 年代后期对新型耐用家电(空调、高档组合音响、vcd、摄录像机、家用电脑)表现了较强的购买欲望。

(4) 住的方面。居住面积不断扩大,近几年随着住宅建设的发展,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人均居住面积 1978 年为 3.6 平方米,1990 年为 6.7 平方米,1996 年上升为 8.5 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了 2.4 倍多;农村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 1978 年为 8.1 平方米,1990 年为 17.8 平方米,1996 年为 21.7 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了 2.7 倍多。1996 年人均居住支出 300.85 元,较 1990 年的 60.86 元增加了近四倍,而其中住房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2% 上升到 1996 年的 3.17%,增加了 1 个多百分点。此外,由于室内装饰热的迅速兴起,使人们的居住条件更为舒适。

(5) 文化娱乐、医疗用品及交通通讯支出增长迅速。在消费性支出中,文娱用品、医疗用品的人均支出额 1983 年分别为 20.76 元和 3.12 元,1992 年上升到 147.45 元和 41.51 元,1996 年上升为 374.95 元和 143.28 元,城镇居民对文娱用品、医疗用品支出额的增加,反映出城镇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外旅游、娱乐、健身、美容等方面的消费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迅速增加,用于交通通讯的消费支出不仅数额大大增加,而且支出比重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迅速增加,我国城镇居民用于交通通讯的支出,1994—1996 年剔除价格因素,支出比重分别为

4. 65%、5. 7%、6. 58%，以近 1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此外，由于我国限制人口生育，也使家庭将多余资金用于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教育支出逐年增加，1996 年比 1995 年增加了 23. 1%，而人们对享受资料的需求也不断得到满足。

4.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居民消费日益呈现出层次性。见表 3：

表 3

我国城镇居民按收入分组的恩格尔系数

单位：%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最低收入户	61.20	58.66	60.81	59.82	62.47	61.34	59.85	60.22	59.03	61.16	59.49	58.28
低收入户	57.91	56.38	58.61	56.51	59.13	58.76	57.82	57.97	56.86	57.64	58.12	56.49
中等偏下收入户	56.22	54.74	56.26	55.09	57.39	57.20	56.32	56.07	54.09	55.51	54.74	52.81
中等收入户	54.23	52.95	54.04	52.19	55.59	54.65	54.62	53.26	51.79	51.14	51.37	49.86
中等偏上收入户	51.89	50.83	52.08	49.71	52.85	52.60	52.61	51.11	48.64	48.08	48.11	47.15
高收入户	49.20	48.84	50.53	47.48	51.08	50.92	50.18	49.70	45.71	44.52	45.59	43.90
最高收入户	49.96	45.31	46.81	43.95	47.74	48.63	48.70	46.57	41.45	40.03	40.46	39.8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7 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至 1996 年底城镇居民的最低收入户恩格尔系数为 58. 28%，尚在温饱线徘徊，恩格尔系数变化不大；而中等收入户在 1991—1992 年间就完成了向小康水平的迈进；最高收入户早在 1985 年就已属于小康消费水平，至 1996 年底，恩格尔系数为 39. 82%，已实现了向富裕水平的过渡。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层次性，使我国城镇消费品市场也呈现出显著的层次性，一部分居民勉强可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这部分居民的消费重点仍在基本生活必需品上，而进入富裕阶层的消费者在其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他们的消费热点已对准了私人轿车、高级别墅等高档商品。

三、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对策思考

1. 适应居民食物构成变化需要，大力发展农业和食品加工工业。农业是实现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产业部门，应在提高食物生产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的基础上，支持农、林、牧、副、鱼全面发展，在高产、高效、优质上做文章，向深度、广度进军，使农产品得到深加工和升值、转化；同时，应大力发展食品加工工业，以提供足够的方便食品、强化食品、营养食品、专用食品、科学包装食品、工程化和医疗化食品等，以使我国居民食品内部加工更加合理。在饮食科学化上求发展，既要立足大众，又要拉开档次，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2. 随着耐用消费品市场的日趋饱和，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需求呈现出质量型、多样型特征，客观上要求我国轻工业必须以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为导向，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在产品的名、优、特、新上下工夫，努力形成日用品工业的层次性，发展不同档次的产品。纺织品工业应根据衣着消费高档化、成衣化、时装化，求新、求美心里趋强的变化特征，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设计和工艺水平，在产品质量、款式和品种上不断创新提高，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季节的消费。

3. 根据居民对交通通讯消费的需求，要大力开发和生产以电子产品为主的高科技产品，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形成现代化通讯设施、空调和家用电脑为代表的高档家用电器等主导消费品，这是丰富城镇居民的消费内容，激活城镇市场的有效途径。

4. 根据居民对居住消费的需求，大力开发适销对路的民用住宅，促使住房

中国寿险市场的现代发展

□ 陈东升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博士,北京 100620)

[关键词] 中国保险业 市场 演变结构 趋势

[摘要] 文章论述了中国保险业市场成长的历程、增长速度,分析了我国寿险险种的结构演变及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销售方式的变革等,探讨了中国保险业的转型及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F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10-0046-07

一、中国寿险市场的成长: 1982—1996年

1982年,中国恢复了寿险业务,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寿险市场高速增长,保险业在险种结构、市场结构、监管方式、销售方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寿险业务的增长速度

在1982年到1996年间,中国寿险市场经历了超高速增长和高速发展两个时期。如表1所示,1982—1987年是中国保险业的超高速增长期,这一时期,保费收入年增长速度均在100%以上。1988年至今,中国寿险保费收入增长速度减缓,但是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83年到1997年中国的寿险密度从人均0.04元增长到人均46.9元,寿险深度从1984

成为消费热点,解决城镇居民“住”的问题。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讲,要针对不同对象的住房需求,调整住房建设结构,以经济适用住房和安居工程为主,民用住宅建设应以保本微利为原则,要改进购房办法,理顺住房价格体系,搞好配套设施的供应(如管理费、供电、供水、供气、采暖等)。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各项保健制度的改革,我国居民基本消费需求支出构成中增加了对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及娱乐文教服务,其中增加最快的首属交通通讯工具。与此相适应,必须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大

力发展轻轨铁路(地铁);大力发展交通通讯业,促使电话机、BP机、移动电话进入普通家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扩大交往、增加便利、充实精神生活的需求;大力发展医疗保健消费、文化教育消费。●

参考文献:

1.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78—1996年各卷。
2. 《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
3. 曾壁钧等:《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年。

责任编辑:谭湛明

年的 0.01% 增长到 1997 年的 0.8%。

表 1 中国寿险业的增长(1982—1997 年)

年份	保费收入 年增长率 (%)	寿险保险 深度 (%)	寿险保险 密度 (元/人)	占保险业 业务的比重 (%)
1982	—	0.00	0.00	0.22
1983	556.60	0.00	0.04	1.04
1984	620.02	0.01	0.07	5.69
1985	486.56	0.05	0.42	17.14
1986	157.62	0.12	1.07	26.82
1987	120.02	0.22	2.31	37.23
1988	49.96	0.27	3.42	39.55
1989	22.61	0.29	4.13	37.39
1990	30.07	0.34	5.23	38.37
1991	38.36	0.38	6.91	39.44
1992	57.50	0.30	7.14	30.40
1993	12.90	0.30	8.62	30.90
1994	11.30	0.31	12.32	32.30
1995	2.50	0.37	18.26	31.60
1996	59.00	0.48	25.35	41.75
1997	85.31	0.80	46.90	55.60

资料来源:(1)中国金融学会,1988—1997年:《中国金融年鉴》;(2)Swiss Re: Sigma;(3)各寿险公司 1997 年业务统计资料。

中国寿险业在 1982—1987 年间,以三位数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基数小和长期被抑制的寿险需求得到了释放。1988—1997 年间,中国寿险保费收入增长速度减缓,其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冲击,居民的高通货膨胀预期,使寿险,特别是长期险种的需求受到了抑制。同时,退保率也随之增长,在这一时期,中国寿险保费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呈明显的负相关(图略),而寿险退保金额的增长率则和通货膨胀率呈正相关。

2. 寿险险种的结构演变

在中国恢复寿险业的初期,寿险险种以简易人身险和养老金为主体,在 1984 年,二者保费收入分别占总保费的 17.70% 和 80.80%,共占寿险总保费收入的 99.50%,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新险种的开发,这两个险种在总保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健康险、定期死亡险以及多种责任组合的新险种不断出现。

简易人身险保费低廉(每份 1 元),保障低(最高保额 5000 元),期限为 5、10、15、20、30 年 5 种,保险责任为疾病死亡、意外伤害死亡和意外伤害残疾。这种保险比较适合寿险市场发展初期,居民收入水平低的情况,简易人身险占寿险保费收入的比重在 1987 年最高时达 53%。养老金保险在初期主要面向团体客户销售,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一度比较混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曾经作为半政府机关,为没有退休保障的非国有企业职工办理养老保险,销售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色彩。

寿险险种多样化,既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多样化的结果,也是寿险市场竞争主体增加,推动险种创新的结果。

3. 寿险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

1988 年以前,中国寿险市场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1988 年以后先后成立了平安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新疆农牧业保险公司以及 17 家地方性的寿险公司,1996 年成立了泰康人寿和新华人寿两家全国性寿险公司,外资也通过独资、参股、合资等方式进入中国寿险市场。市场竞争程度不断提高,无论是用产业集中度还是赫芬因德指数衡量,中国寿险市场的垄断程度都在不断降低(参见表 2)。中保的市场份额从 1982 年的 100% 下降到 1997 年的 70%。

表 2 中国寿险市场结构的变化

年份	前 3 位保险公司的 市场集中度	赫芬因德指数*
1982	100.00	1.000
1985	100.00	1.000
1989	99.92	0.987
1990	99.87	0.979
1991	99.78	0.965
1992	99.73	0.949
1993	99.70	0.909
1994	99.26	0.729
1995	98.37	0.644
1996	97.76	0.576

资料来源:(1)中国金融学会,1988—1997年:《中国金融年鉴》;(2)国家统计局,1982—

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 赫芬因德指数是指一个产业中各企业的产量与产业总产量比值的平方和。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区域的市场上,寿险公司之间的竞争程度更高,这一点可以从保费收入在如上三个地区分布中看出。

更有趣的现象是,在同一地区市场上,一些大型保险公司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别分支机构之间也存在竞争,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寿险市场的实际竞争程度会更高些。

4. 销售方式的变革

在1992年以前,中国寿险主要是通过保险公司的职员向团体客户销售,并且,保险公司经常借助于政府或国有金融机构的行政力量,对客户进行公开或隐蔽的强制销售,例如,一些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联合发文,强制规定企业必须向某家保险公司投保,甚至以贷款配给为手段强制企业投保。1981年以来,广州和福建的保险公司还可以为地方政府代理保险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在1991年和1993年两次发文(即银发[1991]313号和[1993]24号文件),禁止此类行为。

市场竞争促进了人寿保险销售方式的变革。1992年,外资寿险公司友邦(上海)首次将通过专业代理人向居民个人销售寿险的营销方式引入中国。1994年7月,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也在中资寿险公司中率先采用这种销售方式,随后其他寿险公司纷纷仿效。在短短5年间,中国的专业寿险代理人从无到有,1997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认可资格代理人已经达到35万。^①在个人代理人发展的同时,通过专职、兼业代理机构以及经纪人销售的营销方式也得到了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专门颁布了《保险代理人管理暂行规定》和《保险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一些中资寿险公司(如平安、泰康人寿)为了提高寿险营销员的推销技巧,还通过与海外公司的技术合作,引进海外顾问帮助培训营销员。海外寿险推销技术的引入,提高

了寿险营销员的产能,如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市场上就创造了月人均首期保费收入1.49万元的记录。当然,与国外寿险市场的历史发展经验一样,中国寿险市场的个人寿险销售方式也有快速增员、快速淘汰、注重人员规模的所谓“人海战术”和注重培训和高产能的所谓“精兵制”以及“中间道路”的不同形态。

5. 寿险市场监管的变革

在中国寿险市场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寿险市场的监管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高度垄断市场的时候,它可以代替政府行使一部分行业管理职能,是一个半政府、半企业的组织。1985年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保险监管机关的地位,随后,保险监管部门从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的一个处发展到专门的保险司,1998年又将成立隶属国务院的专业保险监管委员会。保险监管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离,从隶属人民银行到直接隶属国务院,监管机关走上了专业化道路。

同时,监管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995年《保险法》颁布以前,保险监管以直接对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进行干预为主。在费率方面,监管机关不仅要主要险种的条款和费率进行审核,而且规定,在同一地区经营同一险种,必须使用相同的费率,这严重抑制了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在资金运用方面,保险公司如果在银行存款以外进行投资活动,必须设立专门的投资机构并报监管机关审批,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还必须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运用计划管理中(参见银发[1991]92号文件)。保险公司还必须将全部业务的30%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再保险。1995年《保险法》和《保险管理暂行规定》颁布以后,偿付能力管理等间接管理方式开始得到运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最低偿付能力标准。

二、中国寿险业的转型: 1997—1998年

1997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国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寿险市场内部的竞争,推动中国寿险业开始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的核心,是从注重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向注重效益为核心的集约化经营转变。

1.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寿险业的影响

由于中国尚没有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1997年7月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对中国内地的金融机构产生正面冲击。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格局和金融监管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进而改变了中国内地寿险公司的经营环境,促使中国内地的寿险公司对传统的经营方式进行改造。

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中国政府吸取周边国家的教训,更深刻地认识到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危害。1997年以来,中国政府以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为目标,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体系方面进行了大量改革。改变过去按行政区划设置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格局,改为按经济区划设置分支机构,力图使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摆脱地方政府的行政干扰;同时,政府正着手将设立直接隶属国务院的保险监管委员会,并将原人民银行负责的一部分证券市场管理职能划归中国证监会,一个由中央银行、保险监管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构成的专业化金融监管机构体系正在形成。在建立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方面,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取消信贷规模限制,撤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着手为处理不良信贷资产,成立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了达到巴塞尔协定要求的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政府还发行了2700亿30年期的专项国债为银行注资。1997年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特点是在加强金融监管的中央集权的同时,建立市场化的金融监管工具,同时推进金融企业的市场化。

中国政府加强金融监管对寿险公司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严格的金融监管使一些寿险公司不能再盲目地扩张分支机构,不能依

赖于规避投资管制来获得高收益,寿险公司必须改变非市场化的销售方式和过度冒险的资产负债管理策略。另一方面,保险监管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方向转变。日前,保险监管部门已经发布了《保险公司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指标》(征求意见稿),这个方案借鉴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寿险监管的经验,以偿付能力为核心,为寿险公司初步设定了16项监管指标。这个方案出台后,将会改变传统监管方式过度干预寿险公司日常经营的状况,寿险公司的自主决策权限将增加,这必将使中国寿险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

2. 中国经济周期及经济结构变化对寿险公司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周边国家的货币贬值,使中国的出口贸易、外商投资的增长受到了抑制。而近年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GDP增长中来自出口贡献大约达到30%。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也使国内市场出现所谓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整个经济面临短期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长期结构转型的挑战。中国寿险企业传统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必须转变为集约型经营方式,才能从目前的经营困境中摆脱出来,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发展趋势。中国寿险企业的粗放式经营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现为:(1)寿险市场保费收入总体增长速度减慢,尤其是一些公司的团体业务不仅在总保费收入中比重下降,而且团体业务保费收入还出现了负增长的格局;(2)寿险个人代理人的人均保费收入下降;(3)寿险公司经营成本上升,承保业务亏损加剧。一家管理水平在国内同业中比较出色的公司,在广州这样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市场上,费用超支也达到91%;(4)由于一些寿险公司为了迅速扩张市场占有率,对个人代理人管理松懈,代理人的不道德行为影响了寿险行业的整体形象;(5)中央银行连续5次降息,并且寿险公司的投资渠道狭窄,作为寿险公司主要投资场所的国债市场收益率也

随之下降。寿险公司不得不为过去以 8.8%，甚至更高的预定利率承保的保单承担利差损。

由于监管部门和行业公会没有公布各公司险种结构的准确历史资料，大家难以对寿险公司未来的利差损状况作出准确的预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越是规模大的老公司，其利差亏损情况越严重，在利率下降时期，新进入市场的公司利差亏损的负担比较轻，甚至可以在 1997 年到 1998 年的国债市场中获得较高的价差收益。但是，新公司初建时期必须进行大量的固定投入，因此，新公司费差亏损的压力比老公司大。

3. 寿险公司自身弊病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和其他企业一样，中国的寿险业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也带有传统企业体制的弊病。不仅长期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独资寿险公司存在体制弊端，而且，后来成立的股份制寿险公司也在不同程度上有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寿险公司的体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产权结构不合理。尽管除了中保以外，其他的寿险公司都是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态设立的，但是，这些公司的股权结构还是以国有企业出资为主。同时，由于证券监管部门实际上还没有允许寿险公司公开上市，因此没有一个竞争性的股权市场，对出资者来说，寿险公司资本的流动性极低。这样的产权结构导致了两个不良后果，其一，对寿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缺乏长期激励的制度。因此，将会影响公司长期生存和创新力。其二，缺乏流动性高的股权市场，寿险公司的投资者在“用脚投票”的机制难以奏效的情况下，要承担较高的流动性风险，理所当然地可以要求获得流动性风险的溢价，股东对短期收益的关心程度高于对长期收益的关心程度，不大愿意将资本收益进行再投资，而资本实力是寿险公司扩展业务规模和提高长期盈利能力的关键。并且，寿险公司在开业初期，要在销售人员佣金、人员培训、营业网点建设等方面付出相当大的固定成本，这

些固定成本要在今后若干年内摊回。初期投入不足，在表面上可以提高寿险公司的短期利润，但是却会损害其长期竞争能力。其三，股权流动性弱，限制了寿险公司通过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交易来优化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能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低。

企业组织结构不受理。受监管政策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中国的寿险公司通常采用的是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置分支机构的组织方式。在 1996 年的《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中，寿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的程序是按照保费规模大小，分别向不同级别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请。在过去依靠行政干预进行竞争的时候，一些寿险公司也乐于形成和行政机构同构的组织结构，以便和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合作。但是，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行政化组织结构，造成了机构重叠，信息阻塞，条块分割，增加了企业内部协调的组织成本，也降低了企业组织效率和市场反应速度。这样的组织模式一旦形成，内部既得利益者就会形成组织结构调整的障碍，改革非常困难。“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结构也不利于寿险公司在各产品序列上发展专业化的管理能力，没有专业化，即使企业规模庞大，也不能充分地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因为取得规模经济优势是有前提的，即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产品序列的固定成本在保费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如果没有专业化，寿险公司必须在每一个级别的机构中重复设置大量的公共部门，固定成本占保费的比重下降速度就会减慢。

管理经验不足、技术手段落后，内部人力资源政策的设计受到外部文化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制约。人力资源政策竞争性不足和投入不足制约了寿险公司内部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管理技术进步的速度。

4. 寿险公司对经营环境变化的反应

金融监管环境和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经济周期的变化，使中国的寿险公司必须面对传统市场利润空间迅速下降的困难，寿险公司自身

的弊端也导致其经营成本增高。中国的寿险公司对当前的经营困难的主要反应是:

调整产品结构,压缩或放弃期限短并且成本高的某些团体业务。1998年北京市场上,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和平安寿险的团体业务保费收入比1997年同期明显下降。除此以外,1998年,各家寿险公司还开始推出利差返还型险种,拟议中的利差返还险种对长期寿险将给予5%的固定利率,并将银行存款利率高于5%部分的投资收益返还给客户。

裁撤冗员,提高营业职场利用效率,降低成本。1997年以前,除个别寿险公司以外,个人寿险销售战略主要是快速增员、快速脱落的“人海战术”,业务员的留存率和活动率低(留存率指寿险公司的业务员经过一定时间后还留存在公司的比例,通常有第13个月和第25个月的留存率两种主要的计算方法;活动率则是指计算期有业务收入的人数与全部业务员人数的比例)。国外一些优秀的公司,如伦敦人寿,其第13个月的业务员留存率可以达到80%以上,而中国的寿险公司则在50%甚至更低。业务员留存率和活动率低,人均保费收入难以提高,同时还浪费了公司职场和培训费用,销售平均成本居高不下。为了降低成本,一些公司进行了大幅度裁员。

改革内部体制,提高经营效率。为了降低经营成本,适应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各寿险公司将改革内部管理体制摆在了重要的位置。其中,改革力度最大的是平安保险公司,平安聘请国际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进行企业诊断、全面改革其企业管理体制。即使是国有企业特点最显著的中保,其部分分支机构也在进行划小费用核算单位等改革。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一些分支机构则加强了中高级营销管理人员任职的竞争性。泰康人寿在人力资源政策、财务政策等方面也正在进行重要的改革,力图建立以岗位评价为核心的薪酬制度,推行关键业绩指标的目标管理体系。

三、中国寿险业的发展趋势

面对1997年以来出现的经营困难,中国寿险企业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在这些对策中,有些是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有些则是为了克服暂时的困难进行局部改良。中国寿险业的转型才刚刚开始,真正实现寿险业的现代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认为,中国寿险业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如下特点:

1. 整体增长潜力仍然很大,寿险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地位将不断提高。首先,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层次将会逐步提高,寿险需求将会继续增长。其次,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居民金融资产目前仍以银行储蓄为主,随着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会进一步多元化,寿险公司的产品将在居民金融资产组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三,中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会推动寿险需求的增长。中国主要城市正快速进入老龄化阶段,对老龄人口的赡养负担比例正逐步提高。第四,中国的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正随着经济增长逐步推进,现在的大量农村人口将来会成为新的寿险需求主体。第五,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目标是逐步降低待遇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只提供基本的保障,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目前的社会保障待遇在收入中的比重会相对降低(有关定量预测模型在另文描述)。随着中国寿险业规模的迅速成长,寿险业控制的资金将会稳定累积,并且主要是长期资金,寿险业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会不断提高。

2. 寿险市场国际化程度提高,有利于提高中国寿险业的管理水平。包括寿险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是难以逆转的。中国政府深化金融改革、开放金融市场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府认为,外商投资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直接货物贸易的重要性,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金融市场的实际意图并未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减弱。在开放金融市场的秩序选择中,银行和保险市场的开放处于前列。目前,中国的保险监管部门对外资进

入中国寿险市场还有一定的保护措施,鼓励参股,并将外资参股最高限额规定为股本总额的25%,单个机构参股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5%。中资寿险公司对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态度,也比1990年初讨论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时候,有了明显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有所减少,转而希望通过外资参股来获得技术援助,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这无疑明智之举。事实上,在中国寿险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已经吸收了外商资本。

3. 寿险市场价格竞争仍将继续,服务竞争重要性提高,公司控制权竞争未来将会出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寿险公司的管理水平和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通过改进管理、寿险险种定价中的附加费用率,特别是管理费用率还有降低的余地。中国寿险市场的竞争主要还是在销售领域,表现在价格或服务竞争,通过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来扩展市场的竞争方式还没有出现。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流动性还很低,特别是寿险公司的股权流动性低,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高,购并等控制权竞争手段的运用难度大。但是,中国寿险业的资本结构已经为公司控制权竞争埋下了种子。因为,除新成立的两家寿险公司以外,中国的寿险公司面临资本充足率不够的问题。

4. 寿险公司业务多元化及其与其他金融产业的融合趋势。在1995年《保险法》实施以前,中国的保险公司可以兼营寿险和非寿险业务,只是需要在内部分帐核算。并且,只要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运用计划,寿险公司的资金可以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保单贷款等多种途径。在法律上,寿险业务和非寿险业务以及其他金融业务并没有严格分离。因此,早先设立的保险公司的业务都是多元化的。《保险法》颁布以后,同一公司不得兼营人身险

和财产险业务,保险公司的资金也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投资项目,并且明确限定不得向企业投资。《保险法》的颁布,确立了中国人身保险业务、财产保险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商业银行业务以及信托业务之间的分业经营模式。从立法者的意图看,上述金融业务之间的分业经营,主要是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在金融市场发展初期,金融监管部门的间接技术性监管能力不够,通过分业管理来控制金融风险是相对有效的措施。但我们认为,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体制并不是保障金融体系健全性的关键。保持金融业稳健性的关键,是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和金融企业财务稳健性的监管技术指标体系。并且,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并不能为了稳定而过度地牺牲效率,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不仅需要安全性,也需要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体系。因此,政府不应该将金融机构不破产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适当的竞争和通过破产机制,迫使效率低下的金融企业退出金融行业是必要的。在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管技术性指标的控制之下,允许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相互竞争,可以使消费者更便捷地获得多种金融服务,这是符合消费者利益的。因此,我们主张,在提高技术性监管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放松对寿险业开展其他金融服务的限制。并且,从金融业自身的发展看,通过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来延长自身服务的价值链,这是金融企业在市场竞争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寻找的一条提高利润空间的道路。●

①参见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中国金融展望(1998年)》。

责任编辑:谭湛明

知识经济为价值转化工程学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 李京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1999)10- 0053- 03

今天我很高兴地参加全国第二届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暨“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专题学术研讨会,感谢研讨会的主办单位良好的组织工作和热情的接待。

这次会议给我提供了与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共同交流切磋与学习的机会,我原来对价值转化工程了解不多,第一次研讨会没有参加,昨天到会后,利用晚上和今早的时间匆忙阅读了黄锦奎同志编著的《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这本书,内容很丰富,应该说是巨著。刚才听了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发言,特别是听了价值转化工程的发明者黄锦奎同志的发言,深受教育。我想谈三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价值转化工程这一理

论,刚才有专家讲应该称“学”,即“价值转化工程学”,我完全同意。它的提出和进展是我们国家社会科学和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性新成果。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价值转化工程提出的理论有很多创新,本身自成系统,看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书中有许多学者介绍他们进一步研究的内容,我同意价值转化工程学是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的强盛一门非常重要的新学科。特别是在“转化”这两个字上,我觉得创新意义非常大。我们的科技、资源、知识,不通过转化,成不了价值,低的价值变不了高的价值。这里强调了价值转化的意义、分类、途径、规律、条件、效果

*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经济与管理评审组召集人。本文系根据作者在全国第二届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录音整理而成,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题目为编者所加。

等,研究已初具规模。当然这还是一个新学科,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完善,但学科的框架已建立起来了。这一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各方面的资源,从总量上讲,是很丰富的。不论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丰富,从质量上讲也不低,有很多高级水平的科学家,自然资源也很齐全。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经济发展不快,主要的就是没有把低的价值转化为高的价值,没有把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价值,缺乏这样的机制、环境、条件、动力,价值转化工程对它们的转化进行了全面研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去,将会大大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我在十多年前,经过国家科委向中央领导提了建议,在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两句话之后再加上一句,科技进步是富国之源。国家科委为我这个建议登了两次简报。随后不久中央提出了科技兴国。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财富的增加,主要靠科学、知识的价值转化。经济政治体制是转化的条件,转化的保证,人力资源、财力等是价值转化的要素,没有科技进步,这些条件、因素发挥不了作用,有了科技进步,才能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社会财富。我觉得价值转化工程理论与我著的《科技富国论》一书观点不仅一致,而且比我讲得更清楚。因为强调了转化,没有这种转化,国家同样富强不了,这一理论的提出与研究、发展,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现在价值转化工程学的研究基本由黄锦奎同志的一人扩展到社会许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它的发展与扩展,会成为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新兴的学科。我希望成为钱学森所讲的十大分

类之外的第十一大分类的大学科,当然这需要大家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了多少年、多少学者的努力与革命实践,才逐渐形成,而第十一大学科提出不久,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一个长期不懈的探索发展与深化。

第二点意见是,这次会议的题目是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我很同意黄锦奎同志提出的知识经济为价值转化工程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前景,也同意他对这二者的关系的分析,我认为这二者的关系是双向的。首先,知识经济社会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科学知识、高科技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文条件、社会环境逐渐成熟的体现。知识经济不可能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出现,尽管我国古代有很多大学问家,如孔子、老子有很大的学问,西方古代也有许多大学者,他们的话,即使在现在来看,也是极有哲理的,但在那样的社会里,形不成知识经济,因为生产力太落后。所以知识经济的出现,科技的飞速进步,靠高科技的发展,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展,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价值转化工程既是促进实现潜在的价值全面转化为现实价值的科学的方法,是促进低价值转化为高价值的重要的理论方法。所以,价值转化工程这一新学科是近几年提出来的,实际在实践中人们一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这样做。知识经济的到来,有赖于价值转化工程的发展,现在创立了这一新学科,可以更自觉地促进转化,加快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它们的关系,我们首先要肯定价值转化工程为知识经济创造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到来,确实为价值转化工程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条件,因为价值转化工程的特点,的确是把知识看成是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知识

经济时代也使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资源。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知识的发展、运用,取决于掌握知识的人的作用的发挥。所以,价值转化工程在迎接知识经济社会到来的过程中,将如鱼得水,会迎来更大的发展和更广泛的运用。所以,我赞成黄锦奎同志提出的,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是个大课题,这个课题已破题,万事开头难,最难的是破题,现在已走了第一步。黄锦奎同志发言中提出了十大问题,有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我非常支持也愿意参加这种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取得巨大的成果,然后再召开第三次研讨会。

第三点意见,我希望深圳能率先成为我国知识经济出现的第一个地区,成为价值转化工程取得重大成果的第一个地区。这是因为深圳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快的一个地区,在几个特区中,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的研究,第一个发展战略的制订我参加了,第二个发展战略的规划,是我主持的,我们搞的是深圳90年代发展战略,标题是深圳要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认为深圳有高速、高质量和创新精神,现在深圳的条件、基础、人才等更好,完全有条件率先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由此要率先将价值转化工程由理论研究率先转入实际运用,在理论指导下展开实践,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升华理论。当然,在我国理论界还有人对于知识经济有不同看法,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主要是认为我国现在离知识经济社会还很远,不要去谈。我出了两本书,关于知

识经济的。出了以后,有的好朋友,也是大学问家,说你有精力,去研究国企改革,知识经济还很远,可放后研究。我说,第一,国企改革研究的人多,比我强多,并不缺我一人;第二,知识经济是一个发展规律,我第一本书叫做《知识经济:21世纪的新经济形态》,解释了什么是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分配、应用为主要因素的经济。现在有些学者在讲述知识经济定义时引起了有些人的两个误会,一是农业、工业社会难道不要知识?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难道不要能源、粮食,不用吃饭,吃知识?传统工业界的同志坚决反对,没有我们你吃什么,你还大谈知识。所以我在第二本书批判有人提出的定义,认为还不完善,有缺陷,绝对化,应该加“主要”两个字,知识经济还是要粮食、能源,但以知识为主。没有物质的社会是死亡社会,会饿死、冻死,但没有知识绝对不可能,有了知识会有物质。

有一条我认为,不要各个省、各个地区都来搞。像前几年搞开放区那样,应该重点搞。一个上海、深圳、北京,三个地方可考虑率先搞知识经济。去年在深圳我讲过这个观念和倡议,深圳要有这个规划,深圳有这个条件,有人才,像黄锦奎同志,既是领导者,又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创造了新的知识。所以,深圳不仅是经济特区、经济城市,应该说,也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的人才。所以,深圳不仅是价值转化工程学的理论创造者,也要成为价值转化工程的率先实践者。●

责任编辑:冯生

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研究新成果

——“全国第二届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综述

□ 本刊记者: 有才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0- 7326(1999)10- 0056- 02

著名青年学者、经济学家、深圳市南山区委副书记黄锦奎编著的《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一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近日起在全国发行。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等单位为此于9月3~5日在深圳召开了全国第二届价值转化工程学术研讨会暨“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专题学术研讨会。著名经济学家李京文等全国60多名专家学者和经济企业界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黄锦奎系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深圳市杰出专家、价值转化工程创始人。他的学术专著《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一书获国家图书奖、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优秀社会科学成果特别奖,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一书40多万字,是黄锦奎的第五本学术著作。

与会学者认为,黄锦奎创立的价值

转化工程自1992年问世以来,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专家学者及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几年来,不但在全国科研机构、重点高等院校中形成了一支比较可观的研究队伍,而且在全国形成覆盖于各行各业、城市与农村不同层次读者群中庞大的业余实践型研究网络。它的提出与进展是我国社会科学和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性新成果,对于发展我国知识经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在研讨中,学者们认为,价值转化工程经过黄锦奎同志一人的创立已扩展到社会许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参与,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而且在黄锦奎同志提出的价值科学新体系与价值转化工程学的学科框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已具备了称“学”的条件,应该称:“价值转化工程学”,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价值转化工程新学科体系。

与会学者围绕着“知识经济与价值

转化工程”这一主题进行充分讨论,一致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价值转化工程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价值转化工程是知识经济的现代智力工具,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按价值转化论与价值转化工程观点,知识经济所讲的知识,就是将价值低的东西改造成为更能满足于人类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的价值高的物质的“窍门”,实质上就是价值转化工程。与会学者针对知识经济价值转化的生产力要素分析、知识价值转化的指标构建、产学研的价值转化工程、价值转化与资源优化配置、价值转化与投资风险机制框架、实现知识价值转化途径、价值转化链、价值转化工程与科技创新体系、货币价值转化工程、知识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会代表认为,知识经济的到来,为价值转化工程学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与条件,知识经济使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资源,而价值转化工程把知识看成是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价值转化工程学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过程中将如鱼得水,会得到更大的发展与更广泛的应用。

有的学者认为,价值转化工程学应抓住“价值转化”这个主题重点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黄锦奎同志在《价值转化工程》一书提出的五个方面转化:即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有害的价值转化为有利价值,无价值转化为有价值,低价值转化为高价值,有限的价值转化为无

限的价值。并建议从社会主义辩证法角度加深对价值转化工程学的研究,丰富这一学科。

对于进一步深化“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这一主题的研究,与会专家学者提出几个方面的研究建议:(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研究;(二)现代价值科学新体系、价值转化学及价值转化一般规律的拓展研究;(三)知识经济基础理论与价值转化工程学体系的研究;(四)西方知识经济有关的理论:包括“新经济”理论、新经济周期理论、新通胀理论、无通胀经济、新增长理论、数字经济理论、信息高速公路经济学、知识管理理论等与价值转化工程在知识经济中的应用研究。

代表们认为,“知识经济与价值转化工程”是一个大课题,涉及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许多综合科学领域,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者共同参与和合作,不断探索与不断地完善。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将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价值转化工程学的研究,不断地取得新成果,为创立走向大科学体系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经济学,建立人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体系的第十一大学科体系——现代价值科学新体系,发挥价值转化工程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现代智力工具和理论基础的作用,为发展我国知识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

责任编辑:冯生

马克思实证辩证法初探

□ 鲁克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2)

[关键词] 实证辩证法 抽象 理想化抽象法 理论模型

[摘要] 本文认为, 真正能代表马克思研究方法的, 是实证辩证法。所谓实证辩证法, 是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研究方法上的具体体现。实证性是其基础, 辩证性是其核心。实证辩证法的辩证特性主要表现为理想化抽象法, 这是一种真正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形成, 是其长期经济学研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20 世纪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的批评, 马克思在 19 世纪就已经完成了。

[中图分类号] B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1999) 10- 0058- 05

近年来,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关注的焦点也已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扩展到马克思的一般研究方法。其中, “从后思索法”、“猴体解剖法”、科学抽象法、实证方法等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基本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理解也一直存在很大分歧。早在马克思在世时, 就有人把马克思看作黑格尔主义者, 有人把马克思看作经验主义者。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倾向于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实证科学, 如梅林就说: “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 但我们觉得, 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 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曲判了这种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再是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做法。如柯尔施就力图排除乃至否定马克思学说中的“经验社会科学的因素”。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阿尔都塞则把成熟的马克思看作是认识论上的反经验主义。本文认为, 真正能代表马克思研究方法的, 是实证辩证法。

一、何为实证辩证法

所谓实证辩证法, 是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上的具体体现, 两者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实证性是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基础。马克思说: “在形式上, 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③马克思在研究中认真探讨实际经济过程的每一个细节, 使概念的规定和改造建立在充实的材料基础上; 总是着力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实际矛盾进行具体研究, 注意收集和积累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比如马克思曾经写信给恩格斯: “我在经济学的写作中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想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实际材料, 因为这在理论著作中是找不到的。”^④从 1859 年 1861 年, 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对各种官方统计资料和工厂视察员的报告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同时尽可能地收集和了解实际的生

产和流通等方面的情况。马克思还掌握了许多有关工人阶级生活及其与资本家矛盾的第一手资料,密切注视当时英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形势,阅读各主要报刊,并作了必要摘录和索引。总之,经过数十年的《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基本上把握了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的世界经济脉搏。

马克思还非常注重对历史上的经济矛盾和经济学材料的收集和占有。他阅读并分析了大量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并写了《剩余价值理论》。通过经济史材料的收集和占有,使马克思更加明确了现实经济矛盾的来龙去脉。

因此,马克思公开承认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不意味着他背离了实证方法。熊彼特说,马克思“因他的论证和黑格尔的论证之间可能找到某种形式上的类似而感到高兴。他喜欢证实他的黑格尔主义和使用黑格尔派词汇。但也止此而已。在任何地方他也没有背叛实证科学而依附于形而上学。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里,他自己也这样说过。分析他的论证,足证他在那里所说是真的,不是自欺欺人的。他的论证是根据社会事实的,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都不出自哲学领域。”^⑤

辩证性是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核心。这种辩证特性主要表现为科学抽象法,具体来说就是“理想化抽象法”。人们常说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实际上仍语焉不详。应当说从具体到抽象在马克思那里具体表现为“理想化抽象法”。

从具体到抽象,可以有很多种情况。所谓抽象,包括分析的抽象和理论的抽象。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本身就是一种抽象法(分析的抽象)。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等人的“任意的抽象”、“强制的抽象”,

提出了“理想化抽象”方法。即先构造一个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理想的东西”,如理想“价值”,再通过对理想事物的研究,概括出事物的规律。可将此称为“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运用于现实时,再充分考虑干扰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引入相应的约束条件,对规律的表现作相应的调整,以更好地解释和符合现实。

实际上,此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常用方法,如真空状态下的自由落体运动。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是近代科学的两大工具。实验就是一种理想化方法。没有实验造就的理想状态,科学家就无法“拷问”自然界,数学方法也就无用武之地。马克思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定、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⑥列宁说:“在解决某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起码的一条,就是要求首先抓住最典型最不受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影响的情况,在弄清情况之后,再深入一步把这些局外的和复杂的环境一一加以考虑。”^⑦

马克思经过长期的经济学研究,构造出理想的“价值”、“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论等经济学规律。《资本论》第一卷集中阐述了这些理想状态下的规律,第三卷则是这些理想规律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表现。由于第一卷所阐述的经济规律在引入现实的约束条件下可以很完美地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因而表明这些规律是科学的,也说明马克思构造的理论模型是成功的。

理想化抽象方法并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容易的事。可能所构造的理想事物会不合用,也可能从理想事物那里提炼不出规律性的东西。总之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并且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马克思的实证辩证法决不是经验主义任意的或强制的抽象,更不是僵化事实的汇集,是真正科学的方法。

二、马克思实证辩证法形成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与辩证法的“重逢”和对实证主义(不是实证方法)的自觉疏远。这种转向主要不是由于外在的推动,而是马克思长期经济学研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第一,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马克思即使在早期推崇实证方法的时候,对经验主义仍持保留态度。如他说:“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⑧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越来越感到单纯经验论的不足,说“他们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⑨后来,马克思干脆把经验主义叫做“粗浅的经验主义”。

马克思还批判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作为经验主义的新形态,当时在英、法等国已经很流行。实证主义把对事物内在“本质”的探求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对此马克思很不满意。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说:“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⑪这说明马克思对孔

德实证主义非常反感。马克思干脆把它叫做“腐朽的实证主义”。^⑫

第二,马克思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辩证法。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放弃了用否定性辩证法论证共产主义的尝试,但却保留了“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哲学前提。没有这一前提,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何以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就令人费解。可以说,没有矛盾辩证法就不会有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了正面论述,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⑬这实际上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隐性逻辑的矛盾原则显性化的表现。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没有放弃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如在《巴黎手稿》中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⑭在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他特别注重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并将其升华为“理想化抽象法”。

第三,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形成还与其明确区分庸俗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密切相关。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期,马克思尚未形成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相区别的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两者的区别还是初步的,到《剩余价值理论》时,就非常明确了。他认为,斯密既力求运用抽象思维,又有一套描述现象的方法,即斯密二重方法论。斯密之后,李嘉图坚持斯密抽象法,而庸俗经济学从萨伊开始,与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抽象法相对立。庸俗经济学注重作各种现象表面联系的归纳,尽量以现象间的

表面联系来取代古典经济学已经认识到的本质规定。他们甚至会吸收许多新的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力图保持理论的“逻辑一贯”,但绝不会揭示现象间的本质,只是对现象间表面联系作一种最肤浅的分类性描述。因此,庸俗经济学完全放弃理论的抽象,把现象的描述作为方法论的原则,将思维囿于现象的表面,只从“看得见”的各种范畴来论证。马克思则坚持对现象的本质的认识,并通过理论的抽象来达到本质的认识。

第四,马克思不满于“任意的抽象”和“强制的抽象”,力图探索一种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说,在詹姆士·斯图亚特那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还处在从它们的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因而表现得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⑮马克思虽然肯定了李嘉图坚持抽象法,但又认识到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才使他采取了错误的抽象。”^⑯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⑰他想通过强制的抽象把多种多样的现象只归结为唯一的一种情况。”^⑱马克思把这种做法称为“非常粗暴的和理论上软弱的抽象”。马克思还指出:“经济学家正是把这一方面——不仅是一种任意的抽象,而且是一种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消失的抽象——确定下来,以便把资本表述为任何生产所必需的要素。当然,他们这样做,只是由于他们任意地把一种要素确定下来。”^⑲“强制的抽象”和“任意的抽象”都不可能达到科学的认识,因而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逐步探索一种科学的抽象法。

第五,重读《逻辑学》,促使马克思将其实证辩证法思想明确化和系统化。通过1844至1857年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

种方法以实证方法为基础,但又超越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具有辩证的特点。与辩证法的“重逢”,促使马克思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作自觉反思。马克思1858年1月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了给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⑳这种方法论自觉在《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得到明确阐述,这标志着马克思实证辩证法的正式形成。

三、马克思实证辩证法与二十世纪科学哲学

近代欧洲哲学有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实际上也是研究方法之争。康德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得到片面发展,走向思辨唯心主义。出于对黑格尔的反动,现代西方哲学是从比经验主义更彻底的实证主义发端的。经过经验批判主义(实证主义第二代),到本世纪初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开始兴起。在本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经验主义在科学哲学家内部开始受到怀疑和挑战。波普举起了批判理性主义大旗,向康德回归。

近代科学由于与经验主义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不论是科学家(如牛顿)或是经验论哲学家,都把近代科学的成就归功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观念,而本世纪初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则将此推向极端。人们发现,作为科学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与现代物理学的实际不但不相符,甚

至是背道而驰,因为现代物理学恰恰是理性力量的产物。一旦突破了经验主义的狭隘眼界,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近代科学,人们便发现,近代科学也离不开理性。正如赖欣巴哈所说:“观察到的材料是科学方法的出发点;但是它们并不就是科学方法的一切。它们要得到数学解释的补充,而数学解释则是远远超出了对于已被观察到的事物的陈述的”。^①“牛顿物理学与两个世代以前弗兰西斯·培根所画出的归纳科学图式大不相同。单只是观察到的事实的收集,一如培根的归纳表所显示的那样,是永远不能引导科学家发现引力规律的。”^②

实际上,西方主流科学方法论思想从孔德到波普的 100 多年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在马克思一生研究方法的两次转向中得到浓缩的体现。马克思早期,几乎与孔德同时,大力倡导实证方法,拒斥形而上学。而当孔德热衷于阐发其实证主义思想时,马克思却已认识到单纯实证方法的局限性,并致力于探索一种更符合科学研究实际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实证辩证法与波普的试错法尽管内容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在经验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努力,得出科学的认识;都否认单靠经验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理论。

另一方面,科学理论还存在一个验证的问题。按照科学哲学的一般观点,科学理论要接受经验的检验(证实或证伪)。而把经验与理论相对照,首先需要运用演绎法从一般推出个别结论,以便与经验相对照。赖欣巴哈举例说:“牛顿自己清楚地看到,他的定律的真理性要经由它的内涵得到证实之后才能够得到确认。为了推导出这些内涵,他已发明了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微分法;但是这种演绎的光辉成就并不能使他满意。他需

要量值上的观察证据,于是通过对于月球的观察(月球的每月运行构成着他的引力定律的一个实例)来验证内涵。”^③这与马克思通过从理论模型到现实的应用以验证理论正确性的过程是一致的。实际上,现代西方经济学所常用的理论模型方法(如弗里德曼所倡导的方法),与马克思的实证辩证法并无本质区别。当然,由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尚未达到用数学公式表达的程度,因而在从理论模型到现实时,难免有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马克思经济学模型检验的可操作性,这是需要后人着力加以解决的。●

①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②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重庆出版社。

③⑥⑨⑪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 卷,23.8.256.19.340—341 页。

④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 卷,256.250 页。

⑤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第 16 页。

⑦《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302 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1995 年版)人民出版社,第 73 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 卷,923 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 卷,236 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 卷,144 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 卷,89 页。

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 卷。

⑯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 卷第二册,497.300 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 卷,169 页。

⑳㉑㉒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第 84.85.83 页。

试论理论思维方式对于 中华民族的重要性

□ 萧君和

(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广东 佛山 528000)

[关键词] 理论思维方式 中华民族 掌握世界

[摘要] 理论思维、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实践精神, 是人类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 中华民族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 站上科学发展的最高峰, 就一定要高度重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 加强理论思维的培养和训练, 自觉地以理论思维方式掌握世界。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1999) 10- 0063- 04

跨世纪的中华民族应该充分认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 自觉地以理论思维方式掌握世界。有鉴于此, 本人拟探讨理论思维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 并从“理论思维掌握世界”的来源谈起。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借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而指出: “整体, 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 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 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 宗教精神的, 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 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 就是在理论方法上, 主体, 即社会, 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①可见, 马克思所谓的“不同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 宗教精神的, 实践精神的掌握的”方式, 就是理论思维方式, 而人类可以用理论思维、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实践精神等四种方式掌握世界。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理论思维时指出: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综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理论思维、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实践精神是人类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 人类可以用这四种方式掌握世界, 但是, 现代的先进的民族总是用理论思维方式掌握世界。这是因为生活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现时代, 先进的民族为了使自己发展壮大, 都在发展科学, 都希望登上科学的高峰, 而要登上科学的高峰就得用理论思维来认识世界、掌握世界。

一 理论思维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由于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 理论思维是人们运用这些结论、理论进行思维的过程; 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把所获得的感觉材料, 经过

思考、分析,加以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甚至理论的过程,因而,只要稍加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理论思维与理性认识有着一致的相似的关系。

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③毛泽东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④毛泽东还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⑤显然,列宁和毛泽东的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理性认识或理论思维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可以适用于每个人,也可以适用于每个“大写的人”——每个民族。就是说,每个民族要认识、反映对象的全貌、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规律,就应该凭借理性认识或理论思维。而只有这样做,这些民族才能够登上科学的高峰,成为现代的先进的民族。

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科学发达的国家民族,走在发展前列的国家民族,都是没有离开理论思维的国家民族,长于理论思维的国家民族。德意志国家民族就是众所周知的长于理论思维的国家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长于理论思维

或理论思辨,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爱因斯坦、普朗克……就是突出代表。正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长于理论思维或理论思辨,所以它的科学一直比较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一直比较高。虽然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历尽坎坷曲折,可是,用不了多久,它又以崭新的朝气蓬勃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显而易见,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理论思维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要想成为现代的发达的国家民族,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

二、理论思维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

(一) 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如要登上科学的高峰,成为现代的先进的民族,就要以理论思维掌握世界。

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里的一棵参天大树,中华民族儿女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世上各个民族共同具有的东西,中华民族都会具有。因此,中华民族必然和其他民族一样,具有以理论思维、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实践精神为方式来掌握世界的可能性,可以以理论思维、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实践精神为方式来掌握世界。不仅如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国家民族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理论思维、逻辑论证和推导又是科学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和手段,这个道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深信这个道理、真理,有着登上科学高峰,成为现代先进民族的愿望的中华民族,就要大力发展理论思维,努力以理论思维来掌握世界。

(二) 中华民族匮乏以理论思维掌握

世界的传统,作为补缺就更加需要以理论思维来掌握世界。

思想解放的先驱顾准以“中国思想是贫乏的”为题,尖锐地指出:“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素。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⑥顾准这段话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不过,统观顾准关于“中国思想是贫乏的”的整段论述,我们要说:顾准所谓的“唯理主义”,不是外国哲学史上所说的“唯理论”或“理性主义”,而是对理论思维或理性认识的强调或重视。顾准的意思是说,中国没有对理论思维的重视,甚至没有理论思维,所以,中国思想是贫乏的。这一意思也可倒过来说:中国思想是贫乏的,其主要表现就是中国没有对理论思维的重视,甚至没有理论思维。因此,顾准所说的“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这就是:“中国缺乏理论思维,缺少以理论思维掌握世界的传统”。对于这个沉重结论的最好证明是:中国古代匮乏以求真精神、批判精神、实证精神为内核的科学理性,缺乏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一百多年来学界时有论争,但近期的论争是由回答“李约瑟难题”引起的,这“李约

瑟难题”的内容是:“为什么在15世纪以后,中国人在工艺技术上的发展停滞了?为什么在15世纪以后西方世界有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中国人没有同样的发展?”经过我国学者理解后的转述,“李约瑟难题”也可表达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世界,为什么到了近代却落后了?”或者说:“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

针对“李约瑟难题”,我国台湾的著名科学家吴大猷认为,“古代中国超过西方的大多是技术,不是科学,技术与科学不能混为一谈。没有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是有限的。这才是中国长久以来科学发展不及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⑦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在题为《现代科技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的文章中指出:“尽管中国人民有很高的智慧和才能,创造了高度的古代文明,但在现代意义上的、以有控制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推理为基础的科学没有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⑧

值得注意的是伟大的科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也持“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观点。他认为,科学的基础有二,一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一是文艺复兴中发现的通过实验获得因果关系的方法。这也是使科学有别于其它系统知识的特性。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就因为如此,爱因斯坦说:“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⑨

显然,根据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客观的判断,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古代有的是技术,而没有科学。或者,确切一点说,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正如周光召所说,“中国长期的封建经济,造成了对商人不太重视的观念和自给自足的

经济,没有开拓市场,特别没有开拓海外市场,使得中国的生产力得不到大规模的发展,因此没有推动科技发展的市场动力”,“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学院或者研究机构,这是指研究自然科学的专门机构。所以科学知识不能积累、系统化,不能上升为理论,并且广泛地去传播。很多的发展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够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封建统治者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宣传推广。不但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中国“当时自视甚高,把自己看做世界的中心,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最高的水准,所以不愿意去吸收外来先进的科技和文化”,^⑩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原因。然而,除开上述原因,还有一个很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由于儒家、道家、禅宗思想教育,对于事物本质不求甚解,缺少科学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训练,思维还没有蜕掉原始思维的老皮,因此很难在实践经验中,在具体的工作中,抽象出具有实效的理论。思维的遗传基因使中国古代文明成为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技术”。^⑪与此相联,也由于儒家、道家、禅宗思想教育,我们中华民族传统富有的是讲究伦理道德,讲究人际关系,“经世致用”,“观察在常事日用,服务在工商耕稼”(章太炎)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而同时就抑制了科学理性的发展。因此,“中国人缺少的,并不是经验和技術所含的科学性,缺少的是理论研究,即把这些经验归纳、总结、抽象出、概括出具有规律性的公式,揭示原理”的理论思

维。^⑫一言以蔽之,中国人缺少的是理论思维,以及以理论思维方式掌握世界的传统,这事实上也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可见,“中国人想要改变经济或科学技术、理论方面的落后状态,首先要改变的是思维方式”,首先要强调的是“应重视唯理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去总结公式,去探求原理,使实践经验公理化”。^⑬总而言之,中华民族要彻底改变经济或科学技术、理论方面的落后状态,成为现代的先进的民族,就应该高度重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加强理论思维的培养和训练,自觉地以理论思维方式掌握世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③《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④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291页。

⑥《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⑦转引自范建荣《如何面对〈李约瑟难题〉》,光明日报1998年3月20日。

⑧⑩《中国教育报》1998年9月20日。

⑨转引自田松《鸡与鸭与李约瑟》,中华读书报1998年6月10日。

⑪⑫⑬董小英《科学与理论》,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30日。

责任编辑:冯生

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规律性初探

□ 马中柱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50)

[关键词] 中华民族凝聚力 规律性 发展

[摘要] 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 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规律性是: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特定的环境中, 由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每当社会动乱、民族分裂时, 则以进步势力为核心、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动力, 重新凝聚起来, 并焕发出强大的力量; 在与外敌抗争并克服内部离散力过程中, 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保持和发挥出来; 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我们民族振兴、国家强盛的根本保证。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10-0067-06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中华民族凝聚力, 推动和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团结奋进, 至今成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伟大民族。江泽民指出: “在当今世界上, 综合国力的竞争, 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①所以, 探索和掌握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规律性, 对增强和扩大这种力量,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反对霸权主义, 有着重大意义。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特定的环境中, 由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区域, 幅员辽阔, 四周有自然屏障, 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汉族聚居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地带, 少数民族主要居于东北、西北、西南的边隅。黄河、长江流域, 气候温和, 雨水充足, 地势平坦, 适于农耕发展, 环境较为优越, 而边隅则属高原、丘陵、大漠、森林地带, 虽然地大物博, 但高寒亢旱, 植被稀疏, 生存环境较为恶劣。不同

的生存环境, 对汉族发展成为主体民族, 少数民族倾向于向内地发展, 具有很强的内聚力。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 除了地理环境因素外, 还有血缘因素、亲缘因素, 但是, 最重要的还是由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 从事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 最先开展了“第一次变革的浪潮”。《第三次浪潮》一书作者阿尔温·托夫勒认为, “农业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头一个转折点”, 在此以前, “人类大多往往生活在很小的部落中, 以采集果实, 捕鱼打猎或放牧为生”。^②从事农业经济的民族与从事采集、渔猎和放牧经济的民族生活差别很大。“凡是农业兴起的地区, 文明就在那里扎下了根”。^③那些以采集渔猎和放牧为生的民族, 只能利用自然界现成的东西, 生活在比较原始的状态中。中国汉族的前身“华夏之族”, 在夏代已较普遍从事农业生产,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由于使用铁制农具, 实行牛耕, 兴建水利设施, 生产力水平提高了, 推动着奴隶制度的崩溃, 封建

制度的产生。

封建地主经济的兴起,使家庭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结合起来。“男耕女织”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对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技能,积聚劳动时间,改进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积极作用;历代开明的统治者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出发,实行重农主张,奖励农桑,注意总结农业生产经验,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对我国农业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开始了对外贸易。中国的丝和丝织品,早在战国时期,已成为世界著名特产。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人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意思是丝国。罗马博物学者普林尼(公元27—79年)在其著作中,对中国铁器曾大加称赞,认为是优良卓越的产品之一。

可见,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了领先于全世界的、从春秋战国到“汉唐盛世”的农业文明。这使周边少数民族深受其惠。通过“马绢互市”、“茶马贸易”,少数民族以牲畜和牲畜产品与内地交换,换取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如粮食、茶叶、丝织品、麻织品、金属工具和用具、酒类等等,大大丰富和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并且促进了各自经济的发展。汉魏时的屯田,对引导少数民族由采集、狩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与当时的地主经济和农耕文明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国家制度,在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对保持社会稳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首先是减少了诸侯割据的战乱局面,有利于实现“大一统”,保持社会稳定。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互争雄长,兼并之风盛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汉承秦制”,汉以后各王朝都继续实行郡县制,这是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保护农业生产的。虽然在统一过程中,合了分,分了合,反反复复,但总的趋势是合长于分,合的范围不断扩大,合的

稳定性不断加强。

其次,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官僚机构相对精简了一些。有的学者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总人口与财政负担的人员的比例进行了研究:“汉代时大致为 8000: 1,唐代 3000: 1,清代是 1000: 1”。④封建官僚的选拔任用,比之分封的世袭贵族领主,素质要好些。汉代开创出以品行德学为标准的“选举”制度,推举“贤良方正”之士做官;唐以后创立考试制度,开科取士,都有利于统治者网罗人才,充实官僚队伍。并且这些人在任职期间,其行为要受国家一定法纪约束,也有少数清官廉吏出现,这是有利于社会政治有序运作的。

第三,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社会意识形态,适合于维护封建的政治经济秩序。春秋战国时期在人文学说上出现了百家争鸣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实行焚书法令,企图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到了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提倡由董仲舒所加工整理的《公羊春秋》。董仲舒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统一起来,把向来被看做“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儒学,不但对西汉统一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对巩固以后的封建秩序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中华民族在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央集权的政治上层建筑又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社会意识形态,适合于维护封建等级的政治统治和家庭土地制度,这就使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在不同时期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封建社会初、中期)。这种局面保证了人民休养生息,缓和了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国力增强,人民安居乐业。这种局面也吸引了周边少数民族内附,近悦远来。像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降汉,愿为守阴山;汉武帝时南单于比率南边八部四五万人内附,助汉守边,使北匈奴不敢大举南侵。盛唐时代,唐太宗被周边各族共尊

为“天可汗”，“入贡”、“请婚”的使者络绎于长安道上。

当然，在汉族统治集团内部以及统治者和农民的矛盾加剧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时，经济、政治、文化居于落后地位的少数民族会乘虚而入，以至入主中原，但由于汉族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 响，这些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⑤这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元、清两代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总是以进步力量为核心，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根本动力，而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由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历史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是直线式发展的。中国历史上绵延时间最长的是封建制度，这种制度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虽然相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原始氏族制度、奴隶制度是先进的，在当时条件下，对各族人民有一定吸引力，凝聚力；但是，由于它是一种剥削制度，是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有主张剥削应较有节制的所谓行“仁政”势力，这是封建时代的进步倾向；另一种是不顾农民死活，横征暴敛的腐朽势力。这两种势力斗争着：当进步倾向得势时，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比较缓和，出现“治平”景象；当腐朽势力得势，残民以逞，从而激起农民起义，打击和推翻封建统治，整个社会发生大分裂。这时候，周边少数民族，有的会乘虚而入，形成民族之间的战争。这样一“治”一“乱”相循环，“治”时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乱”中又遭受破坏。而且真正“治”的时间并不长。像汉朝“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统治的 54 年，也只有 93 年。“贞观之治”，即使算到唐玄宗开元时期

(从 627 年—741 年)，也只有 114 年。所以，封建社会进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受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本身的限制，它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奠定的基础带有脆弱、短暂的性质。每当社会动乱、民族分裂时，中华民族就会以进步势力为核心、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动力而重新凝聚起来。中华民族凝聚力正是这样曲折前进的。

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中起核心作用的进步力量，总是那些能够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体现中华民族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势力。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讲到中华民族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时，举出了四点：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这四种优良传统都是以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为目的的。坚持这些优良的民族传统，是民族发展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民族大义所在。所以，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发扬这些传统的社会力量，就成为社会进步势力，为全民族所拥戴，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政治核心；而违背这些传统的社会势力，虽然得逞于一时，但终必为全民族所唾弃，成为独夫民贼！这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历史过程中，已成为不可移易的通则。

历史上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锐意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总会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战国时代，七国争雄，秦国的社会改革搞得最早，从孝公开始，用商鞅“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无比的统一国家。荀子到秦国后写的《疆国篇》里夸赞秦国民俗的朴素，官吏的忠实，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静，认为是最好的政治；秦国的军制也比别国好。秦始皇在商鞅建立单纯的地主政权基础上，联合大商富贾和山东诸国的游士，使秦国的地主政权进一步加强，影响进一步扩大。所以，他即位后只用了 25 年时间（公元前 246—221 年），就如同摧枯拉朽一般，消灭了山东诸国，建立了专

制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秦王朝建立后,滥用民力,企图建立“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很快激起农民起义,“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使秦王朝“灰飞烟灭”。

历史上主张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力量,总是为全民族所拥戴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传统,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的。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主张天下“定于一”。⑥也就是“天下归于统一,就会安定”。荀子更提出:“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⑦的思想。由于民族分裂时代,战乱频仍,生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会使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所以,主张统一和团结的力量,是顺民意、得民心的。从东汉末至隋初四百年间,封建割据势力一直占优势,人民深受其祸。隋文帝杨坚革除北周暴政,用法宽大;加强了民族团结,深孚众望,终于灭周建立了隋朝。实现了南北统一,削弱了突厥的力量,取得边境的安全。所以《隋书》赞扬隋文帝在位时,“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⑧

历史上捍卫民族独立,反抗外族侵略奴役的力量,总是能成为凝聚全民族的中坚力量。南宋的岳飞,明代的戚继光、俞大猷、郑成功,清代的林则徐等,他们领导军民,抗击外国侵略者,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这些英雄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爱国力量,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中坚力量。虽然,他们由于受历史的、阶级的和思想的局限,只能一定程度上适应民族的要求,突出体现民族的某一优良传统,而对其他优良传统则体现不足,或有所缺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一定时期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近代中国,在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由于面对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他们联合起来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使得革命处在极其困难和残酷的环境中。这就要求在革命

中体现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核心力量,具有更加全面的素质。在某一方面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力量,虽然能够凝聚和形成一定的革命力量,取得一定斗争的胜利,但终究不免于失败。太平天国革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但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定都南京以后,由于农民本身固有的弱点,宗派思想、保守思想、享乐思想膨胀,互相猜忌,互相倾轧,内讧迭起,终致土崩瓦解。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卖国的清皇朝,使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从此结束。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微弱,他所能凝聚的革命力量的范围很有限,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使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

中国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彻底性,所以中国革命必需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凝聚最广大的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才最终取得了胜利。正像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⑨

三、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与外敌抗争,并克服内部离散力过程中保持和发挥其威力的

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的进步力量,在社会动乱、民族分裂、外敌入侵的复杂情况下,要保持、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就必须一方面坚决同外敌抗争,打败侵略者;另一方面同被外来侵略者收买、扶植的投降势力作斗争,制止他们为虎作伥、瓦解本民族的统一和团结、消磨本民族的反抗意志、破坏本民族的凝聚力。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中华民

族凝聚力才能巩固和扩大,国内外敌人才能被战胜。否则,中华民族凝聚力就会瓦解,成为“一盘散沙”,整个民族就难以避免被奴役的命运。这是从古到今的中华民族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唐代以后出现的五代十国,使中国分裂为一堆堆碎片,黄河流域的居民遭受深重的灾难,就是由于外不能坚决与东北方新起的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抗争,而内部又不能战胜分裂势力的投降活动,以致造成中国的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民族败类石敬瑭,为了做皇帝,不但向契丹称臣,而且拜契丹主为父,出卖河北 16 州土地,另加岁贡帛 30 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从此 16 州成为塞外游牧族入侵的基地,河北大平原已无险可守,不但契丹统治者随时可以侵扰中国,而在以后的女真、蒙古统治者也相继取得南攻的胜利。民族离散力酿成的苦果,危害四百余年。

在五代十国后期,周太祖郭威、周世宗柴荣,内修政理,整顿纪纲,减轻民困,休养百姓,当北汉主刘崇勾结契丹大举入寇时,亲自率兵抵御。当时朝中投降派出面劝阻甚力。周世宗力排投降派的议论和阻挠,从开封出发,亲自督促诸军,兼程前进。使军心振作,奋勇抗敌,终于击败北汉军和辽军。当时如果周世宗有软弱表现,投降势力与外族侵略者相呼应,不但周的灭亡在所不免,而且会使唐末大分裂的局面进一步加深。这场战争的胜利,使唐末大分裂局面开始转向统一。虽然郭威父子只统治九年(公元 951 年—960 年),但他们外抗辽国侵略,内部排除投降势力,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了加强,国力得到提高,代周而起的北宋,得以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封建主义依附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清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猛烈增加封建剥削的强度,在繁重的旧捐税上,又加上新捐税,用以填补赔款和鸦片的亏

空,剥削愈益残酷,人民愈益贫困。加上当时政治机关凶暴贪污,“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以致“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⑩在这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时候,中华民族凝聚力受到严重破坏,中华民族沦为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奴役的民族。

近代抗日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后,取得最后胜利的唯一一次战争。抗日战争胜利的取得,除了国际上的条件以外,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特别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面对这股逆流,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⑪统一全党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步调,也帮助党外人士清醒地认清形势,分清大是大非。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维护全民抗战的局面,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没有共产党为了坚持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进行坚决灵活的顽强斗争,抗日统一战线就会瓦解,中国人又会成为“一盘散沙”,难以逃避做亡国奴的命运。

今天,我们的国家是空前统一的,中华民族也是空前团结的。但是国外敌对势力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仍然在做“西化”、“分化”我国的美梦;台湾李登辉之流还在挟外力推行“台独”,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还在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霸权主义者往往利用别国的分裂势力作内应来干涉别国内政,以达到分裂、肢解和奴役这些国家的目的。我们在同霸权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必须同各种瓦解和分裂我们祖国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以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巩固。

四、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根本保证

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凡是民族团结巩固、民族凝聚力强大的时候,中华民族就兴旺发达,经济、政治、文化欣欣向荣。正像江泽民在参加西藏、新疆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所指出的:“古往今来,各民族人民密切往来,相互交流,精诚团结,并肩战斗,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国家。这是中华文明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⑫

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会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保持和发展强大的综合国力。历史上的“强汉盛唐”时代,就是由于民族凝聚力空前强大,内部各族人民团结,国家统一,与北方、西北方各民族或和亲、或联合、或内附,汉时共同对付匈奴,唐时共同对付突厥,使边境安宁,各族人民休养生息,把力量集中到生产上来,使农业、工商业繁荣,成为军事、文化极盛时期。而一旦中华民族凝聚力受到破坏,其结果必然是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经济破败,外族入侵,生灵涂炭。东汉末蔡琰(蔡邕之女)遭汉末之乱,被南匈奴掳去,后被曹操赎回。她在《悲愤诗》中,讲到战乱之后的荒凄景象:“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萑草对孤景,怛咤靡肝肺。”^⑬深刻地表述了民族分裂所带来的惨重灾难。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时,得出一条规律性的结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⑭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国内各民族团结,从本质上说,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问题。

但是,实践与认识并不是无条件地一致的,我们在这方面也有沉重的经验和教训。1957年以后,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在“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随后又发生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打

倒一切,全面内战”,破坏了人民的团结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使经济停滞,国力削弱,民族凝聚力受到损害。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才逐步加强和促进了人民的团结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20年来,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业绩。国内生产总值由1979年的3624亿元猛增到1997年的747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9.8%,并于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计划目标。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79元提高到6079元,剔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8.4%。到1997年,我国经济总量已位于世界第7位。世界银行的专家评论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已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广东由于毗邻港澳,同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华人联系密切,许多县市都是侨乡,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项政策落实得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加之亲情、乡情的凝聚力,使众多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回乡投资设厂,带回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大发展,使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由20年前在全国平均线以下的省份,一跃而在几项主要经济指标上成为全国第一;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1%上升到9.8%。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同广东具有对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华人的强大凝聚力这一优势分不开的。所以,江泽民号召:“各民族人民要始终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⑮●

①《光明日报》1999年6月16日。

②③阿尔温·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5—56、第65页。

④摘自香港《文汇报》,1998年3月8日。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广东考古五十年

□ 杨式挺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110)

[关键词] 广东考古 回顾 遗址

[摘要] 本文作者把广东 50 年来的考古工作分为初创期、发展期和兴盛期三个时期(阶段)进行阐述, 回顾、分析了广东考古 50 年历程的成就及得失。

[中图分类号] K87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 7326(1999) 10- 0073- 08

新中国成立至今, 广东考古工作的 50 年, 应有新篇。盖 50 年中, 上启旧石器, 下迄明清, 上下十万年, 考古发现日新月异、硕果累累, 不可无述。欣逢大庆, 愿作回顾, 惟挂一漏万, 还祈方家指正。

一、简略的回溯(1949 年以前)

广东的考古工作从广义上说开始于

1934—1936 年, 至今已经有 60 多年的历史。这里且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作一简要交代。

1932—1935 年, 英人芬戴礼神父等在香港的南丫岛大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青铜器、石范和夔纹陶。1935 年, 英人地质学者斯戈斐偕在大屿山石壁发掘到青铜时代的青铜器、石范和墓葬。1937 年, 我国考古学者陈公哲自费在香港考古, 于大屿山石壁发现了岩刻画, 在其他地点发现了新石器、青铜器和汉晋

⑥《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译注》,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第 12 页。

⑦《荀子·王制》见《荀子简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第 85 页。

⑧转引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 第 3 编第 1 册第 6 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5263 页。

⑩《万大洪告示》,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

代史》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47 年版, 第 83 页。

⑪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61 页。

⑫《光明日报》1998 年 3 月 8 日。

⑬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 第 222 页。

⑭《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363 页。

⑮《光明日报》1998 年 7 月 11 日。

责任编辑: 冯 生

历史文物等。这些文物,后来多被运往英国或已散失。

1934年,芬神父复至海丰(汕尾),发现多处史前遗址。1936—1946年,芬神父的学生、意籍麦兆良(1891—1953年)神父在海丰传教期间,继续在海丰汕尾一带以及粤东五华、龙川、南澳等县调查,发现颇丰。1975年,香港考古学会出版了他的《粤东考古发现》一书(英文版)。还有美国人卜瑞德、英国人卫戴良也在粤东作过调查。1942年春,中山大学杨成志教授和顾铁符,再到海丰等地调查,历经遗址16处,采获石器陶片上万件,并寻得麦神父采获的文物,一并拣选装箱,运往坪石。迨坪石失陷,文物多遭遗失。此外,潮州方志馆饶宗颐将1941年以来的调查发现,集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一书(1950年出版)。

广州地区这个时期亦有若干零星发现,后来收入叶恭绰主编的《广东文物》。

从以上数例,可以说明香港和粤东的考古始于本世纪30年代,同时亦可看出这个时期的考古,虽然也有中国的学者关注和发现,但在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不保护祖国文物考古事业的状况下,只好让外国一些“学者”、传教士到处自行其是,因而,不免深深地打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烙印。此外,当时盗掘古墓、窃取文物珍宝偷运出境,牟取暴利的事,亦时有发生。

二、初创期(1950—1965年)

新中国的建立,为祖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开创和新兴带来蓬勃生机。1949年10月,在政务院设立了文化部,下设文物局,负责管理全国文物事业。1950年以来,陆续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令和《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令等。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

1953年,广东省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2月,省文物工作队成立,7月开展了

文物普查工作(1955年底已经开始)。1957年筹备广东省博物馆,195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展览中就有文物考古发现成果部分。

这个时期的考古(不包括广州市,下同),以紧密配合工农业和城市基本建设为主,贯彻“两重两利”文物方针。

1959年4月,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建立起了8人的考古研究组,1961年春开展了梅县、大埔的考古调查;1961—1962年,考古组参与了省博在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西瓜岭以及佛山等地的发掘。由于国民经济的困难,1963年4月,考古组的4位同志并入省博文物队。另外,各地、县也先后建立了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机构。

省文物工作队在全省范围内(含海南行署)开展了广泛的文物普查和清理发掘工作。发现的古遗址、古窑址、古墓葬数百处(座),获得各种文物数以万计,发表一大批调查简报、报告和文章,为省、地、县博物馆举办展览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为以后的文物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58年6月曲江马坝狮子岩洞穴发现曲江“马坝人”头盖骨化石、1961年、1965年封开黄岩洞的头颅化石和一批打制石器、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南海西樵山的细石器和霏细岩双肩石器、潮安陈桥村新石器贝丘遗址、增城金兰寺遗址发现了“三叠层”文化堆积。

1962—1963年清远县三坑马头岗清理的两座东周墓,出土青铜器64件(实际数可能不止这些),揭开了广东有青铜器时代和经过奴隶制讨论的序幕。1962年在增城西瓜岭发现了一座以烧制米字纹陶为特征的战国龙窑,在始兴城郊白石坪发现一处以米字纹陶为特征的遗址(窑址),并首次发现两件铁斧铁锤和绳纹板瓦和瓦当的战国晚期遗存。

秦汉至明清的墓葬,除广州外,以韶关、英德、佛山、澜石等地数量最多、也最重要。1960—1963年,在韶关市郊罗源洞还清理了唐代张九龄及张九皋、张九章的墓葬。

古窑址中以潮州架笔山宋窑和广州西村宋窑等最为重要。

从以上列举的一些事例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考古,不论从人员的培养、机构的建立以至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的深度等等,总的看来,还处于“百废待举”的初创阶段。

三、发展期(1972—1982年)

“文革”期间,文物考古博物馆工作基本陷于瘫痪,但考古工作并非完全处于停顿状态。1971年底至1972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考古人员已发掘了封开江口的汉墓和封川隋墓以及德庆的战国墓等等。

随着资料和经验的积累,这个时期的考古人员,比较能够抓住最初发现的好苗头,心中有数地去选择考古发现对象,或者有计划有目的主动出击,一遇重要发现就抓住不放,顺藤摸瓜,扩大战果,所以这个时期对一些遗址的发掘面积就较大、时间较长,收获自然也就更加显著。如曲江石峡遗址、西江流域青铜器时代墓葬,等等。另外,利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测年和鉴定,也比前一时间多了,这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

1. 1981年,对英德青塘朱屋岩的复查发掘,获得一些打制石器,鹿、麂、獐、猪等动物化石及蚌、蚬、螺等,测定年代为 17140 ± 260 年。

2. 曲江马坝石峡遗址。1973—1978年间,在遗址3万平方米范围内发掘4000平方米。经1979—1980年的整理,了解到石峡遗址包含上、中、下文化层即三个时期:下层包括了文化层和打破文化层的一百座墓葬。下文化层出土的绳纹刻划纹夹砂陶罐和泥质灰白色橙黄色镂空盘要早于石峡文化墓葬。石峡文化100座墓可分三期,出土有石镞、有段石铍、石钺、和陶三足鼎、三足盘、豆、罐、圈足盘和玉石琮、璧、环、玦等特殊礼器和饰物近2000件及其二次葬烧穴墓等,富有自身特色,故称之为“石峡文化”,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认

可。测定年代在距今4800—4200年之际,另外还发现有一座长40米,宽8米左右的“木骨泥墙长屋”居址以及一批岭南最早的栽培稻遗迹。中文化层发现有房址、窑址和生活遗迹,出土了一批以几何印纹软陶和磨光石器共存为特征的遗物,发现32座浅穴墓,随葬品较少,明显区别于石峡文化,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上文化层没有发现房址、窑址和墓葬,出土遗物以夹砂陶圆柱状鼎、双耳圜底釜、大量几何夔纹、云雷纹方格组合纹硬陶、原始瓷和青铜器共存为特征的遗存,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石峡遗址和石峡文化的发现,是迄今岭南地区新石器至青铜器时代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3. 佛山河宕遗址。位于澜石镇河南村,1977年冬至1978年夏发掘,在遗址范围1万多平方米中,发掘面积760平方米。在其中层和下层,出土有3万多片、数十件几何印纹软陶和硬陶,一批石器和骨牙器工具和饰物。特别是在贝丘遗址中清理了77座墓葬,其中成年人骨架保存较完整。经鉴定,有19个男女个体生前有人工拔牙的习俗(占可观察的成年个体的82%),是迄今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中发现拔牙个体最多的一处。在人体种属、特征和身高方面,也提供了一批测量数据,年代在距今4300—3600年之际。1977年,在南海灶岗也发现了一处文化内涵和年代相当的贝丘遗址。河宕遗址被称为是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区同类遗址的“河宕类型”。

4. 高要金利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存。遗址位于西江河畔,范围约10万平方米,1978年发掘112平方米,文化层厚达4—5米。发现了三组平面布局为长方形的建筑遗存,构件有木柱、木桩和树皮板等,木柱头凿有榫眼,复原起来应为“干阑式”水上木构建筑。文化层发现有少量石器、骨器和大量黑色火候较低的素面陶(加热后成为橙黄陶)及印纹陶,还有象、牛、猪等动物遗骨和果实等,其中猪颌骨鉴定为家养。年代测定为4000多年,从遗物看当

略晚于河宕遗址。这是迄今岭南发现的同类建筑遗存中面积最大、年代最早的、可以复原的水上木构建筑遗存。

5. 普宁虎头埔窑址。1982年发现15座陶址,平面结构可分圆形、圆角方形和“亚铃形”三种,出土了一批有地方特色的几何印纹陶器,是广东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结构最明确的一处新石器晚期后段的窑址。

6. 1974年冬,在饶平县浮滨塔仔金山和联饶顶大顶山,清理了21座土坑墓,出土器物以石镞、戈、矛、环和陶器灰陶大口尊、釉陶罐、单把壶、豆、盘共存为特征遗存,还采集一件同一时代的青铜戈,初步定名为“浮滨类型”,年代定在商末西周,是广东青铜文化早期的重要发现。

7. 1972—1981年,在西江流域的德庆、肇庆、广宁、四会、怀集和罗定,北江流域的佛冈、龙门、榕江的揭阳以及佛山,发现38座东周墓,出土随葬品879件。其中青铜器718件,占总数的81.7%,陶器106件,只占15%,还有一些玉、石、金、琉璃等。这批青铜器的发现,雄辩地证明,广东不仅确实有过青铜器时代,而且在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也有过奴隶制。此外,在信宜松香厂附近和曲江马坝马鞍山、佛冈科旺大峡谷,发现了形制花纹精致的西周铜盃和两件西周铜铙;在其他地方也零星发现了青铜铙、钟、编钟(甬钟)、青铜戈等,这些发现,说明商周以来,岭南与岭北早已有文化交往。

8. 1974—1975年,顺德杏坛逢简桑基鱼塘区发现一处西汉遗址,出土有西汉前期的陶罐陶盒、完好铁凿等,还有黑熊头骨、水鹿犄角、青鱼骨和桃、青榄等果实。这个发现,增添了南越国时期居民点分布范围。

9. 始兴城郊晋—唐墓群。1974—1975年,城郊赤土岭一带拓植柑橘场,发现了砖墓和器物。省博物馆立即派员下去配合发掘。先后在赤土岭、禾场岭及对面的死蛇岭(亦是墓群)发现东晋、隋、唐砖宝墓83座,获得一批

晋唐纪年砖、姓氏铭文砖及青釉陶器、铁器、青铜弩机和大穿孔戈等,为研究中原士民南迁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10. 古墓葬比较重要的还有:罗定的南朝墓、电白县唐代许夫人墓、大埔湖寮的清初吴六奇墓,等等。

11. 西沙考古的重大发现。1974—1975年,在南海舰艇和海南考古人员的协助下,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考古人员,对西沙群岛进行了两次水下考古。先后在甘泉岛、琛航岛、全富岛珊瑚岛等岛礁和地面,发现有南朝、唐—清代陶瓷器、明清铜锭、汉—清代铜钱、铜镜以及居住遗迹、生活用品、庙宇、石柱、石磨盘、男女大型石雕像等。这批丰富多样的文物古迹,结合海南岛渔民保存的《水陆簿》(航海针经书)和“孤魂庙”等资料,有力地证明西沙群岛是我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开发经营,并经中国政府派官员管理和行使主权的南海岛屿。西沙考古对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明。

通过以上这些主要的考古发现,可以清楚地看出,广东这一时期的考古事业,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四、兴盛期(1983年—现在)

这一时期,广东文博考古部门,纷纷制定了发展规划,并在实际行动中付诸实现。主要表现在:一方面,1990年底以来,广东省、广州市相继成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市、珠海市等博物馆先后成立。另一方面是有了专门科研机构,田野考古得到加强,成果更为明显。再一方面是,随着资料的累积、研究的加深,这个时期不论是集体或个人,有份量的、大型的发掘报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专题著述和文章,纷纷问世。

1. 旧石器时代考古:

1983年初,对阳春陂面独石仔洞穴遗址进行再发掘,除出土一批石器和动物化石外,还

发现一枚晚期智人面齿,测定年代为距今大约16680年。1984年以来,在“马坝人”洞穴周围的银岩和水洞,发现6枚人牙化石,共出的还有哺乳动物化石;另在飞鼠(蝙蝠)洞清理出一块带臼齿的左下颌骨化石。这些发现表明,自马坝人出现之后,古人类曾在这一带活动;同时,在1958年马坝人出土洞穴的洞口原堆积淤泥中,清理出2件砾石砍砸器,年代可能与马坝人相当。

1985年,在罗定苹塘下山洞上层,发现一段小孩桡骨残体,石化程度不高,其年代当属晚期智人阶段。1978年和1989年,在封开渔涝的洞中岩,发现4颗人牙化石、古动物化石6目17科21属21种,其中有2颗人牙的结构具有较多的原始性,是与马坝人同一时期的人类化石,测定年代距今14万年左右,动物化石的年代属晚更新世早期。马坝人和洞中岩人都是南方地区黄色人种的原祖之一。1992年7月,在封开渔涝镇罗沙岩,首次清理出广东旧石器时代有连续地层堆积的遗址,出土4枚人牙化石,一批打制石器和近千件古动物化石。第二、三、四层经铀系法测定,其年代分别距今约2.2万、4.8万和7.9万年,填补了岭南从距今2万年至10万年之间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1996—1997年,在英德宝晶宫大溶洞的第二层溶洞堆积中,发现了十多件砾石打制石器,推断年代在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中期遗物,是迄今广东溶洞中发现的10万年前的第一批有确切地层层位的旧石器遗存。与此同时,对英德云岭镇狮子山牛栏洞进行了试掘,在不同地点和层位中,出土了一批打制石器、骨器、蚌器、少量陶片和动物遗骨,被认为代表了旧石器末期、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存。

2. 新石器时代考古:

(1) 普宁池尾后山山冈遗址。1983年11月,在东距流沙镇6公里的池尾后山遗址,清理了10座长方形土坑墓,随葬品仅有陶器20件、石器6件。后山遗址是粤东地区一处有特

色的重要遗址,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或商代早期,可能处于新石器末期向青铜早期过渡的阶段。

(2) 曲江石峡遗址的再发掘。1985年5月至8月间,石峡遗址发掘小组继续对石峡遗址东部进行发掘,揭露面积340平方米。这次最重要的是从地层迭压关系上,发现了一层早于石峡文化的完整层位(第5层),出土的绳纹、刻划纹陶罐和镂空圈足盘等与70年代发掘的一样,年代距今约6000—5500年间。其次,在第二文化层出土的泥质折肩罐的肩部残片上,发现拍印有形象生动手拉手跳集体舞蹈的人物纹样,年代约相当于商代,是广东考古的首次发现。

(3) 南海鱿鱼岗贝丘遗址。1985年秋发掘,揭露面积255平方米,清理36座墓,部分人骨架保存还好,经鉴定发现有3例人工拔牙个体,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区拔牙习俗增添实物资料。另外,发现在有的骨架的枕骨部位出土一件骨梳或一对獠牙束发器。鱿鱼岗遗址的遗物特征和年代,与佛山河宕遗址的相似。

(4) 高要蚬壳洲贝丘遗址。1987—1988年,在广利(今属鼎湖区)蚬壳洲发掘300多平方米,发现24座墓29个个体人骨架,保存都不太好。葬式以侧身屈肢葬为主,还有蹲式屈肢和双手反捆于背俯身屈肢葬各一座。这是广东新石器墓葬中的首次发现。文化层还发现有少量彩陶、2件多孔石刀和一件骨笛(哨),测定年代为距今5130年左右。

(5) 珠海市海滨和岛屿的发现。1984年以来,先后在唐家淇澳岛的东澳湾、南芒湾、后沙湾和三灶草塘湾、香山菱角嘴等沙丘遗址,发现有彩陶盘、白陶盘(后沙湾)、夹砂陶、几何印纹陶和一批石器。东澳湾是个面海的山冈,遗址面积较大、保存较好,出土遗物丰富,年代应属新石器晚期后段。

(6) 平沙棠下环海滨沙丘遗址。1992年、1995年、1996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珠海市博物馆、平沙区文化科,作了较大面积发掘,发

现有七层的文化堆积,最下层有彩陶;四—六层应属夏商之际的青铜早期文化,出土石网坠达 500 件,数百件形式多样的石环、“T”形环的成品、残件和胚件以及一批印纹陶器,表明这种“T”形环是本地制作的,是广东迄今出土这类石环最多的一处。

(7) 连平黄潭寺山冈遗址。1987 年 8—9 月份,在元善镇黄潭寺遗址,抢救性发掘 774 平方米。其中第一期文化出土釜、釜形鼎、镂孔圈足盘、豆等陶器,当属“石峡文化”分布点;第二期文化遗存出土发达的几何印纹软陶,亦应相当于石峡遗址中文化层的年代。

(8) 1982—1984 年间,在封开杏花河畔,发现了 28 处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的山冈遗址。其中,在杏花镇附近的禄美村对面山,清理一座石峡文化类型的土坑墓,出土一件石琮、二件石钺、一件小石钺和三足鼎、圈足盘、豆残件等;在罗沙岗也发现一座同一性质的残墓,随葬品有石钺、三足盘等。两座墓测定年代都是距今 4030 年左右。在塘鱼嘴、替秧岗、旧屋后山等地点,也发现有钺、穿孔石钺和石钺等,表明了西江封开与北江石峡文化的密切关系。

(9) 1990 年春,在封开杏花镇东面 3 公里的乌骚岭山顶,发现一处二次葬墓地。在 150 平方米范围内清理了 111 座小型浅穴土坑墓,墓穴经火烧烤,人骨腐朽无存,出土的石器、陶器几乎无一件完整的,但有些器物可以斗合起来。6 个测定年代数据的平均值为距今 4000 多年。这种密集分布的二次葬墓地,在岭南还是首次发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

(10) 1991—1994 年间,在中山南朗龙穴村尾和石岐白水井街边,发现两处沙丘遗址。龙穴遗址出土有多件完整的彩陶盘和碗,还有白陶盘、石网坠等,白水井出土彩陶残件和完整石铎。两处遗址的泥质陶、彩陶、白陶的比例均大于绳纹夹砂陶。这个发现,为分布于环珠江口区含彩陶、白陶为鲜明特色的新石器中期考古学文化,增添了重要实物资料。白水井遗

址的测定年代为距今 5500 年左右。

(11) 1983 年以来,在深圳小梅沙、大梅沙、咸头岭、大黄沙等沙丘遗址。发现一种以绳纹毛蚶贝印纹夹砂陶和彩陶、白陶和打琢、磨制石器共存为特征的遗址,是环珠江口区(含港澳地区)同一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的重要遗址。大黄沙彩陶层测定的年代距今约 6000 年。

(12) 1996 年底,在英德沙口、北江北边史老墩小山冈遗址,试掘面积 24 平方米,发现较丰富的打琢和部分刃部磨光石器,其中长身斧形器就有 42 件,石料多为河滩砾石,还有 5 片夹砂陶片等,认为是一处石器制作场,年代距今约 7000 年左右。

3. 青铜器时代考古:

广东考古的“初创期”和“发展期”,已大致确立广东青铜器时代包含着三大段落:粤东地区商末西周的“浮滨类型”文化、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夔纹陶类型”文化、战国中晚期秦汉之际的“米字纹陶类型”文化,同时也认识到这三个考古学的分布及其年代在分布和早晚上的不平衡性。然而,对相当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早期文化及“夔纹陶类型”早于“米字纹陶类型”的问题,考古界仍存有歧议。通过近十年来的发掘和研究,问题越来越明朗,但对一些不出石戈、印纹硬陶、釉陶和铸铜石范等要素的遗存,如石峡中层前段(②B 层早段)、“河宕类型”文化遗存、高要茅岗、东莞村头遗址等,究竟属青铜早期抑或新石器末期,考古界还有不同的看法。

下面举例说明这一时期的主要发现。

(1) 东莞村头遗址。1989—1990 年,对虎门镇村头遗址进行大面积发掘,揭露 2375 平方米。其中三层至五层为早期遗存。清理房址 6 座、大濠沟 2 条、小沟 6 条、灰坑(窖穴) 160 个。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器、贝壳器、鹿角器等。陶器以夹砂釜、泥质罐、盘、豆为主。其中又以方格纹折肩凹底灰陶罐最富特征,与河宕、茅岗、池尾后山的同类罐有相似之处,又有自身特点。石器以戈、牙璋最富特点。村头遗

址是 90 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发掘面积最大、遗迹遗物丰富的重要发现之一,年代定为广东青铜早期遗存。

(2)“浮滨文化”的进一步确立。“浮滨类型”文化因 1974 年冬在饶平浮滨发现 16 座墓和联饶发现 5 座墓,出土了石戈、石矛和泥质大口尊、釉陶壶、豆、盘具有特色而得名。此后,又在揭阳(地都油柑山等地)、普宁(梅塘)、潮安、潮阳、揭西、大埔(枫朗 22 座墓)、丰顺、蕉岭等十多个市县,发现数十座墓,遗址很少,从随葬品看,说明它们的年代有早有晚。为进一步从遗址的发掘作比较研究,1995 年 9—10 月间,对普宁市牛伯公山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 300 多平方米。文化遗物显示出生活居住遗址与以往发现的墓葬随葬品之间有着明显差异。这一方面充实了对“浮滨文化”内涵的认识,另一方面再次说明应注意生活遗址和墓葬随葬器物之间的差别。根据几个标本的测年数据,“浮滨文化”牛伯公山遗址的年代可确定在公元前 1500—公元前 900 年之间,即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前期。这说明以往对“浮滨文化”的断代是可信的。

(3)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时期,广东发现一些新器物。一是在增城(60 年代发现)、揭阳、东莞、南雄、曲江以及香港大湾等地,发现一类柄部带扉棱的有穿孔的刀形端刃器或牙璋;二是在石峡中层、封开杏花、珠海平沙棠下环、浮滨文化墓葬以及香港大湾、大屿山东湾,发现一种“T”形特种玉石环;三是在乐昌老虎头山、珠海亚婆湾、南芒、东澳岛南沙湾、棠下环、斗门缙船埔以及香港南丫岛沙埔村、赤腊角过路湾、大屿山沙螺湾、马湾岛东湾仔等地,发现十多件(对)石范。石范的发现证明本地已能铸造青铜器。这些遗址和墓葬的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或商西周早期。这一方面证明,确有一些夏商周文化因素南来,另一方面证明,广东在商周时期已开始步入青铜时代早期。

(4)1983 年,罗定罗平区背夫山发掘一座保存完好的战国早期墓,出土随葬品 116 件,

青铜器占 98 件,4 件人首柱形器位置清楚,是研究岭南此时埋葬制度的典型资料。1986 年,和平龙子山发现十多座东周墓,其中 1 号墓出土越式鼎、钺、刮刀等青铜器,还有一套 11 件玉玦。1987—1988 年,乐昌大拱坪对面山,清理近 200 座古墓,以汉墓为多,东周墓 20 多座,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戈饰夔凤纹实为罕见。1989 年,封开南丰利羊墩清理战国至西汉前期墓 40 座,战国墓多有腰坑。1993 年,深圳大梅沙 II 区发现 10 座春秋墓,其中 6 号墓出青铜器 4 件、原始瓷豆 3 件。1996 年,广宁南街镇龙嘴岗发现 15 座战国晚期墓,出土青铜器 166 件,其中 8 号墓最重要,有腰坑设置,出土有三足四环耳铜盘和 2 件青铜戈。此外,在此之前,揭阳中夏面头岭发现 15 座战国墓,在粤东比较少见。

(5)“夔纹陶类型”文化早于“米字纹陶类型”文化有了新证。1956 年以来,广东东周时期考古的丰富发现表明,一般而言,“夔纹陶类型”遗存要早于“米字纹陶类型”遗址,似无疑义。但有个别考古学者仍有异议。

1991 年、1995 年初,在博罗园洲梅花墩发掘 100 平方米,并清理了一座长 15 米的龙窑。龙窑平面结构分火膛、火道(火膛、火道之间有小平台)、窑床和窑尾等几部分。文化层出土了一批夔纹陶罐、豆盘、簋形器,还有弦纹篦点纹器盖十多件,最难得的是发现一种长方形夔纹陶拍(印模子)以及 34 件动物陶塑,终于找到了夔纹陶的烧制地点。

1996 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博罗县银岗遗址的发掘中,从地层迭压关系,发现了米字纹陶,铁器在上,夔纹陶、青铜器在下,有力地证明了夔纹陶遗存早于米字纹陶遗存,可以说是这个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

4. 秦汉至明清考古:

秦汉至明清考古,在遗址、城址、窖址、墓葬、窖藏乃至地上保存的古代建筑,硕果累累,著述篇篇,仅简报、著述目录就有一本。

下面仅举几例以见一斑。

(1)1983 年 8 月至 10 月,国家文物局组织

广州市文管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博物馆联合对广州市大北路象岗南越王墓进行发掘。除在岭南首次发现西汉大型石室墓外,还出土有金、银、玉、铜、铁、铅、丝绸、象牙、玻璃、漆、木、药材等文物一千多件(套),其中玉器就有400—500件,“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泰子右夫人、左夫人等印章20多枚,“文帝九年乐府工造”一套大小八件的青铜勾铎乐器和左耳室的编钟编磬和刻有铭文的古波斯风格的银盒,刻有“蕃”、“蕃禺”铭文的鎏金铜壶“六山纹”、人物绘和带托铜镜等等,都是十分珍贵和具有学术价值的,被誉为岭南考古的重大发现,被列为198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对研究赵佗南越国史、汉越关系史及海外交通贸易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珍贵资料。

(2) 南越国时期的宫署、城址。除在广州中山四路市文化局大院和新大新百货公司基建工地发现的有大型铺地砖、“万岁”瓦当和砖石走道的南越国宫署遗址,1996年在忠佑大街发现的“御花苑”遗址外,还在五华县华城狮雄岭上发现一座范围达1400平方米,四面有回廊、中间有高台的大型建筑遗址,有大型板瓦、筒瓦和“定”字云纹瓦当残存堆积,应即“长乐行台”。在澄海县上华东溪西岸的龟山,也发现有两汉建筑遗址,但破坏得厉害,面貌不清。1982年,在乐昌洲仔遗址,位于武水南岸,发现有石柱础、绳纹板瓦、筒瓦堆积和用河卵石堆砌的墙基址,中心遗址可能已被武水冲毁,文献有“急绝道聚,兵自守”的“赵佗城”记载。在英德连江与北江交汇的江口嘴,出土有绳纹瓦、米字纹陶,没有找到建筑遗迹,文献有“赵佗筑万人城于湏水”的记载。在始兴罗围山冈

下的犁头嘴,发现一座城址,周长420米,城墙底宽4米,上宽2米多,残高4米左右,城内有平台,采集有西汉、南朝绳纹瓦等,是广东现存的一处重要城址。此外,在阳春古旧塘村发现有大量绳纹瓦和四叶纹铺地方砖、方格戳印纹陶和铁器等,村里尚有遗址。雷州半岛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和仕尾村,绳纹瓦分布范围达1万平方米。在仕尾村北侧除发现绳纹瓦外,还发现“万岁”瓦当和米字纹、方格纹的红色铺地砖。从遗物、地理位置和文献记载看,二桥、仕尾建筑遗址很可能是西汉时期的徐闻县治和徐闻港所在地,结合以往在华丰岭一带发现的数百座东汉墓,对研究南海海外交通也很重要。1987年,在湛江市遂溪县边湾村的南朝时期窖藏,出土了十枚古波斯银币、南朝风格金碗、鎏金银饰物、银镯等。从银币上萨珊王朝国王的在位年代,推测广东遂溪发现的这种波斯银币很可能是从海路直接传来的,而不是从建康即今南京的南朝王朝传入的。隋唐以来,陶瓷器在外销货物中占了很大比重。潮州、梅州、高明、佛山、江门、新会、郁南、封开、遂溪、海康以及深圳、珠海等市县以及香港地区,相继发现了唐、宋、元、明清的陶瓷窑址,出土了大量外销瓷产品。80年代,在台山上川岛海域发现一艘沉船,捞到南宋至元代陶瓷一批。近年来,在沿江沿海的沉船遗址调查发掘以及参与西沙再考古方面,也有可喜的发现和收获。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以上这些考古发现和收获,都陆续出版了专题报告和综合性著述,恕不一一列出。●

责任编辑:郭秀文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的变革

□ 冷鹏飞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关键词] 春秋战国时期 商品经济 变革

[摘要]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特别是铁器牛耕的使用,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激烈变化,中国古代社会逐渐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社会商品经济形态亦随之产生重大变革。本文试图追寻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形态发展变化的历程,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规律。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10-0081-06

一、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生产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生产由手工业领域扩展到农业领域,其商品生产形态主要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虽然私营手工业在我国早期文明时代已经出现,但当时的私营手工业规模有限,增长缓慢,从事手工业的家庭似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完全独立的手工专业户,到春秋后期才有所发展,至战国时期,人们“事技艺”已蔚然成风,促使私营手工业更加迅速发展起来。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私营手工业有制陶业、制漆业、编织业、木器制造业、酿酒业、制酱业、屠宰业、矿业等等。其经营形式既有独立的个体家庭手工业生产,也有匠师与多个学徒所从事的作坊手工业生产,还有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当时个体家庭和作坊手工业生产普遍存在,故出现了“百工”阶层。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比较少见,往往在开矿、冶铸、煮盐诸方面才有所发现。战国时期的这种私营手工业构成,奠定了中国古代私营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格局。这种私营手工业是古代中国比较典型的商品

生产,尤其是大规模工场手工业生产是当时最发达的商品生产形态。大手工业主一般兼营商业,把生产与贸易结合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独立家庭和小作坊手工业生产只是简单商品生产,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自身的生活资料,故史料中多有“织屨而食”、“织席以为食”、“为鞞以食”^①之类的记载。他们所进行的商品交换往往是为了获取粟布的使用价值,只是以物易物的简单商品交换。但当时小手工业者以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也普遍存在,如酤酒“怀钱挈壶瓮而往”;市买则“受钱必辄入其钱龡之中”。^②因而亦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生产的发展还深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如在城郊园圃、林、牧、渔业中,从事商品生产的程度较高。《论语》即载樊迟“请学为圃”,说明当时园圃蔬菜瓜果之类的商品生产有所发展。至战国时期这种园圃业已很普遍,《管子·问》中罗列的城邑调查事项就有“问民理园圃而食者有几何家”之说。又《轻重丁》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处,登降

之萌也,上斫轮轴,下采杼栗,田猎而为食……北方之萌也,衍处负海,煮泔水为盐,梁济取鱼之萌也,薪食。”而当时燕代之地,“畜至用谷量马牛”、③“致马牛羊数千群”④的大牧主,内地“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⑤的畜牧业者皆大有人在。但无论是园圃业或是林、牧、渔业,从事商品生产在春秋战国时期尚处于起始阶段,到汉代以后才有较大发展。另外,当时在许多小农家庭中从事商品生产的因素也更加明朗,而且,小农家庭生产的其他农副产品也可以出卖。当然,小农从事生产所必需的铁器、牛耕以及生活必需品食盐之类,也必须买进来。虽然小农受封建国家的剥削沉重,不会有多少剩余产品出售,以至于兴起“弃本事末之风”,但春秋战国时期,小农家庭与市场买卖的联系比原来日趋紧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春秋战国时期的官营手工业仍然与早期文明时代一样,其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官府贵族自身的需要。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营手工业中参与或从事商品生产的现象进一步显露并有所扩大。由于官营手工业可以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古代社会最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所以官营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因素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颇为强劲。当时在各城邑中由官府设置的“市”,既是国家直接管理工商业的机构,往往也是国家乘便从事商品生产赢利的机构。如在秦国地域内出土的陶、漆器上的玺印文字有:咸亭、安亭、安陆市亭、酈亭、焦亭、鹵市、鹵亭等等,⑥表明这些产品是由官府亭、市所设置的手工作坊生产的。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的东方六国地区遗址中,亦曾发现日用陶器的印文有“临(淄)亭”、“河(南)亭”、“安(邑)亭”、“降(绛)亭”等。⑦另据文献所载,其时在官府酿酒作坊,铸币作坊,仓、廩所辖制陶、冶铸、酿造作坊,工官所辖制盐、冶铁、铸币作坊等,生产许多关系到人民日常生活的食、用品发卖,显然亦属商品生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官府铸钱量非常巨大。在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中,经常性一次发现各国铸币数

万枚或上千斤不等。铸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不是通过出售流往市场,而是经由国家的种种支付手段进入流通。并且,此时铸币已有由官府垄断的趋势。这对维护货币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官营手工业所从事的商品生产只占一小部分。而且,当时官营手工业的劳动者除少量自由工匠外,大部分是服役者、刑徒和奴婢,可见这样的商品生产仍然是官僚封建生产的一种形式,它与私营手工业商品生产有质的差别。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商品生产开始兴盛的大好时节。促成这一转机的社会条件,除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个体独立性增强、社会分工及其社会需求量的扩大这一基本原因外,其时诸侯国林立,具有彼此自由竞争的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也不能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生产发展水平估计过高,这时无论何种形式的商品生产尚处在开始发展阶段,且作坊或工场的内部管理及其劳务状况皆带有封建性,根本不能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同日而语。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流通形态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品交易的繁荣。虽然当时仍然存在以物易物的简单商品交换,但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流通已成为主体。这时的商业贸易形态主要分为转运、屯积、加工以及混合型四种。

转运贸易是我国最古老的商业活动。在早期文明时代,由于交通不便,从事转运贸易非常困难。至春秋战国时期,转运贸易已具有相当突出的发展。当时贩运的商品除各地土特产外,手工业产品也是重要的商品来源,如布帛、盐铁、陶器、铜器、漆器等。甚至有些商品被转运到域外。如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朝鲜墓葬和遗址中,曾多次出土我国制造的铜镜、铜剑和燕国的“明”字刀币。这种“明”字刀币在日本冲绳岛也有出土。另在湖南等地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一种被称为“蜻蜓眼”的琉璃

珠,与古代西亚同类产品如出一辙。且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人已称我国为“塞勒斯”(丝),可见我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在战国就已开辟,世界贸易开始兴起。⑧

从事贩运业的除民间商人外,还有官商,且地方官府亦从事贩运贸易。《淮南子·人间》即载魏国东封令解扁“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故“上计而入三倍”。

此外,当时屯积贸易也很活跃。《越绝书·计倪内经》记载的所谓“计倪之策”即为官府筹划的屯积贸易,魏相李悝则在此基础上推行“平糴”政策。这种丰年糴谷屯积,待灾年出售的“平糴法”,开后代“常平仓”之先河。而民间的屯积贸易更加繁荣,所谓“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希;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⑨“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价)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⑩已成为当时的惯用语。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加工贸易形态,无论官方或民间皆普遍经营。其民营者既有进行大型林木、手工工场等生产的富商大贾,也有从事家庭作坊式生产的小商贾,详见上文。当时民营官营转运、屯积、加工等贸易形态的发达,促进了交易市场的繁荣。这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草市、墟市、县市、城市等等。

在当时广大乡村中,某些特定地点的民间交易场所形成初级市场,一般称为市井、草市或墟市。在乡间的这些市井、草市或墟市中,相互以物易物的交换占主体地位,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交换圈。但它们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山区地带自发产生的,有利于农夫与小手工业者就近直接交换,所以为乡民生产生活的发展提供了方便,也为更大更高级市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一般称县城以下的集镇所形成的交易场所为县市。春秋战国时期,每县之中往往有若干集镇县市。如幸存下来的小国西周仅辖三县,尚拥有“城邑三十六”,则每县平均有12座集镇县市。⑪当时县市与县市之间相距30~

50里不等。县市中小农与手工业者的交换占较大比重。由于县市比墟井市场更为广阔,汇聚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更加丰富,所以从事交换的除这些小商品生产者外,还有进行屯积贸易的坐贾和贩运贸易的行商,从而促成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日益增长,并使县市成为沟通乡井墟市和城市商品流通的桥梁。

城市市场指县以上城市中特设的商品交易场所,其中又有县市、郡市及都市之别。随着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的确立,各国逐渐形成完整的城市体系,且成为当时最发达的市场形态。当时在所有城市中皆建有较大规模的市场,甚至大国都城设立的市场有好几处。如齐都临淄,已知有大市、中市、右市,推知还有左市。秦都咸阳除中心市场咸阳市外,另有直市、平市等等。⑫城市市场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生产商品就近出售,此外还有无数农民、市民、兵吏、生徒、商人、小贩等来市场交易。上市的商品有金、银、玉、铜、铁、粮食、瓜果、蔬菜、牲畜、奴隶等,几乎无所不有。故《左传·昭公六年》有“近市朝夕得所求”之说。当时各国城市与城市之间水陆相通,“条逵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⑬“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⑭形成全中国各大城市彼此商品流通的市场网络。随着战国城市市场的发展,各级城镇逐渐成为各地的商品经济中心,奠定了中国古代封建城市的基本形态。甚至有些处在交通要道的城市,因有利于国内外贸易往来,其作为商品货币经济中心的地位超过了本身作为郡或县城的政治地位。如当时诸侯货物四通的郡城定陶,被誉为“天下之中”。而县城宜阳“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其实郡也”。⑮当然,这时所有城市皆处于国家郡县行政体系之中,它们作为政治中心的色彩依然浓厚。

三、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

自我国殷商西周时期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发展到战国时期,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结构的演化体现在特殊商品——货币方面。其

时货币贸易额大大增长,原来通行的海贝等自然货币形态被逐步淘汰,代之以蚁鼻钱、布币、圜钱等铜铸币形态甚至贵金属银币、黄金(含郢苻)之类。特别是战国时期贵金属黄金的大量流通,充当了国与国之间商品交换的通用货币,还因其携带方便,更有利于远程转运贸易;同时也刺激了富有阶层奢侈性高消费的增长,从而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且当时货币经济已渗入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出现了土地买卖以及租赁与收取租金,打破了以往“田里不鬻”的局面。甚至连劳动力也用来出卖,高利贷资本也盛行起来,并且官府也从事借贷事宜。

此外,这一变革还反映在商人的构成及其经营方式等方面。其时的商人除官府及贵族商人外,还有新兴的官僚商人和完全意义上的平民商人。无论官府、贵族商人或官僚商人,都是拥有政治经济特权和雄厚资本的大商人,具备一般商人无法与之竞争的优越条件。但他们往往凭借其封建政治特权盘剥下层群众,牟取暴利,扰乱正常的商业活动,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然而这时商人的主体,已经不是官府、贵族或官僚商人,而是平民商人。此时的平民商人已经不是殷商西周时期那样大都只是兼营商业,而是完全以经商为职业之人,且这时的平民商人既有资金雄厚的富商大贾,也有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大抵“家赀千金”的富商大贾从春秋中期开始出现,至春秋末到战国时期,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更加迅速膨胀,“家累千万”的富商大贾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些富商大贾经营规模庞大,往往从事大宗货物的长途贩卖,有的甚至还从事农牧业、盐铁业及诸种手工业等商品生产。如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故能致七千万。而“乌氏保畜牧,及众,斥卖”,富比封君。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贯贷行贾遍郡国”。^⑮因而,其时富商大贾都拥有众多的徒属、雇工和奴婢从事工商业劳动。而小商小贩与富商大贾不同,他们资金微薄,力量有限,一般只是以家庭

为单位或几人合伙经营,必须自己参加商业劳动。史称小商贩“夫妻服犂,轻至百里”;^⑯管仲曾与鲍叔牙合伙“负贩于南阳”^⑰之类就是如此。这些小商小贩或在途中贩卖,或到市场营销,其经营规模狭小,获取的微薄利润除养家糊口外所剩无几,故有“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⑱的说法。可见在平民商贾中存在着极大的反差。

而且,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人与其他社会职业还处在频繁的流动之中,这与殷商西周时期“商之子恒为商”的封闭状态绝然不同。当时的商人除继承祖业相沿而来外,还有些贵族、官僚因从事商业活动转化成商人。如齐国贵族田成子放贷经商,“专山海之富,擅鱼盐之利”。^⑲《管子·问》道:“官贱行贾,身出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足见其时官僚经商者也不是少数。还有一些官场失意或弃官不作的人转化为商人。当时的贵族、官僚或平民大商贾皆来源于这几部分人。至于人数极多的小商小贩,大抵皆由小农转化而来。尤其到战国时期,全社会已形成弃本逐末之风,故时人称“(今)耿介之士少而商贾之民多”,^⑳“农少而民多”。^㉑酿成这一社会风气的原因除当时人们的自力自主性增强外,还由于经商可以比从事农业生产获得更多的收益。其时封建国家的沉重剥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有“民贫穷者变其业”,^㉒“末业,贫者之资”^㉓的说法。与此同时,也有商人向其他职业转移的现象。当时许多商人除经营手工业外,主要有以下几种趋势:其一,热衷于政治或买官鬻爵,向官僚转化。其二,大量购买土地,向地主转化。其三,被迫向农业回归,这种趋势在小商小贩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商贾们之所以流向其他职业,国家的政策导向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虽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发其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但古代中国以小农自给自足经济为主体的基本格局未变,缺乏商品经济不断膨胀的社会基础。一旦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超过

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社会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向其他职业,特别是围绕基础农业进行自发调节。另外,政治经济利益也是驱使商人转行的重要原因。如商贾们只要谋得一官半职,就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可因种种特权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商人购买土地收取地租,在当时亦能取得更加实在、稳妥的收益。当然,这种商人地主化的趋势,也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自行调整的表现形式。

从商人与其他社会职业的互动过程可以窥见其商业资本运动的大体势态。由于当时富商阶层的相对稳定,他们一般把自己取得的大部分商业利润追加到商品流通领域,以扩大商业经营规模,获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当然,在社会形势、经营贸易状况及经济利害关系的交互作用下,商贾们也会把一部分商业资本用来发放高利贷,或购买土地收取地租赢利,或用来买官鬻爵以图新发展,或贪图享受用于奢侈性消费等。于是,商业资本亦不断外化,逐渐形成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趋势。至于小商小贩阶层,因商业资金有限,其所得微薄利润一般仅用来维持往常的商贸费用和日常生活开支。无论他们及资金的主要来源或其归宿,都与小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见,封建农业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支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面貌。

四、我国封建制商品经济形态产生的特殊道路

当我们追寻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奴隶制商品经济形态逐步转变为封建制商品经济形态的历史足迹之后,再认真考查我国封建制商品经济形态产生的特殊道路,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特点。

我国早期文明(即奴隶制文明)与希腊罗马早期文明相比较,大体说来,我国为早熟的农业文明;而希腊罗马属于后起成熟的商业文明,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道路,我国经历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约

公元前5世纪即进入封建社会。而希腊罗马直到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约公元5世纪才进入封建社会。^⑤在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诸侯争霸战争,但这些都是以华夏族为主体,经济文化水平基本相当的诸侯国之间进行。并且皆以掠夺领土、财富为根本目的。所以这些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不是很剧烈。而且,争霸战争还成为促使各国努力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变法图强的巨大动力。正因为如此,我国在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持连续发展状态,并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酿成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而希腊罗马等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是在罗马帝国内部产生封建因素的前提下,最终由日尔曼蛮族入侵,推翻奴隶制国家而重新建立封建制国家的。正因为西欧封建社会在产生过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经过发展水平较低异族的毁灭性打击,所以当时社会出现“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⑥这里几乎“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一切都得再从头做起”。^⑦可见西欧在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呈现出断续状态。

中西封建社会形成的不同方式,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不同的面貌。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的连续发展,无论封建政权、封建官吏或其社会构架,都在未彻底破坏原奴隶制的基础上变革演化而来,故使封建商品经济形态在诞生之时更多地继承了奴隶制时代商品经济的特点,尤其是商品经济依附于政治的特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仍然由国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严重影响了商品生产的正常发展,使商品生产在国家政治统治的夹缝中求生存。其二,开始显露出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产生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正式形成由国家政权参与经商的传统,并萌生出

由国家控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轻重”学说。

⑳其三, 贵族、官吏经商及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成为当时商业队伍中不可忽视的倾向。这虽然与奴隶制时期基本由官府和贵族商人控制商业的局面有别, 但该部分商人因与政治特权的密切关系, 严重影响了商品经济按自身的价值规律纯正发展。正因为商品经济自古以来长期与社会政治割不断的亲情, 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依然使其沦为封建官僚政治的附庸。而西欧封建社会变革之际, 经济文化的断续性更多地扫荡了奴隶制时代残留下来的官方贵族商品经济成份, 使平民商品经济东山再起, 独领风骚, 得以正常地逐步发展起来。

另外, 随着处于原始氏族阶段的日尔曼人占领西欧政治舞台, 他们也把“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㉑注入封建社会。因而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一度中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相对民主、宽松的社会氛围, 必将促使商品经济通过平等自由竞争得到顺利发展。与此相反,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连续发展, 促使各国兼并战争朝着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方向行进。虽然这种趋势可以维持商品经济继续发展, 但终将与需要多样性、具有民主品格的商品经济发生根本冲突, 使之难以正常、顺利发展起来。正由于中西奴隶制商品经济形态的差异与封建社会形成的不同道路, 才使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形态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社会面貌。●

①㉑《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五蠹》。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第 68 页。

③⑭⑮⑲《史记·货殖列传》。

④⑤⑲《汉书·叙传》;《项籍传》师古注;《晁错传》。

⑥参见《云梦睡虎地秦墓》, 文物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厰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4 期;《甘肃崇化出土的秦戳记陶器》,《文物》1991 年第 7 期。

⑦见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 年第 3 期。

⑧参见李学勤《海外访古记》,《文博》1987 年第 3 期;又《东周与秦代文明》,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303 页。

⑨《国语·越语上》。

⑩⑬⑮⑯《战国策·赵策三》;《魏策一》;《东周策》;《秦策五》。

⑪《史记·周本纪》并《集解》引徐广注文。

⑫参见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 年第 3 期;王学理《秦都咸阳》, 第 96 页。

⑬《管子·轻重甲》。

⑭《盐铁论·复古》。

⑮《左传》昭公三年。

⑯《商君书·去强》。

⑰目前学术界对西欧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无大异议, 关于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却有争论, 但战国封建论是较为流行的观点, 笔者亦持这种看法。请参阅熊家利《中西封建社会形成的宏观比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 年第 6 期。

⑱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第 145、148 页。

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 第 449 页。

㉒《管子·轻重》是战国时期“轻重”学派的代表作, 主张国家应善于把握、利用经济领域中的“轻重”关系及市场势态, 参与或调节商品货币经济运动, 以达到控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汉书·艺文志》载《管子》中有《轻重》十九篇, 今本仅存十六篇。关于《轻重》诸篇成书的年代历来学术界有争论。笔者以为其中虽然混有汉人的笔墨, 但基本观点应形成于战国时期。

责任编辑: 郭秀文

钱谷融与殷国明谈真诚

[关键词] 真诚 真实 艺术家 现实

[中图分类号] I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10-0087-05

殷国明: (下简称“殷”)记得 1994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出一本弃的自选集,您把书名定为《艺术·人·真诚》,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意味没有?尤其是您把“真诚”放在里面,似乎表达了您对于人和艺术根本的看法。

钱谷融: (下简称“钱”)书名如此,无非表明这个集子里的文章,谈的主要是我对艺术的热爱,对人的尊重和对真诚的崇尚而已。

殷:对真诚为何崇尚呢?

钱:首先当然是它的魅力了,真诚不但是艺术的基本要素,而且是做人的根本。我们说对人的尊重和理解,最根本的就是对每个人性情与个性的尊重和理解,这当然首先就得讲真诚和有真诚。人和人之间以真诚相待,这才可能有真正有意义的对话,才可能谈得上是“人国”,这是鲁迅早就提出的。

殷:所以,鲁迅就特别强调要做“真的人”,要发出“真的声音”,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文化的一大弊害就是“瞒”和“骗”,所以,他在“狂人日记”中反复疾呼的就是“难见真的人”。这个“真的人”也就是真诚的人,能够向世界,向周围的人敞开自己心胸的人。

人一旦失去了真诚表达的权利,也就失去了个人存在的意味,人就变成了“非人”,变成了奴隶和工具,也就最终失去了人的生命活力,这实在是人类存在的一大悲剧。

钱:这对于艺术,尤其重要,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人们会对艺术长久地迷恋呢?为什么一些大师的作品能够使我们着迷,并为之激动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艺术中能够感受到真诚,能够获得真正的内在的朋友。这也是我的亲历感受。

我是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出生的,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已经走过了 70 多个年头,可经历却十分简单,一生除了读书就是教书,始终没有离开过学校。而且教书教了将近 50 年,所教过的学校却一共只有两所。因此,我的接触面极其狭窄,生活知识十分贫乏。我对社会人生的了解大都是从书本中来的,对现实生活也常常用有些“书本化”的眼光去审视,因此,我的认识和感受,往往与客观实际之间存在着一层隔膜,这个世界对我始终相当陌生。我一直在追求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却很少能够得到。我所尝味的欢喜或是悲哀,在别人看来,简直不当一回事。

但我自己却是十分认真的。一次又一次的不断失望,便只有促使我更深的沉浸到书本中去,沉浸到迷人的艺术世界中去。也幸而有许多杰出的文学大师早已为我储备下了十分丰富的艺术宝藏,毫无保留地容我随意享用。这才使日子比较容易打发。即使在那最黑暗的梦魇般的岁月里,也没有使我完全绝望。

殷:我很理解先生的这种心境,特别是在人的真诚被压抑的岁月里,伟大的艺术作品成了我们心灵唯一的慰藉。

钱:因为,这种真诚和真性情是最难得,最可宝贵的,所以,我希望能在生活中和艺术中多看到一些。这是我的信念。只要大家对文学,对纯真的感情,能有真正的热爱与尊重,我相信世间就一定会多一些真诚和温暖的。

殷:所以,您特别欣赏托尔斯泰……

钱:是。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批评家阿诺德在论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曾称赞他写得“十二分的真诚”。其实,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都是写得很真诚的。他在他的《艺术论》里,把艺术家的真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认为艺术的作用就是感染的作用,而“艺术家的真挚的程度对艺术感染力的大小的影响比什么都大。”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他是贯彻了这一主张的。他是带着他的艺术家的全部热情来说的,所以,使我们感到他十分真诚。正因为他异常真诚,我们也就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真实,因此,他的作品就有很强的感染力、说服力。

殷:这是否意味着真诚作为艺术家的基本态度,就是忠于内在的自我,把自己真实地表达出来呢?

钱:不仅仅如此。真诚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托尔斯泰在他1900年的日记中曾这样说过:“艺术家为了影响别人,应该是一个探求者,应该使他的作品成为一种探求。如果他找到一切,明白一切,并且教导人或者特地安慰人,他就不能起影响了。只有他在探求,观众、听众和读者才会在探求中和他打成一片。”他

的意思就是认为艺术家不应以教育者自居,而应该是个热诚的探求者。因为当他探求的时候,他一心扑在探求对象的身上,目不旁顾,心无杂念,他是专一的,因而也是真诚的;只有这种真诚态度,才最能引起我们的注意,打动我们的兴趣。而人们总是不大愿意自己被人家当做小学生来对待的,如果一个作品充满了教训,只是把作者所知道的东西(哪怕是他自己探求到的)当做高级补品一样硬塞给人家,人家是不爱看的。艺术活动是种创造性的活动,不但作家的创作活动是创造,读者的欣赏活动也是创造。一个作家的作品愈是能够多给读者一些想象、发挥的余地,让读者和自己共享创造之乐,就愈能受人欢迎。所以,托尔斯泰的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探求者”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十分富有启发性。

殷:关于真诚和艺术家的探索精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思想。过去讲真诚,总是习惯性地把它看成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实际上并非如此。真诚的极致就是不满足,就是进一步探索和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欲望,就是“独上高楼”,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一定要看到“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但是,这样是否意味着真诚并不一定就是真实呢?

钱:这是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真诚与真实到底是什么关系。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序文中说,他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总竭力“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这需要花很多时间”,使他的写作因此“进行得很慢”,但是,他说:“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从他这句话看来,要得到真实,是比真诚更困难的。道理也很简单,真诚是主观的事,只需求其在我就行。真实却必须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才能达到。做到真诚,只是态度问题;求得真实,却还要涉及能力和水平的问题。其间的难易之别,是很显然的。

殷:假如真诚只是态度问题的话,赫尔岑的话是很容易被人们接受的。

钱:但是,容易做到的事,并不就是无足轻重的事。(其实,要做到真诚,也并不容易!)单有真诚,固然不一定能达到真实;然而要想求得真实,却决不能没有真诚。真诚可以说是求得真实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没有真诚的态度,是决走不到真实的彼岸去的。不要说像文艺创作这样一种与艺术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态度密切相关的工作,决不能没有主观上的真诚;就是办事情,做学问,要想认认真真、实事求是地追求一点真理,没有真诚的态度也是不行的。因为真理常常不是浮在表面的,要想得到它,必须下苦功进行钻研;而缺乏真诚的态度,你就深入不下去,也就很难得到真理。

殷:赫尔岑之所以认为得到真实更难,恐怕是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出发的,那就是特别注重表现真实,尤其是对客观生活的描述,要无比真实。

钱:现实主义所追求的,首先当然是“真”。这“真”,我觉得,就应该包括“真实”与“真诚”两个方面。或者以为,现实主义所讲究的,主要是个客观真实问题;真诚则是个主观态度问题,与现实主义是两回事。但是,现实主义不是首先要求作家应该忠于现实吗?忠于现实,难道不正是个态度问题?所以,讲现实主义,是决不能够把真诚撇在一旁的。

殷:我记得您在讲托尔斯泰时说过,托尔斯泰也是酷爱真实的,而且真实性是艺术具体性的首要因素。

钱: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们一方面说托尔斯泰酷爱真实,把真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方面又说他十二分的真诚,把艺术家的真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其实是并没有什么矛盾的。艺术创作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两者的对立统一。一个作家总是因为生活现实打动了,使他产生了一定的是非爱憎感情,他才来进行创作的。他所写的,只能是他所看到的和所理解的生活现实,并且是注入了他的思想感情,又经过了一番陶铸熔炼工夫的生活现

实。客观的生活现实和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在作品中是融为一体的,在艺术创作中,决没有纯客观的、未经心灵观照过的真实,也没有独立于客观的描写对象之外的真诚。对现实主义艺术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真”字。这“真”,就包括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在内。就是说,既要求有客观生活方面的真——真实,也要求有主观感情方面的真——真诚;并且要求两者必须密切结合。只有在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

殷:那么您所说的真诚和真实的统一是如何实现的呢?比如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也经常出现思想和感情互相矛盾的情况,《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也不能不经受内心矛盾的煎熬。

钱:托尔斯泰的创作,如我们所看到的,的确既是无比的真实,又是十二分的真诚;而且他主观上的真诚态度,又常常是和客观真实性相一致的。所以,他的作品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很能打动人。譬如,他真实地写出了安娜的美丽,安娜的真诚和纯洁。她虽然对丈夫不忠,但她并不想欺骗他,也不肯安于一种互相欺骗的虚伪关系。她会爱上渥伦斯奇,憎厌卡列宁,也是很自然的,托尔斯泰并没有因此而对丈夫进行谴责。但是,她对丈夫不忠的行为,又必然会给卡列宁,给她的家庭,尤其是给她心爱的儿子谢辽沙带来不幸,因而也必然会给她自己招致巨大的不幸,这就是她这种行为的必然的后果,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包括她自己的良心)对她的惩罚。他深刻而细致地写出了这些,这是写得很真实的。

殷:很明显,对艺术创作来说,艺术家的真诚是会直接影响他对社会真实的看法,所以,他所认定的真实往往与众不同,并不见得完全合乎公众的“真实”标准。这也说明,假如他丧失了真诚之心,也就无法认定什么是真实了,起码的真实也就无从谈起了。

钱:所以,真诚是对真实认定的基本前提,艺术尤其如此。1851年,当托尔斯泰刚刚

开始他的文学生涯时,他就在日记中这样写:“任何作品,如果想成为一部好的作品,正如果戈理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中讲的一样,那就应该是从作者的心灵里面歌唱出来的。”这种想法,他是愈到后来愈加笃信不疑。例如,在他1889年写给政论家戈里采夫的信中,他就说艺术家必需热爱自己的对象,他“必须去叙述的决不是使他无动于衷和他可以缄口不谈的事物,而仅仅是他不能不说的和他热爱着的事物。”他认为没有对对象的爱,便没有艺术作品。“只有当你每一次浸下了笔,像把一块肉留在墨水瓶里的时候,那时你才应该写作。”这些都说明了作家进行创作,必须顺应着内心的要求,必须有真诚的态度。

殷:但是,就“从作者的心灵里面歌唱出来的”这句话来说,真诚并不是一种不变的固定的状态,它是随“作者的心灵”而变化的,不同的心灵就会唱出不同的真诚之歌。

钱:是的。无论是“真实”,还是“真诚”,都有各种深浅不同的层次。就“真实”而论,既有表面现象的真实,也有内在本质的真实;既有个别事物的真实,也有整体现实的真实。就“真诚”来说,既有表现浮泛之情的真诚,也有体现至性至情的真诚;既有个人利己主义者的真诚,也有心系国家安危、人民哀乐的真诚。现实主义必须有客观真实与主观真诚的结合,在结合的方式与程度以及其中各种成分的比例上,更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所以,尽管同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各自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达到的水平,却可以是迥不相侔的。

殷:由此说来,真诚表达了一种基本的美学理想,是艺术家必须具有的品质。记得您在讲“艺术的魅力”之时,曾专引清人焦循用来解释“诗教”“温柔敦厚”的三句话,即:“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这后二句话都直接涉及到了“情”字。

钱:因为,所谓真诚,首先是感情的真挚,这是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也是艺术能够感染人,打动人的最重要因素。先说“不言理而

言情”。譬如,你到杭州西湖的岳坟去游览,就会看到坟前有秦桧夫妇和张俊、万俟卨四个奸佞的铁铸像跪在那里,还有一副对联写着:“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对联的意思是要告诉人们:忠良是人人敬仰的,奸佞则是人人痛恨的。但它不用讲道理的办法,而是把人们的爱憎感情渗透进去,仿佛青山都因为能埋葬岳飞而感到光彩,白铁则因自己竟被用来浇铸秦桧等人的形象而不免抱屈含愤。通过这种抒发人们的爱憎感情的方法,就充分地说明了忠良当受尊敬、奸佞必遭唾骂的道理。虽不言理,理也就因情而显了。

第三句话“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譬如《红楼梦》写贾宝玉被他父亲打了,伤势很重,许多人都来探望他。后来薛宝钗来了,她是很爱慕贾宝玉,希望能和贾宝玉婚配的。她来了,不但说了很多劝慰的话,还给他带来了治伤的药,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来写薛宝钗对贾宝玉的殷勤的情意。最后林黛玉来了,林黛玉跟贾宝玉的关系又不同于薛宝钗,在贾宝玉的心上,林黛玉的分量远远地超过了薛宝钗。曹雪芹又是怎么写的呢?他写林黛玉只说了一句话:“你从此可都改了吧?”而且来了就走,不肯久留。可这一句话,却以少许胜人多许,其分量、浓度都远过于薛宝钗的千言万语。这就是“不务胜人而务感人”。

殷:文学艺术主要是从感情上去打动人,这和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作用主要是感染的作用的说法是一致的,也同我们自己在观赏和阅读文艺作品时所得的感受完全相符。艺术作品是诉诸人的整个心灵的,不单纯诉诸理智。在艺术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感情渗透在艺术形象中,与艺术形象凝为一体。那种脱离形象、缺乏热情,一味抽象地讲道理的作品,不会有生命力,也算不得艺术作品。而要达到这一点,作家艺术家首先就得具备真诚之心,有一份真挚的感情熔铸到作品之中。

钱:对。要从感情上去打动别人,必须自己先有强烈真挚的感情。张定璜在他所写的

《鲁迅先生》一文里,曾经说鲁迅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他就强调鲁迅的冷静。鲁迅当然有他冷静的一面,但你说他就只有冷静,这即使是单从他的表现手法上来讲,也是皮相之论。其实,鲁迅是最热情不过的。他的冷是冷峻,是热之至。他无论写祥林嫂,写闰土,还是写魏连殳,写涓生、子君,甚至是写那个既可怜又可笑的阿Q,内心都无不充满着强烈的悲愤和难忍的痛苦,哪里是什么一味的冷静呢?总之,作家、艺术家必须具有强烈真挚的感情,缺少了这个条件,他就成不了作家、艺术家。

殷:在真诚和真挚的前程下,人的感情形态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情易形于色,有的则留之于中,发之为气;有的人习惯于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中异军突起,有的则在语言表达中辗转反侧,这就造就了作家、艺术家不同的创作个性。

钱:演戏也是如此。同一个剧本,这个剧团演,那个剧团演,味道就不同。甚至有的可以演得很好,有的可以演得很糟。譬如,契诃夫的名剧《海鸥》,第一次在皇家剧院上演时,遭到了极其悲惨的失败。契诃夫的富有诗意的台词,只能引起观众哄堂大笑,评论家甚至毫不客气地说:“这出戏是坏到无可再坏的了。”契诃夫在受到这次打击以后,痛苦万分,他写信给朋友说:“即或我活到七百岁,我也永远不再写戏,永远不再叫这些戏上演了。”可是后来,这同一个剧本,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领导的剧团演出时,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胜利标志。尽管皇家剧院的导演、演员,也都是第一流的,但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剧本,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这个剧本并不合拍,没有能找到恰当的节奏、色调,所以,演出失败了。艺术这东西,差不得一点点。俄国画家勃留洛夫曾经说过:“艺术起于至微。”就是说,艺术常常是从最微细的地方显示出来的。艺术要求具体,有时就不能差那么一点点。“失以毫厘,谬以千里。”

这在艺术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殷:这也说明,真诚是一种非常敏感的品质,来不得半点虚伪和假装。但是,艺术家也会经常困惑,找不到自己情感的归宿,甚至会怀疑自己的真诚是否真正能够觅得知音,获得自己的精神家园。

钱:但是,如果作家、艺术家缺乏热情,如果对艺术没有深厚的爱,他就不会劳神焦思地去作精益求精的探索。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关于要成大学问大事业必须经过三种境界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首先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吸引了你,使你有了一个目标。目标确定之后就要专精致诚,念兹在兹地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去不断追求探索。甚至为之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这样,你在历尽艰险、备尝辛苦以后,就必能有所成就,必能品尝胜利的佳果。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你对追求的那个目标,有没有足够的热情,有没有真正的爱。如果没有,那你就很难始终坚持,当然也就难于获得成功。而王国维所说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则大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意味,仿佛灵感来了,就会出现所谓神来之笔一样。所谓灵感,大抵就是这么一回事。“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只有“妙手”才能“偶得”,“妙手”决不是天生的,而是长期艰苦地磨练出来的。所以,重要的还是要有坚持不懈的刻苦的努力。

殷:您这里所谈的是创作的灵感,一方面这是一种可欲而又可求的境界,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对诚心的一种回报,颇有点宗教色彩,一个人只要有诚心,有恒心,孜孜不倦地追求,就可能感动艺术之神,给人们带来灵感。

钱:这是柏拉图当年的想法。但艺术确实是需要真诚面对和参与的,真诚和真挚本身也需要一个磨练过程。我看重的就是心灵的磨练和感情的陶冶,这也是所有大艺术家大诗人的共同品质。这种磨练和陶冶并不都是平静的,有时候可能伴随着剧烈的内在矛盾和精

对《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的商榷

□ 徐 珂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北京 100872)

[关键词] 20 世纪中国文学 欧洲文学 前苏联文学

[摘 要] 本文反对把欧美文学作为核心准则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定性的做法, 反对忽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殊形态和性质; 主张文学分期应放于世界文学大系统中, 在实践中用系统的观点来进行考察, 并用更多的争鸣和声音相融和相补充, 才能科学地把握。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1999) 10- 0092- 07

由于种种原因, 笔者最近才拜读杨春时、宋剑华两位同志的《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以下简称《论》)①一文, 该文的核心思想

是, 否定了由于学术界“机械地套用西方文学史的分期于中国文学”而认为“20 世纪的中国文学, 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中国

神痛苦, 正像茨威格在读托尔斯泰和陀思陀耶夫斯基时的感受:“我以整个身心热烈地爱着这些形象, 同时也十分明确地感觉到, 我是不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 因为这些巨人总是强迫自己想入非非, 总是自己起来反对自己。……”

殷: 这同样是一种令人迷醉的真诚。当艺术大师向我们坦露自己内心的时候, 从来不阳奉阴违, 只把光明的、美好的、妖艳夺目的部分拿出来, 而是敢于显露整体, 包括其中罪恶和丑陋的因素。

我记得您在评论《柯灵散文选》中指出作者的一些篇章之所以给人印象特别深, 就因为其“字字行行, 犹如履齿印苍苔, 都是他生命的留痕”。这里的“生命的留痕”说得特别好。

钱: 这原本是柯灵先生自己说的。其实,

何止是写散文, 写小说, 人生所从事的一切事业不都是“生命的留痕”吗? 但是, 如果没有一点真诚的话, 就未必有真正的“生命的留痕”, 因为生命的痕迹就是真诚的见证。就说治学吧, 这和做人是一致的, 首先必须真诚。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或以治学为职业的人来说, 他的为人可能主要就是从他的治学态度上集中体现出来的。所谓治学和为人的真诚, 也就是指他在这两方面的认真严谨与诚心诚意。没有这种对于治学的真诚态度, 一个人的学问是不会达到深湛境界的; 同时, 对于治学的真诚, 也意味着不能将其视为手段, 当作谋取世俗名誉的途径。因此, “真诚”多少带有某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含义。这实际上也就是指治学必须以执着不断的追求和热爱为首要前提。●

责任编辑: 陶原珂

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也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的思想,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并以确立古代文学(“尊崇集体理性,严守形式规范的创作原则,体现了个性未获发展时代的审美理想”)、现代文学(“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突破理性与规范,带有鲜明的非理性倾向”,“体现了个性解放的现代人的审美理想”)、近代文学(“以肯定人的价值、关注人在社会现实中的生存状况为己任,积极参与变革时代的社会实践,带有明显的实用功利主义性质”)三个概念为逻辑起点,进而从中国文学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来论证这一问题的。因而看起来好似逻辑严密、鞭辟入里。实事求是地讲,《论》文推翻了文学界传统的文学分期论,对于科学地反思和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和位置,以利于中国文学今后遵循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这不但不是新潮式的哗众取宠,而且体现了大胆的学术建构精神。但是,笔者认为:从现代性到近代性,决不仅仅意味着是打破“以西方文学史的分期于西方文学”的结果,而主要还有以西方文艺中的科学、民主精神张扬于我国和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中国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逐步胜利的原因。因为,西方“对于现代派文学形成的比较确定的时间界限,一般仍以象征主义出现于文坛的时间,即1870年为上限”,②早“五四文学”运动差不多半个世纪。从“现代性”到“近代性”,体现了冷战结束前后,知识分子对文学关注焦点的普遍变化。

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意义深远。正基于此,笔者才不避冒昧,首先把向《论》文发出诘难(对事不对人)作为抛砖引玉的方式,不但希望学术界更加重视这一问题,把论争引向深入;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文论家们能科学地

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为此,笔者建议:思想解放步伐不可超过限度,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为近代性或前现代性③为时尚早,不可草率。

《论》文以欧美文学为论述的核心准则,歪曲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特殊形态,忽视了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质,不能用普遍联系、全面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从而使《论》文逻辑起点和论证处于不成熟的状态,还不能全面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其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表现之一。《论》文从“欧洲的近代文学而不是传统的古典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确立必须“以世界文学史为参照系,采用世界文学的统一标准,而不能把自己孤立于世界文学的系统之外,自行确立一套标准”,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文学”,实质上却以欧美古代、近代、现代文学三个概念为标准,忽视了中国文学的特殊形态和性质。首先,到底是传统的古典文学还是欧洲的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这个问题早已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今天不可能(恐怕以后也不可能)终极解决这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下的一元论问题。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二者都是催生中国文学的力量(当然还有社会主义文学),都可能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阶段性地或综合性地彼消此长地成为中国文学的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例如,西方文学的科学和民主两大精神就曾经成就了伟大的五四文学运动,建国以后这两大精神在社会主义文学中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升华;传统古典文学内涵直到近来也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作家二月河帝王序列、金庸的武侠小说便是例证。《论》文把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排除在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外,无论如何都是对文学历史的误读。且不说传统内在精神家园的丧失不可能如爱琴文明一样一蹴而就,无

端消失,单从两位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学排斥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这一点来看,中国古典文化精神还是内在于中国人的实践生活中的。而作者所举的“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以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只是在后期才出现了像李金发、洪森等极少数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主流仍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例子,也就成了这一情况的极好说明。不过,这是古典文化精神多元转换后的呈现而已。这个多元,当然不仅包括欧美的近代文学,还包括欧洲现代文学,更不可忽视当时崛起于世界文学之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在进入到世界文学范围的20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逐步创建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到底要不要以前苏联文学为参照系?正视这个问题,对于正视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文学由于遇到暂时的挫折无法给理论作一实践性的证明而遇到的窘境,有极大的理论意义;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我们是否还继续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前途和命运;这个问题的结合点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性。我们处于世界文学统一体中,在认识自己文学的性质时,有必要借鉴世界文学。但绝不能专注于世界文学的一种,以之为圭臬,而对于别的优秀文学采取排斥的态度。《论》文在逻辑起点上,把古代、近代、现代文学概念定位在欧洲文学理论的前提下,作出苏联文学是欧洲文学意义上的“近代性质”和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的结论,取消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先进性甚至合法性,不时流露出一种当前文学界不少人具有的后殖民主义自卑情结。而作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定位从近代性到前现代性的彷徨徘徊,从侧面印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结论尚未达到科学的程度。从前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看,社会主义文学应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它不再是19世纪30年代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是在文学内容和形式上对它的更高扬

弃。它的创新还在于,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等等,比欧美近代文学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我们不能因为苏联解体了,就潜在地否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成果,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我们不能把“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看作中国文学的落后性,这就引申出第三个问题:作者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框架体系内,是否忽视了中国文学的特殊实际,而强把20世纪中国文学框定于欧洲文学的理论准则之中?笔者认为,要科学地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就要注意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实际,而不应在总结前就把20世纪中国文学先验地打上欧洲文学的色彩。《论》文作者认为,五四时代的“西化”演变成为“苏化”,苏联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取代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思潮而被人们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主流”。既然《论》文在前文中曾以欧洲的近代文学作为中国近代性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苏化”的社会主义文学如何在吸纳和抗拒欧洲文学基础上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既然“西化”的中国文学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那么若以欧洲文学来作为评判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唯一标准,主要理论缺陷是什么?前面的问题既说明了作者在论证中的矛盾、疏离和脱节:主流和内在动力如何处理?又说明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批判地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时必然显现出自己的中国特色:它自己独特的审美规范、独立的价值追求和富于民族特色的时代意识。也正是由于中国国情和文学自身的特殊性,才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既不同于欧洲文学,又异于前苏联文学。而中国的国情和文学实际又恰恰与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学有很多共同点。例如:前者主张文以载道,后者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等,加上中国对社会主义文学在理论和现实中的迫切需求就为其在中国的传播、植根、生长、

成熟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因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它忽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质是我们民族文学能在世界文学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它便于我们今后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学先进资源、排斥腐朽因素的同时,补充并中和镶国文学,而不是仅作欧美文学的应声虫。在有中国特色的20世纪文学面前,我们不能不考虑有中国特色的那部分而一味作后殖民主义的认同。正如孙绍振先生所言“他们往往不是去寻找西方理论同中国经典文本的矛盾,而是满足于西方理论跟中国经典文本的一致”。④我们固然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反对“古已有之”的变态自尊,但又要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民族自信心。

因而,在文学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中,我们不但要具有现代眼光,而且还要有历史意识。《论》文排除了前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性质的评价作用,有忽视历史意识之嫌,它抹杀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特殊性,没有达到现代眼光与历史意识的统一。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学特色,把它植根于世界文学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在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学体系中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

表现之二。以“文学史的分期主要应该从文学的视角加以确定”为理由,该文作者认为“应该区别开政治视角与文学视角,从政治视角把‘革命文学’划入现代史范围的理由并不充分”,从而在实际上忽视了政治视角、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政治视角对文学规定性的同时,过分地抬高了欧美经济视角对文学的规定性。《论》文认为,由于苏联国内存在某些把社会主义文学庸俗化的倾向,有时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中国文学在20年代后期接受苏联文学思潮时,必然也带有庸俗化倾向,例如,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原则等等,这也是笔者所同意的。但是,这如何就由此得出“这个时期文学(笔者注:指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更为彻底的新古典主义化”?难道革命的现实主

义与理想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文学还没有达到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层次?难道文学的优秀时代精神发生了历史的倒退?固然“文革”期间极“左”思潮使社会主义文学审美品格几乎丧失殆尽,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学正是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经历了“文学理论上一次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⑤才使社会主义文学在极大包容性的基础上展开了与西方的对话,汲取了不少外来营养,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轰动效应。这恰恰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政治意识形态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这种惨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谁又会忘怀呢?而反反复复地陷于理论泥沼的人们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为什么偏偏不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康庄大道奋勇向前呢?既然作者都承认“文学体现着人的超越性的追求”,承认“有时历史进步推动文学历史的发展”的一面,为什么却看不到社会主义文学由于其相对于经济基础的特殊发展性,能创造出超越商品经济阶段而具有现代乃至当代意识的文学繁荣呢?

随着苏联解体,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美国经济持续高度的繁荣,这种大气候使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关注经济因素而有忽视甚至取消社会主义政治对文学影响的危险。而社会主义精神也由于文学家们诗意启蒙的沟通与表达不充分而没有彻底地张扬起人们奋斗的理想风帆,出现了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文学政治前途信心正逐步丧失的趋势,并进而转向乞灵于欧美经济现代化条件下的文学。前年结束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决不是如作者所言“是近代理性精神对现代非理性精神的后卫战”,而是人们对以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为主体的现代形态的人文精神的呼唤,这种现代形态当然包括在社会主义文学精神之中。它的失落不是为“近代精神唱起挽歌”,而是中国人为解决物质的贫乏,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诱发的拜金主义、消费社会对人的

漠视,导致传统精神家园被污染,道德堕落,信仰失灵,精神萎缩。中国人的存在不再是 80 年代那种刚开放国门时,感触西方文化,兴奋和希望相互交织、热火朝天的初级阶段,而是西方观念进一步深入到人们的精神层面上来,人们经受着物质和精神二律背反的双重重压并习以为常地承担着,因而显得沉稳、平静和成熟。正在争论的古代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实质上即是在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低迷的情况下,人们重新建构新的精神家园的努力尝试。其存在的问题盘根错节,最重要的环节是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和以马克思文艺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论三种不同形态的文论从彼此精神障碍中解脱出来加以诗意沟通、融合扬弃。因而,这个新的精神家园必然有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分。但是,文学不是经济,不是经济这个唯一因素决定的,更不能用经济倾向来取代政治倾向,而应综合、系统、多视角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质。20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壮丽和辉煌是不可抹杀的。如果单以欧洲文学精神来论中国文学性,必会产生削足适履的弊端,进而无法科学地加以确立。因此,科学地介定中国文学的性质,就不能不考虑中国特色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政治因素对文学虽有消极的一面,但在目前,多元共生的时代需要一种共同的声音,而政治就可以发挥这一积极的效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但反对如作者看到的“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内镶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概加以排斥,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却把苏联式的新古典主义视为永恒的、不可超越的文学模式”倾向;而且在市场经济深化的未来,反对以反“左”为名,坚持文学无限盲目自由化的倾向也必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坚持更为必要。

表现之三。在对我国未来文学发展瞻望上,作者以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必定向人们传播着现代文学的信息,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时代

的到来,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为契机,指出,“我们坚信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一定是现代主义文学”,体现了对现代主义崇拜的精神。作者是如何推导出 20 世纪中国文学必然是非理性主义的、西方式的现代主义?这里隐而不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的必定是现代主义文学。那么,现代主义文学是中国未来文学发展的必然吗?现代主义文学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吗?真如作者所言,能够使中国“继续缩小与世界现代文学的时差,以全新的面貌,跻身于世界现代文学”之林吗?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西方文学发展趋势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国文学未来的趋势和走向,但绝不能因此就说中国文学的未来是现代主义。中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更有自己特有的国情,当下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拒斥也正说明这一点。前不久,著名导演陈凯歌执导的历史故事片《荆轲刺秦王》无视历史实际,实际上采用了西方解构主义的艺术精神,但却被国内观众称为“显示才华,追求轰动,胡编乱造与戏说”。⑥不也从现实中印证了这一点吗?而且,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使 21 世纪有可能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中创造出另一种文化环境,产生出不同于今日精神的文学。中国一贯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西方最新的科技成果的直接运用,就会缩短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也不会经历同西方国家一致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在政治上,我们已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在文化传统上,中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所以,一方面:西方社会文学随着经济出现的新形态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也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托多罗夫认为:“现在是综合使用各种方法的时代”,⑦文学理论的综合多元化必然不会把现代主义文学定于未来的一尊。拉尔夫·科恩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序言”中,首先指出欧

美文学理论界的一些人士正在把文学理论同有关社会运动结合起来,给文学界以新的舆论,“社会”(包括历史、现实、生活、政治)很可能成为未来融合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研究特定时代里的文学理论一些重大问题的最主要根基和中介。⑧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一文中,就美国文学理论发展趋势指出:“事实上,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也追求超越感性/理性等二元对立模式之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就趋向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某些重大理论见解,无意中偏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新情况孕育的新精神,必然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精神状态。现代主义终因自身的缺陷而无法阻碍更前卫的文艺产生,这可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以极大的宽容对话精神吸收和包容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给中国文学带来了80、90年代的繁兴。由于其先进性、革命性和科学精神使然,它必然随实践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提高。为此,国内外众多的学者做了艰辛的探索 and 追求,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例如,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化的探讨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其开放性、包容性正符合当代多元共生的时代精神,必然成为未来振兴中国文艺的中坚力量。其对传统、外来文学的辩证批判精神,必然不会坐视西方精神糟粕不管不问。社会主义的文学要求在百家争鸣的气氛中,以求真务实而又灵活的手段,正社会主义文学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伟大精神之风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柱和必要的智力支持。因而在实践中绝不会盛行作者所谓西方式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以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例如:意识流、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创作方法和原则,给文坛带来了阵阵清新的空气,也几度催开了我国文学的繁荣之花,这是我们要借鉴的地方。例如: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就借鉴了意识流的手法,残雪的《苍老的浮云》、余华的《世事如烟》,就借鉴了荒诞派手法等等。要对文学进行分期乃至区分文学特性,文学本身、文学特有的创作方法的形式和结构等文学性因素也是必须关注的重要一极,但是,作者把现代主义文学所突破的理性与规范的非理性状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当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精神所追求的,这就值得商榷了。试想,在我们的国度里,文论家们希望出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的异化和精神分裂的状态吗?我想,任何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人都会对违背“二为”方针的“西化”行为作出否定的回答。是的,这不但是我们努力拒斥的东西,而且是社会主义文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矗立的重要原因。发展市场经济,可能会带来一些颓废与虚无的思想糟粕,而社会主义文学正是要肩负铲除这些毒瘤,宏扬传统道德精神和正气,唱响昂扬向上的时代主旋律的任务;它要以世界级的文学手法使更多的中国人民参与到审美愉悦中来,自觉接受潜移默化的崇高道德的熏陶,提高自身分析、认识事物的能力,全面升华自己的情操素质,从而树立一种契合时代,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这才是社会主义文学应该为之奋斗的方向。

除了上述三大疏漏外,纵观全文,作者在论述上还有许多其他值得怀疑和推敲的地方。例如:中国文学“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是否会因为措词过于机械而背离中国文学实状呢?后来又说“并不是说在百年之中,我国毫无现代文学因素可言”是不是与“只具有近代性”相矛盾呢?既然中国古代文学理性主义异常坚固,何不直称为理性主义占统治地

位的近代文学?作者所说的20世纪中国文学面临的三项任务是不是有先入之见?欧洲文学在19世纪何以打破孤立封闭的状态,加入到世界文学阵营(中国何以被排除在外)之中?等等,不一一例举。这些问题的存在虽然对于作者举证大多无伤大雅,但作为理论的论述在力求严密而符合逻辑,即力达科学性方面,这恐怕不仅是二位作者努力的方向,而且也是多元共生时代对多元论争的学人们迫切而又现实的要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总结,应放于世界文学大系统中,在实践中用系统的观点来进行运动的考察,并用更多的争鸣和声音相融合、相补充,才能实现科学的把握。正是因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存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而,我们既要考虑到中国文学自身的特殊形态,又要顾及世界文学体系下各种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和欧美文学)对我国文学的参照作用;既不可套用世界文学史分期于中国文学史,又不可忽视世界文学史,甚至不可忽视时间问题。尽管两位作者对文学的分期标志着西方观念不自觉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精神之中,成为评判事物的力量;但决不可借世界文学之名,行欧美文学之实分期于中国文学,更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宽容,而使文艺理论家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立场,须知,文学不可能游离于政治之外。我们也不可不顾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而囿于某一历史和现实的偶发波折或事件,使一些文艺理论家在建构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更多地带有了理论的局限性及其呈现的虚假性,从而脱离了社会现实和历史逻辑发展的进程,把理论科学化的萌芽和成长扼杀于错误判断的迷雾之中。

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定位的问题,实际上是与“人文精神”讨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一脉相承的,它不但体现了在西方文化的冲

击下中国文论出现了失语状态,一些知识精英分子要求民族文化从后殖民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良好愿望,而且隐含在更深层次上的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即是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或者完全西化的问题之中。这个问题我国虽已在战略上作了科学的回答,但是,在实践上具体究竟如何实现和发展,人们将在建设中拭目以待。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将是决定文学如何分期的主导性因素。在这个大的期待视野下,文论家们对人文精神、古代话语的现代转换等问题尚须进行艰苦的科学化的探索和梳理,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而单从欧洲文学或者经济视角来分期中国文学,这与传统文学分期一样,都会被不断发展的现实实践所抛弃,因而,文学分期为时尚早。●

①《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②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著:《西方文艺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04页。

③《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6期,第79页,杨春时:《前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

④《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第13页,孙绍振、夏中义:《从工具论到目的论》。

⑤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页。

⑥《北京日报》11月2日报道,《北京晨报》11月8日转评《这类影视应加提示》。

⑦引自《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一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⑧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⑨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鲁迅与象征主义

——兼谈阿 Q 是象征型艺术形象

□ 张硕城

(广东省社科联副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050)

[关键词] 鲁迅 象征主义 阿 Q 形象

[摘要] 象征主义是鲁迅作品的一个明显的艺术倾向和风格, 是鲁迅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审美原则和一种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 阿 Q 是个象征型艺术形象, 是写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完美结合的典型。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10-0099-08

十多年前, 我在分析《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时, 开始关注鲁迅作品中的象征主义问题(参阅拙作《试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 《学术研究》1981年第8期)此后, 阅读了许多研究者对鲁迅象征主义艺术表现手法的探讨文章, 颇受启发, 深感象征主义在鲁迅的创作中不仅运用较多, 较广泛, 而且不仅仅是在一般艺术表现手法上运用, 还涉及到鲁迅对象征主义的审美倾向的某种偏好, 也涉及到鲁迅对象征主义艺术的认识、“拿来”以及创新等一系列问题。我觉得, 象征主义是研究鲁迅的美学思想、审美倾向、艺术表现手法时所必然要涉及的难以回避的问题, 同时, 这一问题不搞清楚, 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也必然要大打折扣。

一、象征主义是鲁迅的重要的创作审美倾向和基本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构成了鲁迅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的艺术风格。

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 五四时期

的鲁迅, 在“为人生”并“改良这人生”的基本文学主张的引导下, 在创作实践中, 在创作审美追求和艺术表现手法上, 走的是一条多元化的路子。艺术创作上的不流时俗, 不拘一法, 杂取多样, 独特出新, 是鲁迅作品审美原则和表现手法的基本特点之一。鲁迅所杂取的各种艺术样式、手法之中, 象征主义是用得比较多的, 这既包括了众所周知的《野草》, 也体现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的许多篇章之中。小说方面, 除了较明显的《狂人日记》之外, 《药》、《故乡》、《白光》、《长明灯》、《孤独者》、《猫和兔》等许多篇章其实也带着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即使在杂文之中, 许多世相的刻画和表现, 也采取了象征手法。尽管没人作过精确的数量统计, 但鲁迅作品中, 象征艺术的运用之广泛, 之频繁, 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此, 早在 20 年代就已被茅盾等独具慧眼的评论家所指出过, 但并未被后来的主流评论所接受。此后几十年, 直到 80 年代初, 关于鲁迅作品的象征主义问题才又重新受到重视。其中, 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的艺术探源》(《鲁迅研究》第二辑,

1981年2月中国社科版)较早地分析了《野草》的象征主义艺术表现方法,启发了不少研究者,使人们把目光逐渐扩大到鲁迅其它作品之中去,指出了鲁迅创作中的象征主义的广泛性和普遍性。然而,迄今为止的这许多的评述之中,我以为主张鲁迅是在艺术表现手法或技巧上运用象征主义的意见居多,而把象征主义视为是鲁迅在艺术审美原则上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的意见居少。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一种被作家大量采用的艺术手法,竟然会与作家的审美原则追求脱节?竟然会与作家的艺术审美思想关系不大,甚至游离?这恐怕是讲不通的。无论从鲁迅审美创作的实践,抑或从鲁迅对象征主义的大量接触、评介去看,鲁迅对象征艺术的推崇和采用,都是一种从审美原则到艺术手法上的自觉的、有意识的追求。

象征,作为一种艺术审美倾向或艺术创作的表现手法,在人类的艺术创造的长河之中古已有之。然而,作为一种艺术观和艺术流派出现,则是西方19世纪的事。象征主义产生时,就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含义:一层是作为一种艺术哲学思想。它以上世纪末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艺术观念主张和创作为标志。它以唯心主义(或唯灵主义)的世界观为出发点,认为艺术本质上是主观世界的产物,世界为“我”存在,真实不在客观,而在另一个世界即“灵”;它贬低理性,崇尚非理性的直觉和梦幻;它在艺术倾向上表现出虚无和悲观,认为“欲求”是痛苦的永久的根源(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译本,第497页);它在艺术思维方式上是二元论的。这种艺术哲学上的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波德莱尔、爱伦坡、瓦雷里、马拉美等。象征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美学和表现手法。它与前面的象征主义艺术哲学有某种思想上的渊源,但艺术主张上并不相同。它是艺术创作实践中产生的一种艺术思维方法和审美方式。它始于19世纪欧美象征主义文学思潮,是现代主义艺术

审美思想中最基本的最流行的一种审美方式和创作方法。从艺术审美理论上提出“象征主义”的第一人是黑格尔。在黑氏的《美学》第二卷中,集中讨论了“象征型艺术”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黑格尔指出文艺创作中象征型艺术有两种形式:“一种有独立的特性,产生了一个特定阶段的艺术观照和表现的基本类型,另一种却降低到仅是一种不能独立的外在形式。这第二种意义的象征在古典型艺术(即写实主义——笔者)和浪漫型艺术里也可以看到。”这里,黑格尔首先是把象征型艺术作为一个单列的艺术审美方式与“古典型艺术”、“浪漫型艺术”并列的;二是严格地把象征定位在艺术创作审美原则的层面,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艺术哲学观念;三是把象征艺术又具体划分为一种审美原则和艺术手法(形式)。尽管这种划分是否科学、严密尚有争议,但今天看来,它仍是我们划分象征主义文艺流派和一般创作中的象征艺术手法的一个重要依据。黑格尔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欧美象征主义文学运动是由歌德、柯勒律治等人掀起的。19世纪欧美的这支文学流派的产生,直接推进了象征主义作为审美原则的风行。它的成果主要是:第一,在审美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上,强调对写实主义的过于直观地观照现实进行反拨,不满足“再现式”或者“触发式”的艺术把握方式,要求对现实的审美把握和观照必须通过艺术的“假定性”方式进行,使艺术创作既有一种感观的具体性,又有一种寓寄其中的知性、理性或抽象性,使审美过程具有一种向精神内涵的内向式延伸性或指向性,说白点,就是引向深层感悟的哲理性;第二,在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上,要求把对客体的描写心态化、表征化,运用诸如隐喻、通感、暗示的手法,求得一种可以感悟的内延性、多义性、不确定性的艺术效果。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想传入中国,主要是在五四之后,“由1922年到1926年,这后来的五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甚至是表现派,未来派等尚未成熟的倾向都在这

五年间在中国文学史上露过一下面目”。(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当然,这只是概而言之。其实五四之前,西方象征主义作品和文艺思想已陆续零星传入了中国,并为当时许多作家所关注和崇尚。

鲁迅对象征主义的接触是较早的。开始是在留日时期。1906年,他就读了象征主义小说《小约翰》,是荷兰作家望·蔼覃的作品,鲁迅认为这是一篇“象征写实派童话诗”,“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鲁迅译文集第四卷·译丛补》)于是当即就想译成中文,未成。直至20年之后,才与人合译出来,算是了了夙愿,钟爱之深不言而喻。此后他写的《摩罗诗力说》中,所介绍的西方近代文艺思想和浪漫诗人,其中也有不少是有象征主义倾向的,如尼采、斐多菲等。当时,鲁迅刚“从文”不久,而他“从文”之初首先致力于的文艺创作,就是介译西方文艺作品。1908年,他译了俄国象征主义作家安德列夫的两篇小说《默》与《漫》,1909年又译了安氏的《红笑》的若干片断。而他早期的文言小说《怀旧》中,也曾表现出对印象主义手法的尝试。1913年,他译了上野阳的《艺术玩赏之教育》,更是详细介绍了印象主义特点及手法,当时的印象主义其实也就是象征主义。鲁迅“从文”之初,首先产生兴趣的就是西方象征主义作品,这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他年青时的浪漫气质所决定的,同时,与他当时所崇尚的哲学和摩罗诗人的精神是一以贯通的。此后,留日回国至五四,他对象征主义作品应该是陆续有所接触和不断加深了解的。因为,周作人等一批诗人、作家,五四之前也都介译了许多象征主义的作品,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文坛的一种时尚,鲁迅应该是有很多机会阅读的。

1919年,《狂人日记》的发表,是鲁迅大胆运用象征主义于创作实践的决定性的一步。这篇小说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由于它是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象征主义小说,标志着现代象征主义在中国的问世。关于这篇小说

的象征主义审美倾向和表现手法,本人早已说过,不少人也有详细的评述,这里不再赘述。当时,是否有意识地采用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来创造“狂人”,鲁迅并未明说,但是他所点出这篇小说“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否暗示出自己艺术创作的本意呢?第一个点出《狂人日记》有“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的是茅盾。茅盾还认为,“《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都在体裁上,因为分明给青年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茅盾《读呐喊》)可见,茅盾对《狂人日记》所采用的“新形”和新体裁是分外关注的,而这“新形”、“体裁”显然是指象征主义。同一时期,鲁迅还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等诗歌,也都充满着象征主义的色彩。此后的《药》、《明天》、《风波》等小说也溶入了许多象征的技巧。这些都表明,五四之初,鲁迅已有意识地把象征主义艺术手法引入创作,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常用的创作手法加以运用。至于五四之后,创作《野草》、《故事新编》的时候,正如许多人所说,鲁迅对象征主义的艺术审美方式和手法的把握已到了相当自如娴熟的地步。

鲁迅把象征主义引入创作实践的同时,还自觉地对象征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探索。这些理论探索一部分散见于他的译作序言和小说序言之中,更多的是反映在他对象征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上。1920年,他翻译了尼采的《察拉斯特拉序言》,指出尼采此书“用箴言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实际上是指出了象征主义的某些特点。1924年,鲁迅又翻译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作为授课讲稿,标志着重迅对象征主义艺术完全走上理论的自觉。鲁迅不是《苦闷的象征》的首译者,在他之前早有人译过,鲁迅为什么要亲自再译?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需要,而且,也为了讲授推广。另外,这两本书的翻译几乎是与《野草》的创作同时进行的,是否可以认为是“有

意”的同步呢？这时的鲁迅，对象征主义审美艺术的追求已经可以说是从早期的兴趣偏好发展到了自觉的追求了。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象征主义对鲁迅的影响过程中，有两个人的影响特别大。一个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创始人波特莱尔，一个是俄国象征派小说家安德列夫。这两人的尊名在鲁迅的前期著述中的出现率是不低的。然而，同是象征主义的他们，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并不同，从中，是可以看出鲁迅是如何对象征主义进行分析取舍的。

早在五四之前，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就已陆续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文坛流行。周作人以及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人，都译过波氏的诗。鲁迅在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作品时，也介译了书里的有关波氏的叙述和作品，其中对波氏散文诗《窗户》是全文照译地介绍了过来。波氏是个极端的唯灵论者，是象征主义艺术哲学的代表，他的艺术观不仅是唯我的，也是颓废的、弃世的。波氏的世界观的颓废消极，以及艺术上的颓唐，与鲁迅“为人生”的文艺启蒙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鲁迅对波氏的艺术主张一向极不感兴趣。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鲁迅，提起波氏，还说：“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然而，艺术哲学和文艺观上的歧见，并不排除艺术审美方式和形式手法上的借鉴，这正是文艺审美的复杂性的反映。鲁迅在厌弃波特莱尔的颓废的文艺观的同时，对波氏的散文诗中的象征主义艺术手法和象征美，倒不见得厌憎，甚至还很是看重和欣赏。否则，他就不会在《野草》中那么大胆和大量地借鉴、吸取波氏的艺术表现手法。有人说，这种吸取几乎到了一种刻意仿效的地步，《野草》几乎可以看作是波氏散文诗的“翻版”。这样说或许不太恰切。但《野草》中的不少篇章，从题材到手法，从形象到风格，从氛围到意境，分明深烙着波氏的影子，却是谁也不好否认的。

至于安德列夫，则是一直为鲁迅所欣赏和推崇的。1921年，鲁迅在译介安氏的《暗淡的烟霭里》之后，在《附记》中说：“他有许多短篇和几种戏剧，将十九世纪末俄人的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这里面”，“安德列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周作人也曾经说过，鲁迅“所最喜欢的是安德列夫”。（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关于鲁迅之二》，中国青年社1957年版）冯雪峰也有段回忆说，鲁迅直到1936年7月，在审阅一篇论及鲁迅受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影响的文章时，亲自将托、高二人的名字涂去，添上了“安德列夫”四个字，并对冯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德列夫有些影响。”（见《冯雪峰文集》上册第121—122页，人民文学社1981年版）可以说，在西方现代派作家中，安德列夫是影响鲁迅创作艺术审美倾向的最为深刻的人之一，而且这影响大量体现在鲁迅的小说之中，不仅《药》里是如此，《狂人日记》、《故乡》等其它许多小说中也是如此。那种“安德列夫式的阴冷”，象似一个幽灵，飘荡在鲁迅大多数的小小说中，造就了鲁迅小说的特有的“冷峻”的格调与气氛。

从鲁迅对上述二人的态度及艺术上的取舍，可以看出：第一，鲁迅对于象征主义，经历了从早期的感兴趣、喜爱到后来的仿效、吸取，再到融合、创新的过程，这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也是从直感到理性的过程。第二，鲁迅坚定的“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决定了他对西方象征主义的吸取是创作审美层面上的吸取，而不是对其艺术哲学和艺术基本观念的吸取。鲁迅早、中期还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本来与西方象征主义哲学有着相近似的世界观基础。然而，鲁迅又是一个清醒的现

实主义者和热诚的爱国主义者,在面对中国严峻的客观现实时,鲁迅没有躲进唯我主义或唯灵主义的象牙之塔;鲁迅把文艺作为启蒙救国的武器,也使他难以认同象征主义艺术哲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二者之间的这条根本的思想防线,不是直接来自世界观,而是直接来自人生观与文艺观的不同。这样,也就决定了鲁迅不但可能全盘吸收象征主义艺术哲学,而且有可能在吸取象征主义审美原则和艺术技巧时,进行合理的取舍与创新。第三,鲁迅对象征主义艺术是从审美原则到表现手法的较为完整的吸取,作为一种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艺术境界来吸收和创造的。因此,单纯从形式技巧的角度难以解释其作品在审美风格和倾向上与波、安二人的“神似”。在鲁迅当时的眼光看来,象征主义审美原则和倾向,较有利于表现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主观认识和感受,也比较适合自己用文艺启蒙国民精神的目的,更为自己内心的沉重压抑提供了合适的宣泄手段。“苦闷的象征”,在鲁迅,这苦闷不同于“人欲”,而是个性所受的压抑,是“寂寞新文苑”,“荷戈独彷徨”的苦闷。第四,鲁迅对西方其它文艺思想和流派,如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的了解和追求,并不亚于象征主义。在鲁迅那里,它们都是可以相通的、兼用的。鲁迅当时对各种艺术流派并没有作文艺本质即艺术哲学上的深究,他只关注他们的“作用”,只要可用,便“拿来”。这样,也就不管浪漫、写实抑或象征,都在其“可用”的共同点上达成了兼容和互补,融汇成一体。这也就是他所称赞的安德列夫式的做法——“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消融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这点,在下面谈到阿 Q 形象的象征问题时,将会作进一步的分析。第五,鲁迅对象征主义艺术审美原则和手法的刻意的、自觉的追求,最终使他在波、安二人的吸取过程中,又自觉地加以融合创新,使象征主义艺术中国化,并做出了“实绩”,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鲁迅式的文学审美倾向和艺术

新形式,对中国现代新文学样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阿 Q 是个象征型艺术形象,是写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完美结合的典型。

在谈到鲁迅与象征主义的关系时,不能不想到《阿 Q 正传》和阿 Q 形象。这篇小说是鲁迅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新文学迄今为止最高成就的典范。问世 80 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甚丰,文章汗牛充栋。同时,对阿 Q 形象的各种不同理解、诠释以及争议也似乎从未停止过,诸如阿 Q 是不是“农民”,他属于哪个“阶级”,阿 Q 精神是否有“阶级性”,等等。此间,认为阿 Q 为现实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典型化形象的说法一直是占主流的意见。50 年代何其芳先生在阿 Q 典型化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共名”说,比既往的解说进了一大步。何先生别开生面地用“共名”这一新的范畴,企图圆说阿 Q 形象解说中的许多歧议,弥补用传统现实主义即写实主义所难以说清楚的阿 Q 的广义性与泛指性。然而,何老先生的“共名”说毕竟只是在“现实主义典型化”大框架之中的一步前行,它仍旧没能正面回答和解释:使阿 Q 之所以成为一种“共名”的原因是什么,即是什么艺术方式和表现手法使阿 Q 能从“这一个”变成几乎每一个人的“共名”。80 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开始注意到阿 Q 形象的象征意义和创作中的象征手法问题。本人也一直在往这方面思考,愈来愈感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对阿 Q 形象的理解上的歧见,很大程度上是思维方式上的分歧。这些争议大多是先从阿 Q 形象的内含和意义着眼,先解释阿 Q 的社会内容,然后再去追溯表现这一内容的艺术手法。然而,恰恰阿 Q 的内含意义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游移性和广义性,所以,无论怎么争,也都仍然只能原地踏步,还原到原先的分歧之中。

阿 Q 之所以在鲁迅所有小说人物中,特别地表现出它的丰富性、复杂性,除了生活本身赋予它的丰富、复杂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与创

作手法上的特殊性有关的。因此,我们不妨把思维倒过来,先从阿 Q 创作的艺术方式和表现手法着眼,恐怕理解上就马上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先作一种“假说”:假如阿 Q 本来就不是一种写实主义手法写出来的形象,或者说,它就是象征主义手法的产物,那么,这一形象的广义性、泛指性、不确定性,也就是必然存在的。面对一个象征意义很强的形象,对它的广义性、泛指性、暗示性有可能一一加以确定性的解释吗?

在具体分析阿 Q 的创作审美方式和手法是写实主义还是象征主义之前,让我们首先对这两种创作审美方式以及典型化问题作些必要的界说。写实主义又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审美方式,其根本的特征是要求按生活本来的面目真实地再现生活。在具体的手法上,要求通过细节的真实描写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在人物形象的创造上,追求形象的个性化。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是对写实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它要求通过“这一个”的真实性、具体性,达到反映时代的某些本质和共性。象征主义则反对审美创作中直观地再现生活,它认为艺术创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象征”(“假定性”)的过程,艺术的本质不在于真实的再现和反映,而在于真实的“象征”,形象作为象征物是思想或真实的寄寓体。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也有相通的一面,它们都要创造形象,也都要创造典型。创造典型化的形象,其实是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共同追求的,是否典型化并不是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它们之间的实质的区别应该在于:一、象征主义比写实主义更要求一种具体形象之中,隐含泛指性和多义性,即共性的不确定性;二、象征主义在反映共性时要求比写实主义更多地是通过暗示性、蕴藉性所产生,因此,它的共性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三、象征主义所要求的形象本身比写实主义多出了一条可替代性,即在为某种意蕴或思想寻找寄寓物时,可以寄寓于这一个,也可以寄寓于那一个。正如皇权的威严感的象征,可

以寄寓于龙,也可以寄寓于虎,甚至可以寄寓于皇宫,或者一道令符。而这点,写实主义是不可能的。写实主义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描写对象是确定的,是源于现实的客观写照,因此便没有可替代性。描写对象的寄寓性——可替代性,是象征主义区别于写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分界线。

界定了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的各自的不同特点之后,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阿 Q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典型。对阿 Q 形象如何理解,鲁迅生前曾作过许多说明。鲁迅多次同人说过,自己创作阿 Q 的本意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影射”、“纪实”、“同情”、“哀悯”、“滑稽”,对于阿 Q 形象的深沉的内含和特别的创作手法“能了解者不多”。(《书信·360 719 致沈西苓》)他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点的。”(《鲁迅论文艺·答〈戏〉周刊编者信》,上海文艺社 1983 年版第 21 页)鲁迅为了如何理解阿 Q,先后给《戏》周刊写了两次信,这两封信,可以看成是鲁迅本人对创作阿 Q 形象的本意所作的注解,也是今天我们打开阿 Q 形象上的争议之门的钥匙。

首先,鲁迅申明,阿 Q 不是具体写“谁”,也摸不着是写“谁”,而是介乎“像是写自己,又像写一切人”之间的一个形象。茅盾是最早感觉出这一点的人,《阿 Q 正传》在报纸上尚未收尾,他就指出,阿 Q 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小说月报》十三卷,第 2 号)后来他又进而指出:“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 Q 相’,我们以为这就是《阿 Q 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 Q 正传》流传极广的主要原因。”(《读呐喊》)既是写“自己”(这一个),又是写“一切人”,而且“只在”为了写出“一切人”,这种表现方式和手法的特别,显然不是一般的写实主义的常规写法,而恰恰是象征主义艺术表现方

式和手法的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在小说中,阿 Q 其实只是“一切人”的共同品性的一个象征物、寄寓体,或中介环节。作者创作的本意和刻画的侧重点主要不在阿 Q 这个人,而在于国民中几乎人人皆有的“阿 Q 相”——又叫“阿 Q 精神”。这篇小说的高超和不朽,阿 Q 形象的隽永和丰富,令人永远思考不绝的并不是阿 Q 这个“人”,不是他那可笑、可怜的“形”,而是一个灵魂,一种品性和精神状态,一种太多的人骨髓里都有的不长进的“阿 Q 相”。阿 Q 精神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阿 Q 本身。不管他是谁,是农民,还是地主,或是其它人等,只要有这类品性,都可以是“阿 Q”;“赵太爷”、“假洋鬼子”以及“小 D”,其实也统统都是“阿 Q”。因此,鲁迅认为,“小 D”并不是小董,“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 Q 一样。”(《寄〈戏〉周刊编者信》)其实,即使从直观的阅读欣赏之中,都是不难感受到这点的。可惜,理论的先验性往往冲淡了这种真实的欣赏直感。总之,鲁迅写阿 Q 的意图主要不是为了写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了写一种精神,一种普遍的“国民的劣根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可能是“一种外在的事物”,而“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美学》第二卷,第 10 页)这种有意“使读者摸不着”的类型性的表现方式、手法,恰恰是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区别于写实主义的最突出的特征。

第二,阿 Q 精神的象征,在小说中,不是单纯地以席勒式的传声筒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点与《狂人日记》中狂人思想的象征表现又不太相同。通过“狂人”的自白,鲁迅要传递给读者的是一种自己认识到的观念、思想和呼吁,也就是“礼教吃人”和“救救孩子”。因此《狂人日记》的象征形象“狂人”,某种角度上看,具有一种“传声喜”的特点,狂人与其说是一个形象,不如说是一种思想认识和主观要求的载体,这个载体的“狂乱”之声,正是作者不狂的、清醒的、深刻的思想观念。而阿 Q 身上,鲁迅要传

递给读者的,不是一种思想和主观要求,阿 Q 身上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精神现象,一种不健全的品性,一种病态的世相和灵魂。这种灵魂,大都是通过阿 Q 的象征性的各种“行状”,隐示透露出来的。比之狂人,空泛性没有了,直露性收敛了,因此,阿 Q 不是一个简单的作者的传声筒,而是一种精神现象和品性特征的寄寓体,一个普遍性的国人劣根性的象征。

第三,尽管阿 Q 在鲁迅笔下是具体的有鲜明个性的“这一个”,但是,阿 Q 形象本身仍然具有明显的“可替代性”。这又是象征主义艺术形象不同于写实主义形象的一个特点。我们不妨注意一下,当我们许多人在为阿 Q 是否“农民”、是否“雇农阶级”争得不亦乐乎时,我们竟然都忘记了,鲁迅自己却从来也没有给阿 Q 是“谁”、是“什么”下过确切的判定。鲁迅从没说过阿 Q 就一定是“农民”,也从未说过阿 Q 一定是属于哪个“阶级”。鲁迅倒是反过来批评那些“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的人,他说:“未庄在哪里?《阿 Q》的编者(指戏剧《阿 Q》——笔者)已经决定:在绍兴。……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人名也一样,……用“赵太爷”“钱太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 Q 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对于《阿 Q》的剧本,鲁迅还认为,从背景到对白,到人名,以及戏中的道具,其实也都是可以随时置换,“使大家可以活用”。(《答〈戏〉周刊编者信》)这就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阿 Q 形象以及《阿 Q 正传》中的许多细节,都不是确定的写实形象,而是可以随时替换的寄寓性的象征形象。作者的本意是在写“国人的灵魂”,至于这一灵魂的载体、寄寓物,则是可此亦可彼的。于是便有了对戏中的“白话”可以改为“土话”,“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也可以叫作“小辫子”(参阅《答〈戏〉周刊编者信》)之类的调侃;也就有了阿 Q 的画像,除了头上的毡帽之外,可以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也可以有“游手之徒的狡猾”,

还可以有上海的“洋车夫”和“小车夫”的影子。(参阅《寄〈戏〉周刊编者信》)细细品味一下鲁迅的话,就可以发现,过去评论界的许多关于“阿Q是谁”的争议,产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拿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去硬套,非要按照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去考究出确定的真实的“这一个”。而按鲁迅的意思,这都是“白费心思”。阿Q原本就不是按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手法去塑造的,阿Q只不过是象征物,而象征物在本质上就是可以替换的,不确定的,只要它合适表现主观的意蕴、思想、情感体验,大概换成阿A、阿B,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阿Q”最合适,最恰当。

第四,鲁迅在运用象征主义方式和手法创作阿Q形象时,为了丰富象征形象的鲜明性和生动性,也尽量顾及到人物个性描写的具体化和细节化。这点,主要是通过阿Q的各种可笑的“行状”、故事情节和人物对话的生活化、细节化描写表现出来的。在小说中,阿Q虽然是个象征的寄寓体,但是,这个寄寓体的选择和描写又尽可能地取之于现实生活,孕育于长期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鲁迅说:“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阿Q正传〉的成因》)是颇费了“苦心”的。在讲到阿Q及小说其它描写的可替换性时,鲁迅同时又说“只要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对陈铁耕刻的十幅阿Q画图,他认为让阿Q坐摩托车“更远于事实,那时那里有摩托车给阿Q坐呢?该是大车,有些地方叫板

车,是一种马拉的四轮的车”。(《寄〈戏〉周刊编者信》)可以看出,鲁迅在选择如何刻画阿Q这个象征形象时,是多么重视尽可能符合时代、环境、人物和细节的现实性和逼真性啊,又是何等纤细深入!从这点上说,阿Q形象在具体的刻画上,鲁迅确实也是尽可能兼用了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相对确定的个性化描写,突出了阿Q的外形上的个性,目的是使之与象征主义的表现方式有机地“相调和”,就象安德列夫那样“消融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使形象“仍然不失其现实性。”(《〈暗淡的烟霭里〉译后附记》)这样,便有利于充分发挥象征与写实两种艺术手法的各自的长处,使象征主义形象更逼近现实,更富有接近细节的真实感,象征也就因此更为含蓄和蕴藉。这种对各种艺术方式和手法的兼收并蓄,融汇创新,在鲁迅作品中是常有的。再由于鲁迅文学创作观上的“为人生”和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这些属于艺术哲学层面),融合一体,使阿Q形象的创作上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阿Q这个象征型艺术形象,也就因此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形象创造的最高艺术水平的代表。

当然,以上的分析,仍十分粗疏。我的本意是把问题先提出来,引起讨论。关于阿Q形象的象征性问题,还应该大量的深入的文本分析跟进才行。本篇难以尽言,留待另文再作追究。●

责任编辑:童 轩

《说文》声训五则

□ 姚炳祺

(广东省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说文 声训 文化内涵

[摘要] 《说文》中的声训与语源无直接联系, 而应看作是音韵学、训诂学的很好的材料, 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中图分类号] H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1999)10-0107-04

汉时于文字训诂之学盛行声训,《说文》虽重在据形析义,然而凡用以训释之字的字义能为社会所理解,而又与当时的典制、礼俗、风尚有密切关联者,许氏无不用声训。《说文》中之声训,主要不在说明两字间的语源关系,而是与形析配合,以揭示该字本义中所蕴含的人文内涵。

所谓“声训”,早期并无此名称,偶尔见有同字或同音字为训者,也只是为了强调某事或某名物而用同字或同音的动词来解释意义相关的名词,如“政者正也”(《论语》)、“彻者彻也”(《孟子》)。这种解释字法,至汉代发展成为一种训诂方法,后世进而将声训这种训诂方法,理解为是说明两词间的语源关系。刘熙《释名》被认为是最早的揭示语源的声训字书。《释名·序》曰:“熙以为自远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名(多)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所以之意,故撰……,谓之《释名》”。

对《序》中所言“所以之意”,可有两种理解:一指语源(ETYMOLOGY);一指典章制度,民俗风尚,即《序》中所载“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以及由此生发的观念、信仰、思维模式、心理特征等。如将《序》中“所以之意”等同于“语源”,则《释名》所训便多是“想当然”的,内容自多荒谬。如认为“所以之意”非远指语源,而是具体指典礼所制,民庶所出,则《释名》一书不仅具有音韵学、训诂学的参考价值,更具有人文科学的史料价值。

王力先生说:“乾嘉学派在语文学上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们能突破文字的框框,从语音上研究词义。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上说:“‘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这是千古名言”。祺谨按,就“因声求义”的训诂法之声训而言,王念孙的话确属“千古名言”,然而乾嘉学派的声训成就以及所引王念孙的所言所指,当属“训诂”,无需理解为“语源”。“训诂”是为解释经籍中之古语,因经籍多通假字,不明声训难

以达意。释读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汉简帛文字,更需运用声训才能读通。对此,乾嘉学派之声训建有殊功,如拘于文字框框,望文生义,则难免致误。但是如研究二字之语源关系或同源关系,则又不能完全撇开字形,必须形、音、义三结合,始可最大限度地避免主观臆断。“声训”与“语源”虽有联系,但毕竟二者概念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说文》中之声训与语源并无直接关联,即使象“月,阙也”、“日,实也”、“天,颠也”这些近似语源的训释,也难以确证其为语源。《说文》中之声训材料,理应是音韵学、训诂学的很好素材,文化史的重要资料,因长期被误与“语源”混同,以致影响了它的可信性,从而降低了它的使用价值。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特举若干例,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木



《说文》:“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中,下象其根”。


此例前半为声训,后半“从中,下象其根”为形析,若无此形析,则“冒也”之冒,究指何物终不得其解。两训结合,不但明确“冒”是指冒地而生之树木,而且进一步揭示“木”字在当时广为人们所理解和运用的人文内涵。要判断此训是否正确,须先理解何谓“冒地而生,东方之行”?按,阴阳学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阴阳之朔义,背日为阴,向日为阳。后经抽象,象征两种对立面之相互消长与转化,用以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与法则。战国末期邹衍将阴阳理论与《尚书·洪范》中之“五行”相结合,形成阴阳五行学说。至汉代董仲舒又将此阴阳五行学说神学化,用阴阳理论将天(自然)、人(君)和社会(治乱)三者结合,构成互相联系的变化规则,并将阴阳与五行相配,认为阴阳







消长与变化的原因,在于五行之相生与相胜。他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秋主收,冬主藏。”(《五行对》)。又说:“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五行之义)。据此可知“木”乃五行之一,居东方,代表春。可见所谓“东方之行”乃“木”之代称,即是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木”。“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白虎通》)。据此亦可知所谓“冒地而生”,也是以阴阳五行学说对“木”字之具体解释。“冒”当读为冒突之冒,言树木于春天受阳气催动,冒地而生出。从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的角度看,“冒地而生”是“木”字的表象特征,而“东方之行”则是“木”字的本质属性。两相结合即为《说文》对“木”义之界说。

“从中,下象其根”,此为从形体结构方面,亦即就“六书”之旨,析释“木”义之所从来。此处析“木”为象形字是正确的,但谓“从中”则非,盖中乃草之初生,木为树木之通称,不容相混。木字据甲、金字形均属整体象形,上象枝,中象干,下象根。故“从中”属错析,不可据。又,对“木,冒也”之声训,也只能承认其相对之正确性,即“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在当时属权威性解释,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学术界从哲学、社会学方面对木字的认识情况,在今天看来,只能肯定其蕴含历史文化内涵,而不可认同为“木”义之科学界定。

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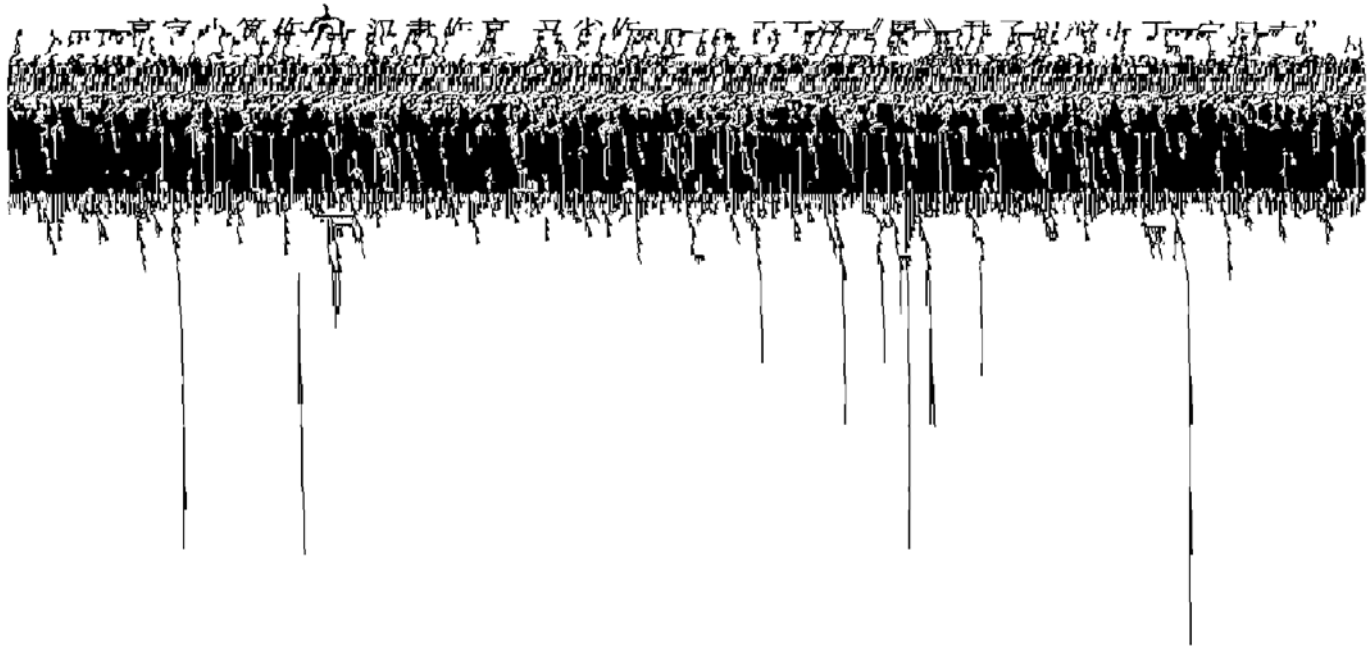
《说文》:“享,献也。从高省。象进孰物形。孝经曰祭则鬼享之。篆文高”。

“享,献也”为声训,“从高省,象进

孰物形”为对“献也”义之形析。享字之本义过去有两说：一为据《说文》之析释为说，认为象孰物之形，而上面非“从高省”，实乃器之盖，整体为一烹饪之器，引申为享祭，《说文》所训之“献”属引申义。二为据甲、金文享字之字形为说，认为“享”原为宗庙之形，引申为享祭之享。前者见清人孔广居《说文疑疑》和近人朱芳圃之《丛释·享》；后者吴大澂于《说文·古籀补》中首倡其说，当代古文字学家多因之，现几成定论。享字甲骨文作（京津 1046），（粹 1315），金文作（孟鼎），（虢文公鼎），（楚赢匜，春秋），均象宗庙之形。宗庙为祭祀之所，名词，稍引申即为动词享祭。《说文》训为“献”，献享亦享祭之意。享与飨有别，享为神道，飨为人道，享祭之对象为鬼神，飨食之对象为生人，此为就字理严格而言，实际情况当然复杂，如《左传》无论享祭、飨燕皆作享，无作飨者，《小戴礼》则反之，皆用飨，无作享者。民间常见之祭文“呜呼哀哉尚飨”，于鬼神则又用飨。遇此类，理应视作通假，即本属享祭而用飨者，假飨为享也，反之亦然。

也。从示从豊，豊亦声。”

“礼，履也”为声训，“所以事神致福也”是对“履也”之具体说明，两相结合构成以声训训释“礼”字之本义。“从示从豊，豊亦声”则为形析，是从形体结构方面说明礼字之本义是由示、豊二字会意而得，豊为“行礼之器”（行祭之物），示为神主，以祭物置于神主之前，表示祭神祈福，此即“礼”之本义，亦即《说文》所训“所以事神致福也”。如删去“履也”二字，即纯属形训，形训虽较严谨，但仅止于“事神致福”，而以声训“履也”相辅，则充实了“礼”字之文化内涵。礼（豊）字在殷代主要用为祭祀天帝、先公、先王，西周后则主要反映上下、尊卑之等级法度，此“礼，履也”即反映这一文化背景。“履”之义，汉以前只用为表示足践、践踏、实践，表名词之鞋则用“屨”，（如《诗·葛屨》）和《大东》：“纠纠葛屨，可以履霜”。汉以后不论动、名均可用“履”，用“践也”之履，因与“礼”互训相通，几成为礼字之代称。如《尔雅》：“履，礼也”，郭注曰：“礼所以履行，见易”。按，“见易”指见《易·履卦》和《序卦》，《象传》曰：“上




之法度,此法度乃人们的言行规范,必须躬践之,履行之,此即“礼,履也”之声训中所体现的文化背景。

晋

《说文》:“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从𠄎。易曰:“明出地上,晋”。

晋、进上古音同为真部精纽。故“晋,进也”为声训。“日出万物进”是对“进也”之具体解释。“从日从𠄎”为形训,是从形体方面说明晋字之具有“日出万物进”之“进”义,乃由“从日从𠄎”会意而得。“易曰:明出地上,晋”是引《易·晋卦·象传》文,以证晋之训进之不妄。引经证字,乃《说文》之常例。

祺按,“晋”之字形从甲骨文、金文看,与小篆基本相同,多为从日从𠄎。晋字所从之𠄎(入质切,音日)为双矢达地形,《说文》训为“到也”。对此,未见诸家有异议。问题在于:用双矢达地之“𠄎”,与表太阳之“日”,如何能会意为“进也”?故当代诸家对晋之本义训为进,存有不同看法。颇具代表性的有两说:一、林义光《文源》曰:“日出无物进之义,晋者臻之古文,至也,与至双声对转,实与至同字”。二、杨树达《金石·释晋》曰:“晋者箭之古文也……象两矢插入器中之形”。祺按,晋字从甲、金字形看多作,当为日字,故《说文》形训“从日从𠄎”基本不错,特别是从𠄎象箭之形更属无疑。至于从日从𠄎会意为进,虽牵强难通,惟与声训结合则可理解。

《说文》:“晋,进也”之声训,反映了《易·晋卦》这一文化传统之义,对形训之“从日从𠄎”,无疑是一很好的补充。《易·晋》之经文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山

《说文》:“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

山、宣上古音为元部叠韵,声则为山心准旁纽,二字古音相近,故“山,宣也”可视为声训。“宣气散,生万物”是对“宣也”的具体解释。“有石而高,象形”属形析。从甲骨文字形看,山字均象三峰并立之形,确属象形字。因山字和丘字古形、义相近(丘比山少一峰),故用“有石而高”表山的外形特点,以区别“土之高”之“丘”。至于山字的内在涵义(人文内涵),是由声训“宣也”表达。宣者宣泄之意,谓“山出云雨,所以宣地气”(《系传》),滋生万物,而出财用。此与《释名》:“山,产也,产生物也”同意,亦与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及讖纬有关联,如《艺文类聚》引《春秋说题辞》曰:“阴含阳故石凝为山,山之宣言宣也,含泽布气,调五行也”。同时与我们的祖先对天文地理的认知特点亦有渊源关系,如汉·张衡《灵宪》曰:“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钟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山之宣气,不但滋生万物,而且上升至天,即可精(精气)钟(凝聚)为星。把天和人有机的地联系起来看,所谓“天人合一”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归宿点,基于此,把天和地有机的地结合起来看,则是中国传统的天文地理观。这些深一层的人文思想,细心者,从“山,宣也”这一声训中,多少也可以领略到一点。所以对《说文》这一声训,如单就字理言,确难信从,因为可说“山,宣也”,亦可说“山,产也”,或者也可用其他同音或音近的字去附会,随意性太大。但是声训反映时代特色,保存了若干宝贵的人文材料,这一点不可抹杀,这就要求使用者善于掌握。●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中国饮食文化的又一力作

——评林乃燊教授新著《饮食志》

□ 洗剑民

(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10-0111-02

林乃燊先生是我国较早涉足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1957年,他就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的角度,去透视中国古代的食料、食器生产、文化风尚和社会生活,引起了国内外文化学者的关注。1989年他出版了《中国饮食文化》,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台湾再版了他的著作。接着内地又出版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台湾又出版了该简本的繁体字版,日本也即将印行日文版。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园地中辛勤耕耘了40多年的林先生已是硕果累累,但他并没有止步,最近又撰写出构思新颖、别具创意的新作《中华文化通志——饮食志》。

《饮食志》一书在学术上的新突破,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1. 理论体系的新建树。林先生在饮食文化的研究中,提出了饮食与四大产业的关系理论,他认为:人类的饮食需求,产生了四大产业,即大农业生产,厨具、食器生产,膳食生产,食品生产。四大产业构成了饮食文化的物质

基础,可称为物质形态的饮食文化。它包括了两大程序的生产:第一程序是食料、厨具和食器的开发和生产;第二程序是膳食和食品的生产。从物质生产的领域弄清饮食文化的第一程序与第二程序生产的关系,是研究饮食文化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饮食志》全面、系统地把握了饮食文化的发展线索,展示了饮食文化的本质特征。

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考察饮食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是《饮食志》理论体系的一个特点。林先生认为饮食文化与中国政治和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中国人把食事提到治国安民高度的格言。中国两千多年连绵不断的农民战争,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邦利民的战略工程。饮食文化的兴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反馈作用,离开了国民经济去研究饮食文化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林先生的理论研究注重把饮食置于社会学的范畴加以深化和升华,注重从文化学的角度阐明各种文化的叠交形成的饮食习尚。他

指出饮食文化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及心灵交流的重要媒介。饮食文化与其它文化的结合产生了亮丽的人文景观,如与佛教食俗结合,产生了素食菜系;与伊斯兰教食俗结合,产生了清真菜系。饮食文化与文学、美术的结合折射出异彩纷呈的人生世态。作者明确指出饮食文化与许多学科紧密相连,它又是一种多元组合文化。

2. 研究方法的创新。过去人们习惯于把烹调饮食学等同于饮食文化学,其实,烹调饮食学仅是饮食文化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在饮食文化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烹调饮食学与饮食文化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门学科。《饮食志》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背景、源流、内涵、外延及其特质,作了基本介绍。运用文化学的理论去阐明中国饮食文化的现象是作者的重要创新,它体现了作者较深的理论素养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功力。该书从中华民族的经济地理、食料生产史、国土开发史、民族交流史的角度探索中国饮食文化的源流和现状。同时作者注重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运用营养学、食疗学、烹调学、保鲜学、发酵学等学科的知识去剖析中国的饮食,提示中国文化的奥秘。可以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历史追寻和现实考察的融汇是该书最富新意的办法,正是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使全书准确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饮食风尚和艺术传统,阐明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规律。

传统的志书体例多侧重于对史实的陈述,林先生的《饮食志》显然打破了这种传统,作者宏观地把握中国饮食的潮流,以独特的历史眼光去评述各种饮食事象。全书围绕中国饮食文化溯源、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饮食文化的关系、中国的两大国饮——茶和米酒、饮食文化反映的社会生活、民族交融、中外交流与饮食文化的发展、饮食文化的文化载体及其功能、新中国饮食资源的全方位开发和饮食文化的蓬勃发展等七大中心问题展开论述,清晰地透视了饮食文化的全貌。作者对饮食文化长

期被贬低、被误解的情况,作了分析和针砭。对新中国饮食文化的蓬勃发展,也作了充分的论述。同时,作者也遵循了志书体例的许多方法,收入了《中国饮食文化文献解说》和《中国饮食文化大事年表》,介绍了许多文献资料,列举了重要的饮食事例,这对于了解和研究饮食文化的基本材料,甚有裨益。

3. 学术观点的新突破。《饮食志》突破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把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推上了新台阶。首先,该书较充分运用和阐发了考古资料,提出了中华民族八大摇篮的创新观点,为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的逐步形成及早期的民族交融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为了阐释上古丰富的青铜食器的背景,作者理出了三代六大青铜铸造中心,令人信服地看到中国青铜文化的辉煌成就。该书还拓展了东南沿海这一区域的研究,特辟了“九大粮区的形成”、“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对饮食资源交流的意义”、“商品经济发展与东南沿海城市的崛起”等内容,补了前人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对饮食商品与世风流俗的分析,则体现了作者精深的史识。

其次,《饮食志》在民族交融、中外文化交流与饮食文化的发展这一问题上深入推进,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传统的饮食文化研究,多注重汉族民族饮食的研究,《饮食志》也注重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从而把中国饮食文化以多元的立体的模式展示出来。作者强调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对饮食文化的促进作用,强调中外文化的交流给中国饮食文化增添了新的因素与活力。这种观点符合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情特点,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貌。

再次,对于中国饮食文化,作者独到之见犹多,许多平凡的细节,习以为常的问题,一经点拨,便产生画龙点睛的功效。如作者指出:“中国的饮食文化,具有丰富的世界实践意义。自古以来中国的膳食平衡理论和食疗学、本草学、养生学,已成了世界保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烹调美食,为世界人民所共享,赢

“建国 50 周年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 研讨会综述

□ 孔庆榕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 5104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10-0113-04

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中共东莞市委和市政府、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等 7 个单位联合主办的“建国 50 周年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学术研讨会于 1999 年 6 月 9 日至 11 日在东莞市举行。到会的有广东省、北京市、四川省、安徽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的学者、来宾共 150 人。会议共收到论文 90 多篇, 现就论文及发言的主要观点作一综述。

一、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特征

有的学者概括为以下 6 点, 即: 1、以邓小平理论为凝聚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 2、以振兴中华, 实现现代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 3、以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行动纲领; 4、以“一国两制”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决策; 5、以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 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中

得了‘烹调王国’的美誉; 中国的陶瓷餐具, 风行于世界十多个世纪, 为各国人民所喜爱; 中国培植的大豆和茶叶, 为丰富世界的膳食和饮料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温饱工程和‘菜篮子工程’, 为第三世界提供了榜样, 同时中国也吸收了不少的外来饮食文化。”

此外, 关于新中国饮食文化的成就及对未来的前瞻, 是前人尚少触及的内容, 该书作者

则客观地评价了新中国饮食方面的成就, 也指出其不足之处。作者构想了中国未来的饮食蓝图, 阐明中国饮食资源的可挖掘潜力, 又指出中国面临严峻的生态问题, 以引起人们关注。让科学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 林先生在该书中作出了成功的尝试。●

责任编辑: 郭秀文

把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向新层面;6、以反腐倡廉,从严治党为动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核心力量的凝聚,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凝聚力确是空前地增强。有的学者认为,建国50年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波浪式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学者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状况,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是否坚持正确路线有直接关系。有学者认为,对建国以来中华民族凝聚的状况也应作出具体分析,大体上可分为4个阶段,即:“解放初期热情献身的凝聚;60年代驯服工具式的凝聚;‘文革’十年阳奉阴违式的离心倾向;近20年的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新型的凝聚”。

二、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变化发展中获得的启示

与会者一致认为,纵观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变化发展,结论就是:“只有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才会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换句话说,“只有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凝聚力才能不断地获得增强”。大家从以下诸方面阐述了这一结论:

(一)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些学者认为,制度是更带根本性的,无论是社会的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离不开社会制度。中国如果不是在近20年而是在早20年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实行相应的政策,中国一定会比现在强大得多,民族凝聚力也不会走着那条曲折发展的道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未来走向,从根本上说决定于这一社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有的学者认为,研究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还应当把视野拓宽到全世界,“寻求全球化背景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途径”。“中国只有实现民族独立自主,才能摆脱在全球化进

程中的依附地位,只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迷失民族前进的航向,逐步实现国富民强”,“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色才不至于被全球化浪潮吞没”。

(二)必须迅速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些学者写道:“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总体实力”,“它包括了国家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精神力量”。“强大的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确保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和争取未来国际地位的重要条件”。“综合国力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状况”。

有些学者指出:“综合国力是一种合力,是整体性、综合性的实力体系”。“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和与会者,联系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变化发展史,联系了不久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暴行,指出迅速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的紧迫性和战略性意义。

(三)必须大力增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凝聚力和对全民族的吸引力。有的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内涵着领导核心的内聚力”,这一内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起主导和关键作用”,其内涵就是“领导核心的统一和团结”。“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中国共产党自身凝聚力的增强,是中华民族吸引力、向心力、亲和力增强的必要前提”。“当代以至下一世纪,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持续增强,关键在于中华民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否继续能对全民族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作用”。

有些学者联系到当前党的历史任务和现状强调指出,必须搞好党的自身建设,“把党的建设放在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反对西化、分化、演变的高度去认识”。

(四)加速政治民主化。有的学者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增强中华民族

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每个时期的“民心”、“民意”正是那个时期民族的凝聚点。从增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角度看,正确地理解民意、尊重民意、引导民意,才能做到争取民心、鼓励民心、振奋民心,推进民族凝聚力向前发展。

(五)要树立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凝聚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而“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是共同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共同利益的前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必须以这一理想去教育群众,才能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并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凝聚力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精神力量,它与一定的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增强当代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必须建构适应当代需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要在肯定传统文化的正面意义的同时,克服其负面影响,例如“强调群体,不要忽视、压抑人的个性发展,增强人们的法治观念,把中国传统的礼治社会、人治社会,有效地转化为现代法治社会;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树立国人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

三、邓小平理论是当代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

与会者从邓小平理论的多方面内容阐述它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作用。

(一)社会主义本质论。有的学者写道,过去由于“片面强调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一个平均主义的乐园,实际上是共同贫困,致使我国国民经济陷于停滞状态。”“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使我国重新重视发展生产力,使国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使我国人民普遍富裕起来;国强民富的结果又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对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有着极其重要意义。大家着重谈了以下方面:

1. 社会的发展必须是综合协调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2. 把社会发展的目标与道路、速度与效益、发展生产与提高人民生活等统一起来。

3. 把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

4. 把人的全面发展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有的学者说,邓小平的发展观非常重视作为发展的主体——人的全面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着眼于人民群众提高到社会本质的高度”。

5. 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依据,并“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振兴中华民族中的关键作用”。“只有高技术产业,才能保证和支持一个国家的经济获得稳定的增长”,“才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因此“建设强大的民族高科技产业,将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最重要的凝聚点”。

有的学者专门提出了“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新视角——创新”,指出:“创新是发展的杠杆,离开了创新,就没有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创新”包括了转换创新模式,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和价值取向的更新。这些都关系到“人们的精神意识的嬗变和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发展和进步,关系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各种因素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并向更高发展。有的学者说: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角度看,“创新赋予了民族凝聚力的时代特征和要求”。“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战略与中华民族凝聚之间有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关系。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实现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战略的重要精神力量;一个现代可行的国家创新体系本身又大大增强着整个民族、国家

和社会的凝聚力”。

(三) 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学者写道: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主流”,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石, “爱国主义本身对民族就有巨大凝聚作用”。邓小平不仅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而且把爱国主义与当代中国人民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具有新时代的内涵。

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内涵, 学者们作了以下的概括: 1. 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 2. 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搞四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视为当代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 3. 坚持独立自主, 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主权和国格是爱国主义的原则; 4. 把爱国主义与(通过“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结合起来。

(四) 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有些学者认为,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 邓小平从国际、国内的实际出发, 提出了爱国统一战线, 深刻地阐明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地位、作用、任务、对象、范围, 是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发展, 使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获得空前增强。

有些学者写道, 在新时期, 统一战线也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法宝”。“统一战线发展了, 民族凝聚力就得到增强, 民心就振奋; 反之, 统一战线工作停顿或受到破坏, 凝聚力就被削

弱, 民心就消极。”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训。

有些学者指出: “在当代中国, 中华民族凝聚力与爱国统一战线紧密相联”, “而民主党派作为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澳门回归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学者们异口同声地说: 澳门回归是继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 中华民族又一百年盛事。一位学者写道: 澳门回归的“政治价值在于结束了几代人业已承受的屈辱历史, 承前启后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其经济价值在于为国家增添一个具有一定潜力、同国际市场接轨的全方位自由港, 澳门也将揭开走向自身历史发展崭新一页”, “其文化价值表现在可以大大振奋民族精神, 凝聚民族情感, 成为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夺取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发展的巨大激素”, “其理论价值则在于可以令人信服地再次验证‘一国两制’理论的科学正确性、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

学者们指出: 澳门的顺利回归, 是祖国国力增强, 中华民族凝聚力强韧的结果; 澳门的回归, 又必将促进我国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 冯 生

广东社科界讨论新时期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综述

□ 陈家义

(广东省社科联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50)

[中图分类号]B037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0- 7326(1999)10- 0117- 03

如何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促进社会政治稳定, 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 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广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学术研究》编辑部就此问题联合召开了学术研讨会, 现把与会专家学者发表的意见综述如下。

一、关于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

一种意见认为, 我国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广泛地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 其中经济利益冲突的矛盾成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导矛盾。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我国,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 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 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 于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步形成众多的经济主体、市

场主体和物质利益主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在总体上, 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又是矛盾的, 其表现是利益主体内部矛盾, 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 在岗与下岗的矛盾, 先富与后富的矛盾, 贫与富之间的矛盾, 分配不均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暴露, 需要人们的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 才能促进社会政治稳定。总之, 经济利益矛盾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导矛盾, 又是各种矛盾交错的焦点, 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

第二种意见认为, 人民内部矛盾中起着主导性作用的是部分官员腐败与广大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矛盾。这一意见认为, 部分官员腐败, 带来干部官僚主义、钱权交易、社会分配不公、有的职工不合理的下岗、农民负担过重、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在金融风险中的损失、各种经济纠纷频繁等。因此, 腐败与反腐败的矛盾是起着主导性作用的矛盾。

第三种意见认为, 最影响当前社会全面发展的矛盾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经济收入的悬殊过大引起的社会矛盾; 二是民族精神失落而造

成价值观市侩化,产生的离心倾向的社会矛盾;三是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使依法治国发展缓慢,产生的政治观念淡薄和社会矛盾。

第四种意见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是改革不配套,不彻底,有待深化改革。因而带有普遍性而又突出的矛盾有三个方面:一是新旧思想意识、理论体系、价值观念的矛盾;二是新旧体制、双轨制、多轨制的矛盾;三是钱权交易、既得利益集团(群体)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第五种意见认为,现阶段主导性人民内部矛盾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另一种说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即人民群众希望通过改革开放而获得最大满足的利益需要与政府在推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能使所有人都获得最大满足的利益需要之间的矛盾。

二、关于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

要全面、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对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进行科学的认识,除了对主导性的矛盾认识外,对各类矛盾也要从实际出发,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才有利于对不同类型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一) 对人民内部主导性矛盾的认识

专家学者们对新时期主导性人民内部矛盾说法不一,但对人民内部的群体利益冲突是引起矛盾的主要原因,并且成为主导性矛盾,这一点看法是一致的。为什么会引起群体利益冲突,专家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新时期是一个历史转折期,新旧体制的转换期,新旧文化的碰撞期,因此,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尚未完全破除,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构建中,旧文化传统观念,包括习惯势力和旧价值观念尚盘根错节,新旧矛盾处处可见。

二是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历史发展要求不断深化,而政治体制改革,却障碍重重,难免滞后,形成许多怪圈,尤其是社会各种腐败现象据此丛生,利益争夺在此刀光剑影。

三是物质文明在迅速发展,精神文明步履维艰,使社会肌体发展难予完美。

专家们认为,无论是新旧矛盾,还是改革与守旧,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衡,均是利益矛盾的表象化。

(二) 对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具体认识

学者们认为,在人民内部的诸多矛盾中,存在着一种制约其他矛盾的主导性矛盾。这种主导性矛盾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矛盾,而是若干矛盾有机地组成的复杂的矛盾综合体。新时期的这个矛盾综合体,反映在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方面,它的主要表现有以下特点。

第一,利益矛盾内容增多、层面扩大、强度加剧。所谓内容增多,是指人民内部矛盾过去主要是特权思想、特殊化、官僚主义构成特殊利益的问题,现在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经济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易,执法枉法;在社会生活方面,仗势欺人,放纵黄赌毒等一系列问题。层面扩大,从过去的极少数干部犯错,扩大到较多的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都有犯错。强度加剧,从过去少数党政干部脱离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加剧到较多领导干部直接侵犯群众利益,肆意践踏群众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

第二,利益矛盾成为社会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重点和焦点。在新时期社会各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在利益方面。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既是其他人民内部矛盾的诱因,又是制约矛盾解决的关键,从而成为重点和焦点。例如,办事不公、徇私枉法、执法犯法、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仗势欺民、草菅人命等,引发种种人民内部矛盾。

第三,利益矛盾是民众普遍关注的热点。党政领导干部中腐败现象禁而不止,腐败分子惩而不绝,严重地损害社会主义的形象,破坏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是人民群众忧国忧民普遍关注的热点。民众不仅从自身利益考虑,更多的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及其前途和命运方面来考虑。

三、关于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方法

对于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问题,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提出多种多样的设想。

第一种意见,从具体实际工作角度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这种方法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经济利益矛盾,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调节人民内部经济利益矛盾的新系统,通过这种新系统和偶合机制,才能理顺关系,消除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形成新的利益和谐关系。二是人民内部矛盾反映在政治方面的矛盾,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解决,坚持搞好民主和法制,落实反腐倡廉是关键。三是根据部分干部、民众素质差的情况,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提高人的素质。通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来搞好两个文明建设,以求正确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种意见,从理论研究角度探索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从四个方面做工作。一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进一步讲清楚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理顺分配、社会公平、人际关系等,才能克服离散倾向。二是必须研究和绘制出社会主义社

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蓝图。三是必须研究和回答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与上述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及其解决途径。四是必须研究把党建设好,这是重中之重。

第三种意见,从深化改革角度寻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其一,当前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改革不配套,不彻底,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处理好这种矛盾。不配套反映在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其二,加强“依法治国”,进一步落实“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还要“依法治干”。

第四种意见,从社会心理失衡的角度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一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克服因分配不公导致的心理失衡;二是架设社会与民众的心桥,多形式、多层次克服下岗、失业引起的心理失衡;三是以强化政府权威,健全法规,反腐倡廉,平息由于官员腐败等导致的心理失衡;四是建立社会心理的预警机制,预防体制转换、新旧体制交换出现规范真空而产生人们无所适从的心理失衡。

第五种意见,纯粹从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提问题的。第一是对话方式,包括信访、走访、面谈、传话、报告、会议、咨询等;第二是协约方式,包括合同、合约、公约、协议书、保证书、公证书等;第三是政策方式,对于全局性或可能诱发矛盾的问题,必须通过制订相应政策或决定,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第四是纪律方式,包括党纪、政纪、军纪、校纪、厂纪等;第五是法律方式,包括遵守宪法、各种法规;第六是变构方式,所谓变构,是分解原有矛盾结构体系,重新定位矛盾各个方位,然后对症下药,综合治理。●

责任编辑:冯 生

“宋代以前岭南的历史与文化” 学术研讨会综述

□ 陈永升 温春来

(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广东 广州 510275)

[中图分类号]K28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10-0120-01

1999年4月5日,由广东省历史学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宋代以前岭南的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会议参加者主要包括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社科院、《学术研究》编辑部的部分专家、学者、研究生。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宋以前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状况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家族统治是宋代以前岭南地区政治生活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色,它对该时期的岭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守为教授认为,隋以前家族统治的形态大概可分为地方豪族的统治和王室统治两种类型。前者的典型例子有秦末到西汉的赵陀家族、汉末三国的士燮家族以及三国末年至西晋时期的陶璜家族、滕修家族等。而王室统治则是一种特殊的家族统治,在岭南主要集中于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其中以梁代最为。至于为什么岭南地区在这一时期(从秦末到隋)出现家族统治,胡守为教授总结了四点原因:(1)王朝统治者对岭南地区的轻视。(2)岭南家族统治时期往往出现在朝代更替之际或王朝内乱阶段。(3)岭南的大家族往往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4)岭南的家族与当地土著联合,到了后期,甚至当地少数民族大族也加入家族统治的行列中。最后,胡教授指出,尽管也有较为成功的家族统治时期,但大多数家族统治纠缠着各种落后的因素,既不

能选贤又排除监督,处理不善,还会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失去平衡,乃至发生叛乱,后世应引以为戒。

王承文博士认为唐代岭南的家族统治与社会转型,颇能以华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溪洞的变化加以反映。家族资料中那些所谓的蛮俚僚少数民族渠帅、洞主,其实是从中原迁徙而来聚族而居的大族,他们的生活习俗与俚僚多有相同,背后其实是一个蛮化的过程。但他们同样具有较高的汉族文化。唐朝施行于南方的特殊选官制度“南选”,实际上是对这些溪洞家族统治的否定,而溪洞家族的反叛正缘于此。由于北方大族的南迁,导致了岭南地方家族结构的变化、民族融合的完成以及俚僚民族的消失。而中央王朝则通过“南选”,把溪洞社会整合成直接统治区域,使当地的社会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

张荣芳教授在《西汉蜀枸酱进入番禺路线初探》的专题报告中,考察了蜀地枸酱进入夜闾的路线,并据此推测,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的“唐梦修南夷道”之前,民间已有一条道路,唐梦修的官道是以民间的道路为基础的。

刘志伟教授在关于岭南历史的研究中有一个中心问题:岭南地方与中央政府、中原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在唐以前,岭南在政治、文化上与中央有一定的疏离。自秦代岭南并入

“海峡两岸跨世纪大学文化发展 学术研讨会”召开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10-0121-02

中山大学和台湾中原大学于1999年5月10—11日在中山大学联合召开“海峡两岸跨世纪大学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部分大学校长及有关专家学者共4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中山大学副校长李翀教授主持。

与会者一致认为,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必须具备双重功能,即社会功能和个性功

能。培养素质,既要培养学生的科技、知识、能力素质,也要塑造学生的人格、心智、人文素质。随着科技生产力因素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大学教育普遍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大学教育缺乏人文气息。这具体表现为重理轻文,重技术教育轻价值教育,重专业性培养轻人格铸炼,重知识传授轻

版图之后,岭南从文化上整合到中央的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种过程在读书人的记录下是一个教化的过程,这方面尤以文字的使用表现更为明显。宋以前,文字在岭南地区已有广泛的推广和运用。从佛道两教传播,岭南从来都不是边缘。从《广异记》中狄仁杰毁淫祠的故事来看,文字在人们的观念中已不是单纯的文字,它具有了某种活力。而文字作为法律来运用,地方上接受它,就是表示接受中央政府、国家的权力,而作为儒者的教化,也是使用了文字的法力。

马承玉先生在《秦汉时期越祝术的北渐及对道教的影响》的报告中考察了秦汉越人向北迁徙的过程,认为道教发萌之地,正是越人北渐的重要区域沿海地区。所以越祝(即越人的咒术)对道教的思想有着重要影响。

在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意识到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地方史”,一个特定的区域与其它区域之间是互动的,因此在地方史研究中必须把地方纳入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考察。基

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十分重视岭南与全国乃至世界的关系,对该地区同其它地域的交流以及同中央王朝之间从疏离到整合的过程作了考察。刘志伟教授认为,人文学者最终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地方(即空间),而是通过地方的发展去看清一种趋势。蔡鸿生教授则认为历史上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疏离。而岭南文化也不是什么海洋文化,岭南文化在滨海地域中成长,故有滨海地域特征的岭南一直是对外交流的重地,得风气之先,好的坏的东西都从这里上岸。他同时指出,胡守为教授的研究把区域史同断代史结合起来,从全国的角度看岭南,不就事论事,具有示范意义。

学者们还批评了牵强附会的趋时学风。蔡鸿生教授对一种当代有什么事物,而古代就有什么的思维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中国历史去了“影射论”,来了“投影论”,十分令人担心。我们的研究确实需要创新,但不需“趋时”。●

责任编辑:郭秀文

创新训练。简言之,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忽视了教育的个性功能。把教育为社会服务演变成了教育与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合二为一,甚至可以说大学教育完全成了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目标的工具,大学教育不断地政治化、商品化和功利化,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理想的目标追求,丧失了“成人”的功能。大学教育的这种片面性,既降低了学生对社会的适应性,也使教育本身单面化,促成受教育者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某些缺陷。因此,必须确立大学教育的双重功能,即大学不仅是学生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场所,同时也是学生会关心他人和责任,培养健全人格心智的摇篮。为此,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教授提出,大学教育应具有知识传递、科技创新、文化传承三个方面的功能,其核心是培养文理贯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高素质的人才。台湾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教授认为:教育既是探索知识和传递技能的地方,也是塑造人格、追求自我生命意义的过程。暨南大学副校长蒋述卓教授认为:大学教育不仅要赋予学子们较强的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子们能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人格、建立积极向上、乐观的人生价值观。

与会专家学者还认为,要克服当前大学教育功能的片面化倾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必须重视。一是确立大学教育理念,二是逐渐开展通识教育探索。中山大学理论部主任李萍教授认为,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发展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范型,它本质上包含了某种对现实的、功利的、本位的超越。一所大学没有科学的教育理念,教育的目标、行为必然是短期性的、被动的,很容易变成现实的工具。一些大学校长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本校的教育理念。中山大学李延保书记认为中山大学要确立“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宗旨、以质量为生命、以提高为目标、以改革为动力、以特色为优势,做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一

致,做学问、做事、做人协调一致”的教育理念。台湾中原大学张光正校长介绍了中原大学的“全人”教育理念:就是把教育定位于关注人的整体性、和谐性发展的基点上,“寻求天人物我之间的和谐,以智慧慎用科技与人文的专业知识,造福人群”。

确立正确的大学教育功能,必须重视通识教育的探索和试验。通识教育当前在世界上的一些著名学府如哈佛、麻省理工大学正在逐渐推行。对通识教育的内涵和具体操作模式,专家学者之间有分歧,但都赞成通识教育是注重人文精神的熏陶、注重知识的整合、注重学生人格塑造。上海师范大学杨德广教授把通识教育的实质理解为人文教育和人文素质的提高,而人文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关爱和责任意识。华南师范大学冯增俊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根基,它不仅是讲授某种综合性知识,实行学科交叉教育,而且要训练学生以宏观和跨文化跨科学的角度审视人生和社会现象,从而赋予受教育者广阔的视野,敏捷的观察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精诚团结和合作共进的团体精神。台北科技大学张天津教授则把通识教育归结为创新性品格培养和人性化的关怀培养。要实行通识教育,首先要解决教师的通识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朱小曼教授认为,教师本身应该兼通两种文化(技术文化和人文价值文化),还要文理兼通;其次要对教学的有关课程体系进行调整,使文理交叉;最后要在用符号化、描述性知识建立起来的量化技术指标的基础上建立相对于认知发展的情感发展目标。

与会者一致认为,下个世纪的大学教育既要适应和服务于社会,又要相对独立地发展,不仅要立足于社会发展现实的目标,更要立足于大学自身的长远发展目标,加强人文精神熏陶,促使学生智能和德能双重基本素质的提高。●

责任编辑:陶原珂